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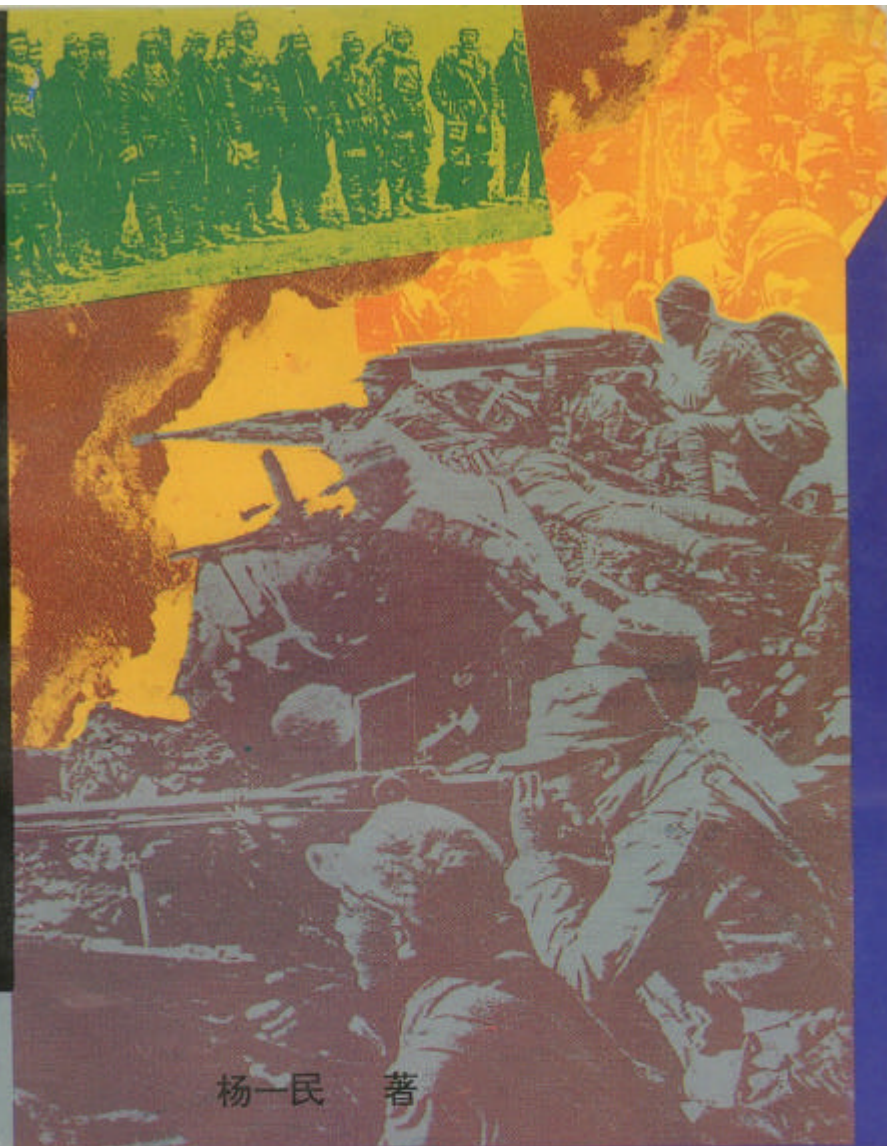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丛书

蓝天出版社

杨一民 著

黄河在咆哮

——中国的抗战



黄河在咆哮——中国抗战

第一章 难忘的“9·18”

一、《田中奏折》

1928年6月的一个午夜，日本皇城。

昏暗的路灯下，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地朝着皇室书库走来。前者是皇室书库官，后者是个日籍华人，叫蔡智堪。蔡智堪一手拿着准备补书用的黄色纸册，一手握着金盾图形的第72号“皇室临时通行证”。

表面看，皇室书库官把蔡智堪带来书库是为了补书；实际上，蔡智堪却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

这年6、7月间，日本国内流传着一件事：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子最近秘密向天皇呈递了一份奏折，中心内容是进一步把侵华战争升级。

一个偶然的时机，蔡智堪从前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那儿知道了这件事。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爱国者，蔡智堪决心要把这件事揭露出来，公之于众。

蔡智堪的爱国热情，使床次深受感动。有正义感的床次决定帮助蔡智堪做成这件事。十分凑巧，内务大臣枚野仲显一是田中内阁的反对者。出于不同政见，他同意给床次竹二郎以方便，让他的弟弟山下勇出面，买通了皇室书库官，蔡智堪才能以修补图书为名进入皇室书库。

虽然才6月间，东京的气候却热起来了。

皇室书库官找到一份文件，放在蔡智堪面前，自己就悄然离去了。

蔡智堪不顾汗流浃背。他用碳酸纸蒙在文件上，用铅笔一笔一划仔细地描起来。他的衣衫浸透了汗水，额头上、脸颊上的汗珠不停地沁出来，可是，他却连擦一擦都顾不上。

这份用“西内城”精缮而成的文件名叫《田中奏折》，内容涉及8个方面，数十万字，长达60多页。

1927年下半年，田中首相主持过多次“东方会议”，中心便是策划侵略中国的具体部署。到会者有政府各省次官、参赞，通商局长，欧美局长，陆军部次官，参谋本部次长，军务局长，军令部次长，关东厅长官，大藏省理财局长，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驻华大使，驻奉天（沈阳）、汉口、上海的总领事等等。

《田中奏折》就是“东方会议”的纪要。

蔡智堪描到下面这两段文字时，眉头紧蹙起来：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为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日本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帝国存亡上必要之事也。”

“寓明治大帝之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既然实现，惟第三期灭亡满蒙，以及征服支那领土，使导服之南洋及亚细亚全带，无不畏我仰我鼻息之云云大业。尚未实现，此皆臣等之罪也。”

显然，这里的“满蒙”，满，即中国东北；蒙，指中国蒙古。这里的“支那”就是整个中国，其中特指中国大陆。

蔡智堪的心收紧了。他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眼

前.....

1894年7月25日，朝鲜牙山附近海面。

清朝北洋水师“济远”和“广乙”两舰完成任务后返航。开出不远，隐藏在朝鲜群山浦多日的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出现了。

“吉野”首先向“济远”开炮。正在这时，悬挂英国国旗的清朝运兵船——“高升”号和满载军械的“操江”号向牙山驶来。“秋津洲”盯上了“高升”，不久即击沉“高升”；“浪速”去堵截“操江”，“操江”被俘虏。

“济远”因“高升”、“操江”的厄运而解脱危机。“济远”管带方伯谦吓得半死，躲在舱内不敢出来，还下令悬挂白旗。舰上的官兵不从其令奋勇还击，连发尾炮击中“吉野”，方使日舰不敢再追。

这是中日间第一次海战。本来，清朝军队去朝鲜完全是日本方面请求的，说是希望清军能帮助朝鲜政府镇压农民战争。中堂李鸿章到这时才如梦方醒，原来日本人做了个圈套让他钻。

牙山海战，拉开了甲午中日战争的序幕。

9月17日，双方水师再次会战于黄海大东沟海面。

日本人这样描绘这场战争：“薄暮冥冥，苍烟锁海，云涛杳渺，满目惨然。”

上次充当杀手的“吉野”、“浪速”、“秋津洲”加上“高千穗”4舰，始终作为先锋作整体运动。“两京丸”、“赤城”等殿后，中间还有“松岛”、“千代田”等6舰。这种阵法对北洋水师舰队形成夹击包抄之势。

北洋水师呢？提督丁汝昌在“定远”舰上刚站稳，就被对方一炮袭来掉下，部下慌乱忙着救提督，使指挥中断。整个北洋水师舰队如同没有旗舰的乌合之众，各自为阵，互不通气，毫无阵法。

这场恶战的结果是必然的，中国“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舰被击毁，日舰也有5艘受重伤，却无一被击沉。战前，“致远”管带邓世昌发誓：“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然而，日舰未沉，他的“致远”却被击沉了，他自己和他心爱的宠物“太阳犬”双双沉入水中。

黄海战败吓坏了李鸿章。北洋水师虽遭惨败，却并非毫无战斗力。李鸿章却命令水师退藏威海卫。

花园口，大连海滩上一片宁静。10月24日的花园口，对日本海军陆战队来说真是一片妙不可言的好去处。大东沟海战1个多月后的今天，日本陆军悄悄地在花园口登陆。从这天起，一连两个星期，大批日军登陆过程中，北洋水师竟毫无反应。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大连炮台、港口被日军不攻自破。

11月7日，日本海军登陆，他们看到高高的大连炮台上，站着的全都是日本陆军。这一天，是清朝慈禧太后的万春节。

随之，旅顺城内百姓惊散，到处是拦路抢劫的散兵游勇，那些号称父母官的正在一船船地把贵重物品运往烟台。

世界为之发指的旅顺大屠杀到来了。整整杀了4天3夜，全城只剩下36个人，光尸体就抬了1个多月。日本人把油浇在尸体上，烧了十几天才烧完。

今天人们还能看到的旅顺“万忠墓”，记载了日寇的暴行，也记录了北洋水师的耻辱。

1895年2月。北洋水师在刘公岛全军覆没，提督丁汝昌的自杀为北洋水师打上了沉重的句号。

李鸿章欲哭无泪。一个多月后的3月14日，他带着他的儿子李继德、美国顾问科士达，由天津乘船去日本，开始他向日本求和的马关之行。

3月20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谈判。下面这段对话反映了“谈判”的基调。

伊：中堂（指李鸿章）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难道不准分辩？

伊：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自古弱国无外交。等待李鸿章的，只要在城下之盟上签字就行了。

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确认，中国的辽东半岛、台湾岛、澎湖列岛割给日本，清朝要“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中国的重庆等5个口岸向日本开放，……

《马关条约》比1842年轰开中国大门的中英《南京条约》要苛刻多了！

曾几何时，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中国盛唐时代，一批批“遣唐使”来到中国，象小学生那样学习中国的制度、文化、风俗，中世纪日本的“大化革新”，处处可看到中国唐朝制度的影子。

奈良，唐招提寺。一批批日本人向东渡而来的中国鉴真大师顶礼膜拜。

1839年，鸦片战争轰开了古老中国“天朝”的大门，日本也无法逃脱这个厄运。

然而，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划时代的革命，把日本引上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维新派，现在正以当年日本向中国学习的那种虔诚心理，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日本的小学生，他们喊出了“以日本为师”的口号，一批批中国留学生去日本，急不可待地学习日本的新思想、新文化。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先生”给“学生”带来的却是舰队，是枪炮，是刺刀，是屠杀，是抢劫，是奸淫，是《马关条约》。

这位“先生”还贪得无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它又从沙俄手中得到了朝鲜，得到了辽东半岛的领土、领水租借权，得到了东北南部的铁路及其一切支线，还包括附属的煤矿和一切财产。

1915年，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又出兵侵占中国的山东。几乎同时，它又通过袁世凯卖国政府接受了旨在灭亡中国的“21条”，胃口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够了！随着思绪的起伏，蔡智堪手下的笔嘎然而止。

整整10个夜晚，蔡智堪的特使使命完成了。他抄完一部分，就把这部分抄到的文件寄出。中国东北保安总司令部的外交主任王家祯陆续收到了这些抄录的文件。

王家祯收到文件后细加推敲，不禁大吃一惊。他马上找人把它翻译了出来，立即引来了国际国内舆论的一片哗然。

也许是太露骨了，日本官方始终不敢承认有《田中奏折》这样一份文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败国的代表，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仍然否认有《田中奏折》。他说：“在日本，没有人相信有这奏折的存在，只认为是一种恶意的宣传而皇皇不理。但在外国，都相信这是反映日本真正企图的文件。”

他把炮制《田中奏折》的责任，归之于“日本军部里的极端分子”，是他们把这种“不负责任的意见书落到他人手里，经过改写做成奏折而用之于

宣传上”。

这种推卸是徒劳的。

1932年任日本外务省政务次官的森格曾经明确说过：东方会议的真正目的，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

真是不打自招，既然有“东方会议”，怎么能推卸《田中奏折》的存在呢？

或者是心虚，或者是难以自圆其说，连重光葵也不得不承认：“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所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作为教科书按其所提示步骤进行的，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

二、皇姑屯：张作霖被炸

无独有偶。和《田中奏折》出笼几乎同时，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炸车案，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死。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沈阳车站北侧约1公里与南满铁路的交叉点。

清晨5时多，天还没有大亮。透过朦胧的晨雾，铁路交叉点上好几十只麻袋隐约可见。

一列火车从北京方向开来。这列蓝色的列车是当年慈禧太后专用的“花车”，如今成了张作霖的专车。此时，他正坐在第八节了望车里，坐在一起的还有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他是专程前来迎接张作霖的，日本军事顾问仪我诚也少佐也在座。他们正喝着早茶。

“大帅，马上就到奉天了。好像有些冷，请穿上大衣吧！”听了吴俊升的劝告，张作霖点头起身，把手伸到大衣袖里。仪我诚也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车厢。

车窗外200米处的堤上，一个男人右手突然一闪。这个叫东宫铁男的日本关东军敢死队员使劲合上电闸。

“轰——”，一声巨响，铁路交叉点一带浓烟四起，张作霖的专车笼罩在黑烟和爆炸声中，列车的顶篷被炸开了，了望车前的警车被炸成了几段。

吴俊升当场炸死，尸体模糊，连腿都没了。

张作霖还剩一口气，马上被送进了医院。

沈阳城被惊醒了。人们还没来得及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整个沈阳城就处于一片紧张的戒严气氛中。

多少年来，人们都不清楚，张作霖的专车究竟是谁炸的。直到1945年9月3日，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河本大作供认，当年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老道口炸死张作霖，系由他一手策划。当然，策划者决不止他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治、奉天省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关东军司令部村冈太郎等也参与了这一阴谋。

在人们的心目中有个印象，张作霖与日本人关系不错。关东军为何要炸死他呢？

张作霖，身高不到5尺2寸，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个子。普通的相貌，和任何一个东北的农民一样普通。

早年的张作霖是个土匪。

从他记事起，就经常跟着父亲出入赌场。有一回，父亲赌输了，想赖帐。那些赌徒可不好惹，一怒之下互相反目，父亲成了赌友手下的欠账鬼。

母亲改嫁，张作霖作为“拖油瓶”一起过来。继父也姓张，9是个本份人。他想把自己学的兽医手艺传给这个继子。不料，兽医这个饭碗让张作霖搭上了当兵的。

甲午海战后，辽沈一带已不是满清的龙兴之地，日本人、俄国人都盯上了这块肥肉。昔日的“盛京”，如今成了土匪窝。大批清军马队扎下来，他们常来找“兽医”张作霖，张作霖羡慕他们神气、快活。很快，他也当上了兵。

兵不是那么好当的。才1年，张作霖就嫌当兵太苦。开个小差，又回到了老家。兽医是再不想干了，干什么呢？投奔绿林，当土匪。

张作霖确是当土匪的料。开始，他的势力最小，可没过多久，他就成了东北最大的土匪王了。豆腐匠出身的张景惠、泥瓦匠出身的张作相和后来入股的汤玉麟，成了他的几大骨干。

虽说是“王”，长此以往总觉没出息。张作霖老想“弃暗投明”，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有人报告说，奉天将军增祺的夫人携带大量珠宝财物经过此地。张作霖命令，连人带物全部扣下，但又不得伤害一个人，不准少掉一件东西，还要把他（她）们视为上宾，热情招待。

他派人给增祺夫人传话：“这次实在是不得已。因为路上不安宁，为的是保护夫人和财物，没有任何歹意。咱们当土匪是迫不得已，希望总有一天能弃暗投明，为大清效劳。”

这些话引起了增祺夫人的兴趣，她连忙问匪首是谁。

“张作霖？！”增祺夫人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水。在她心目中，张作霖是个杀人眨眼的魔鬼。

可是，当张作霖出现在面前时，她愣住了。眼前这个年青人还不到30，举止得体，谈吐文雅，在女人面前极其讨人喜欢。增祺夫人非常高兴，答应把他的意思转达给增祺将军。

夫人被土匪劫持，增祺正在着急。一听夫人回府，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增祺听到这戏剧性的经过，还真十分感激张作霖呢。

不久，增祺通过新民知府曾子祺的关系，把张作霖这股土匪正式改编为省巡防营，张作霖是管带（相当于营长），张景惠是帮带（副营长），汤玉麟、张作相是哨长（连长）。

张作霖和日本关东军的勾结，是他成为军阀后的事。其间，郭松龄“倒戈”事件起了关键作用，使他和日本人的关系越来越深。

郭松龄，是奉军高级将领，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思想激进，精明能干，颇得张氏父子器重。

甲午战后，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经常与日本人勾搭。

郭松龄对此极为不满。终于，他在1925年11月打出举兵反奉的旗号，倒向北平的爱国将领冯玉祥。冯玉祥委任他为东北国民军总司令，并把郭松龄的部队改编为4个军。“倒戈”后，郭松龄率军在锦州等地击败张作相的队伍，继而攻击张作霖。

消息传来，张作霖暴跳如雷，却无可奈何。

怎么办呢？他想到了日本人。关东军司令部一看，这是拉拢、控制张作霖的好机会，便趁机向他抬高价码，比如说，承认日本人在“满洲”的土地商租权和杂居权，在一些重要城镇设置日本领事馆，等等。张作霖一心要借日本人的势力打败郭松龄，这些条件当然是全部答应。

果然，有日本人撑腰，张作霖有恃无恐。郭松龄却处处受到日本兵的行动限制。这年12月24日，郭松龄孤军深入，失去粮弹补给。张作霖终于将他打败，郭松龄夫妇双双被俘获打死。

借日本人的势力，张作霖风光起来。日本人希望张作霖不仅成为他们在东北的代理人，而且还把日本的势力带到关外。

北平的冯玉祥，这个辛亥革命以来一向爱国的将领，既是日本人的绊脚石，又是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等军阀的眼中钉。

日本帮助张作霖用军舰把兵运到天津，进而逼近北平。张、吴、阎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冯玉祥。各国驻北平的公使也向冯玉祥施加压力。

不得已，冯玉祥只得退出北平，转道西北。

张作霖进驻北平后，一边镇压革命党人，一边建立自己的“政府”。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自封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好景不长。1928年春，在美国支持下，借国民革命的力量，蒋介石重新当上了“国民军总司令”。4月，他联合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北上攻打张作霖。

这场新老军阀的混战，结果将会如何？田中内阁对此十分关注。日本当然希望能进一步控制张作霖。他们怕张作霖万一被打败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鸡飞蛋打。田中一再指示关东军，形势突变时，关东军要占领沈阳。

这个意图，田中也命令在北平的日本公使芳泽告诉了张作霖。芳泽劝张作霖，千万不要卷入这场战争，应尽快收兵回沈阳，巩固在东北的地盘。

日本人关心的当然不是张作霖，他们关心的是日本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芳泽在劝告张作霖时，还向张作霖提出了日本的进一步要求。

张作霖并没有听日本人的劝告，它卷入了和蒋、冯、阎的战争。事情的结果，却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在发展，奉军只得节节败退。

严峻的现实让张作霖出了一身冷汗。现在他骑虎难下，这一仗要是真的被打败了，回东北是个什么结局？日本人的傀儡真那么好当吗？过去，他是个土匪出身的政客，一切和日本人之间的“密约”对他来说都是权宜之计。要是日本人逼急了，要他兑现过去的承诺，他该怎么办？

张作霖进退两难。推翻过去的承诺，得罪了日本人，日子能好过吗？在过去的路上走下去，他将会成为千夫指、万人骂的卖国贼，在国人面前如何交待？

干脆，他对日本人耍起流氓来。日本人一切要求，他不是一推六二五，就是装聋作哑。或者是死不认帐，或者说他在北平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实际上呢，他还在和英美暗中拉关系。

日本人对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恼火至极。疯狂的日本少壮派军人，不再相信张作霖能成为他在东北的傀儡，他们正在制订除掉张作霖的计划。

这一点，张作霖似乎有所觉察。他怕日本人把自己端掉，终于勉强答应了芳泽公使的劝告，决定返回沈阳。在他离开北平前，芳泽公使又逼他在出卖东北利益的“密约”上签字。张作霖拒不见他，还破口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机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抱着这种矛盾的心理，张作霖离开了北平。

一切都晚了！河本大作大佐早就作了安排，东宫铁男大尉的右手随时准备合上电闸。

张作霖一出发，立即有人把他的出发时间电告河本。6月4日5时20分，张作霖的专车一到，电流立即引爆了皇姑屯老道口的30麻袋黄炸药，张作霖乘坐的望车被炸成几截。

医院里，张作霖断断续续地说：“我受伤太重……恐怕……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

沈阳。”说完就去世了。此时是4月6日9时30分。

小六子就是张学良。张作霖众多子女中，他最喜欢的就是他。此时，他正在邯郸督师。

张作霖的把兄弟张作相对张作霖的死讯秘不发丧，只是秘密电告了张学良，希望他立即回沈阳。

6月18日，张学良化装成伙夫，混杂在铁路工人中间，秘密返回沈阳。路经皇姑屯时，他问起先大帅遇难处在哪儿，手下人指给他看。他铁青着脸，紧咬嘴唇，一声不吭。

一路上，经过不少车站，都有日本兵上车打听，少帅是否在车上。看来，日本人正在密切注视下一个目标——张学良。

三、柳条湖——“9·18”

柳条湖，与其说是湖，不如说是水泡子（即沼泽）。到过沈阳的人都知道，沈阳市内叫“柳”、“边”一类的地方很多。为什么会这样？沈阳曾经是满清发祥地“盛京”，在它的周围，曾经设置过柳条边。

为什么要设柳条边？明朝时，这里叫沈阳卫，它的周围筑上城墙。清朝时，这里叫盛京，它的周围才设立柳条边。《奉天通志》说：“明之筑墙，清之植柳，盖随宜而制也。”可见，柳条边是一条标志清朝发祥地禁区的柳条篱笆。

盛京是当时特殊势力范围，柳条边把满族与其他民族分隔开来，它意在防止满族汉化，保守满族的原有遗风。

清朝被推翻了，柳条边也不复存在了，它只剩下地域的分界线和一些地名功能。柳条湖，大概就得名于此吧。

皇姑屯的爆炸声带来的张作霖死讯，直到张学良回到沈阳才公开。

此时，奉军群龙无首。本来，所有元老中，张作相最有希望继任，但他执意不从，一定要张学良继承父业，自己只当“辅帅”。张作相说服各派，推张学良成为新的东北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毕竟不是张作霖，它面前摆着两条路供他选择：一条是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一条是继续走他父亲的老路，投靠日本。

南京方面一再派大员来劝说，日本人也以种种利诱手段逼他就范。

“易帜”就是废除原先张作霖悬挂的代表北洋军阀政权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表示不再属于北洋政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东北已成为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一个组成部分。

张学良是个热血男儿。皇姑屯事件后，他是国难家仇系于一身。强烈的爱国热情，使他倾向于祖国统一。对东北、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寇的深仇大恨，使之下决心在东北易帜。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

南京方面接到了这只和平的气球。1928年六七月间，蒋介石亲自去北平，与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等人磋商，约定7月24日东北实行易帜。

日本人很快得到这个消息。田中内阁指示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一定要极力阻挠张学良易帜。林久治郎是个老资格的外交官，他多次“拜会”张学良，软硬兼施。7月24日易帜的期限不得不推迟。

8月5日，张作霖葬礼在沈阳举行。

肃穆的灵堂上，来了个不速之客——日本前任驻华大使林权助，他作为日本特使前来“吊唁”。张学良的耳边，出现了一个与灵堂悲哀气氛不相协调的声音：“如违反日本旨意而易帜；则日本惟有取断然态度。”

这不是恫吓吗？张学良悲愤交加，一阵热血涌上心头。他回敬这位日本特使：“我是中国人，希望中国统一。目前东三省人民希望与南京政府实行合作，这不是我个人的私意。”林权助碰了一鼻子灰，却仍不死心。第二天，两人正式会谈时，更是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激烈的言辞，连翻译王家祯都感到为难。

恫吓不行，怎么办？关东军从朝鲜调来大批军队到沈阳，连日举行军事演习。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武力威胁能阻止张学良易帜么？抽刀断水水

更流。越是恫吓，越是威胁，越坚定张学良的易帜决心。他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日旗下，吾亦甘心。”

对日方的蛮演态度，南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希望日本不要干涉中国内部的统一，不要干预东北易帜。日本政府觉得，干预太甚会有损外交形象。于是作贼心虚，只好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利益即不反对。”

12月中旬，南京政府派张群、吴铁城等人到沈阳，送来青天白日旗和任命状。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为副司令长官（驻吉林）；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驻黑龙江）。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并通电全国。东北各地高悬青天白日旗，万众欢腾。

张学良的举动，把日本军界中的少壮派军官给激怒了！

从1929年开始，世界性的经济萧条出现了。纽约股票市场的“黑色星期一”迅速遍及资本主义世界。

日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严重的困境，驱动着日本财阀和军阀的联合。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陆军士官学校，这个日本高级军官的摇篮，如今成了孕育法西斯思想的大本营。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这三个人称少壮“三杰”的第16期毕业生，把“陆士”第15期到第18期毕业的阙外少壮军官组织起来，成立了“二叶会”。

继而，“陆士”第21期到第25期的毕业生组织了“星期四1929年5月”，“二叶会”和“星期四会”合并为“一夕会”。这个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包括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担任大佐军衔的军官和一大批中佐、少佐军衔的军官。关东军头面人物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后来也参加了“一夕会”。

1930年，日本军界更高层次的组织“樱会”成立。

这样的法西斯团体不仅在军内有，军外也有，全国上下多达350多个。他们几乎一致的思想倾向是：

- 急不可耐地要在“满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
- “满蒙”问题用外交方式已无法解决，必须以军事实力驱逐张学良；
- 只有先占领“满蒙”，才能占领整个“支那”，进而称霸亚洲和世界。

1931年6月，以“农学博士”身份到兴安岭“旅行”和“考察”的中村震太郎，在军事禁区被东北军屯垦3团抓住。名为农学考察，他的随带物品中间谍工具应有尽有，如军事地图、望远镜、测绘工具、枪枝等等。

关玉衡团长对他审问。中村态度狂傲，除了自称是“大日本”军官，其他什么都不说。第二次审问时，他索性同监护的官兵对打起来。

关团长忍无可忍：“给我捆倒了打！”一阵拳打脚踢，中村晕倒在地。午夜，中村等4名间谍被秘密处决。

两个月后，日军察觉出蛛丝马迹。8月10日，林久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正式提出抗议。

沈阳城里的日本浪人到处寻衅滋事，各大报连篇累牍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东京，靖国神社。一群青年军官正在此举行中村大尉“慰灵祭”。他们把自己的皮肤割破，用鲜血染成太阳旗，挂在神社前面，又把剩下的血互相喝下去，一片腾腾杀气。

七八月间，朝鲜境内也发生排华事件。他们的借口是“万宝山事件”。日本人曾经煽动一些朝鲜农民在长春县万宝山强占中国人的土地，还在那里开沟种地。当地中国农民要把沟填平，却遭到日本警方开枪射击，当场死伤10多人。平壤排华中，屠杀华侨30多人，重伤100多人，房屋被毁数百所。

关东军早就手发痒了，他们早就想动手了。还在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就制定了在柳条湖爆破铁路的具体计划。中村事件也好，万宝山事件也好，不过是他们蓄意制造出来的借口。

日本外务省风闻关东军要闹事，担心日本外交形象由此遭到破坏。市原外相要求陆军省派人去阻止关东军的过火行动，陆军大臣南次郎立即派陆军省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沈阳。

坂垣一听是建川要来，高兴地大笑起来。原来，建川也是个战争狂。

9月18日晚22时18分。柳条湖的高粱地里，黑沉沉的一片。事变前的夜晚，死一般的寂静。

河本守末中尉带着几名士兵，朝柳条湖方向走去。在离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大约800米的一处铁轨下，河本安上小型炸药。“轰——”，一小段铁轨被炸飞。

听到爆炸声，坂垣征四郎立即以代理军司令官的名义下达命令，集合第29联队和岛本大队向北大营发动了攻势。

23点多，一封内容颠倒黑白的电报送到了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手里：

“18日午后10时半左右，于奉天北面的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同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某部发生冲突。”

这是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以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名义拍发的。

此时，花谷正正与从本土来的建川少将频频举杯呢。

北大营，这是东北军第7旅6800名官兵的驻扎地。

河本在柳条湖引爆炸药那一霎那，日军240毫米的榴弹炮便对准了北大营。在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声中，房屋不断被击塌，草垛上的火势越来越大。顿时硝烟弥漫，火势熊熊。

7旅参谋长赵镇藩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指示：“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赵镇藩觉得不对劲，又给荣臻去电，说日军正步步紧逼，官兵们正在火线上。荣臻坚持说：“这是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题，由你负责。”

荣臻的指示来自张学良，张学良的指示又来自蒋介石。

作为南京政府最高首脑的蒋介石，早在8月上旬，就给张学良发来臭名昭著的《铣电》。电称：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9月12日——“9·18”前一周，张学良又接到密电，要他到石家庄与

蒋介石会晤。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的专车从汉口开来，张的专车从北平开来，两人都未下车，就在专车台拢处开秘密会议。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见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

柳条湖一出事，荣臻立即就向远在北平的张学良打电话。

此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赵媿小姐等在中和茶园观看梅兰芳主演的京剧《宇宙锋》。副官夏宝珠匆匆赶来，说有沈阳长途，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驱车赶回住所协和医院。张学良电示荣臻：“遵照鱼电，令其不事抵抗。谨遵守国际联合会基本原则，无论如何情形，不以武力相报复。”

这一夜，张学良几次请示蒋介石，所得电示都是“不准抵抗”，还说“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了避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日军冲进北大营，如入无人之境，见人就杀。

7旅官兵忍无可忍。620团一面用机枪、步枪还击逼近的日军，一面维护其他部队向东大营操场撤退。溃散之旅，乌合之众一般，十分狼狈。

“蒋介石纯粹是日本鬼子的干儿子，为什么打上门了还不让还手？”

“这是蒋介石想借刀消灭咱东北军呀！”

“老师要活着，日本鬼子就不敢来！”……

队伍中骂骂咧咧不断，一边撤离北大营。军官流涕，士兵呻吟。悲号之声，闻于遐迩。

7旅作鸟兽散。王以哲旅长化装成农民逃入关内，荣臻手侍菜篮，装成买菜的混入人群，逃出沈阳。

“高粱叶子青又青，
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

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

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

‘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这首悲愤的小调，道出了东北百姓悲痛欲绝的痛苦心声。

沈阳沦陷了，长春沦陷了，哈尔滨沦陷了。“不抵抗政策”造成东北三省陷于日寇铁蹄下，张学良也因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四、怪胎：“满洲国”

1931年9月30日，天津，静园。

前清末代皇帝——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临时住在这里。这天，他接到驻津日军司令官香椎浩平的口信，说是要他“到司令部谈一件重要的事”。

溥仪走进客厅，只见有两个人恭恭敬敬地笔直站着。溥仪认得其中那位穿长袍马褂的，他叫罗振玉，前清余孽，当过溥仪的侍读。另一位穿西服的他不认识，后经香椎司令官作介绍，方知他叫上角利一，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的特使。

罗振玉当场交给溥仪一封信。写信的人，是“9·18”东北沦陷后已经当了汉奸的张作相和他的参谋长熙洽。信中说：

“复辟之机已至，于祖先发祥地满洲，在日本之支持下，先行复国，为继续商洽向中原进展之大计，请早发御驾。”

原来，这是让溥仪出发到东北去当“皇帝”的“请表”。

溥仪当皇帝时，才3岁。辛亥革命后退位时，才6岁。怎么当的皇帝，又怎么废的皇帝。一个小孩子，怎么弄得清楚这许多。

溥仪慢慢长大，对世事渐渐了解。他这才知道，大清江山毁于自己手里，将来如何去见列祖列宗。他生活在那班遗老遗少的小圈子中，虽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早就不是皇帝了，可是那班人还用对待皇帝的礼仪对待他。他自己的感觉，始终是自己应该当皇帝，天生就是当皇帝的料。自从废除帝制，天下军阀混战，始终不得太平。在他看来，中国不能没有皇帝，而皇帝就一定是他。

可是，那么多年过去了，虽说生活还算养尊处优，却免不了到处流亡。先从紫禁城被冯玉祥撵出来，住到他父亲的北府去，后经罗振玉牵线，又住进了日本公使馆。以后，他又被日本人挟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

溥仪做梦也想要复辟清朝，他想方设法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势力。吴佩孚曾经上书向他称臣，张作霖也向他磕过头。这些人最终连自己也保不住，哪顾得上他？有些骗子钻他要圆皇帝梦的空子，从他这里骗去不少钱财，到头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机会送上门来了，溥仪当然不愿放过。

11月2日，沈阳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来到天津。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森官这样说过：“土肥原，被中国人叫做‘土匪原’，又被外国人称之为‘东方的劳伦斯’而闻名。据说，凡是土肥原足迹所到之处，必然会引起一场灾难。”

这次，他带来了什么灾难呢？

11月3日夜，土肥原会见了溥仪。后来，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记录了一段当时的对话：

溥：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

土：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溥：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 16 日以前到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

显然，这个“东方的劳伦斯”、中国的“土匪原”正在策划的，是让溥仪到东北去充当日本的傀儡。日本人找傀儡已经费了不少周折了，先是搞“满蒙独立”，没搞成；再就是拉张作霖，也没搞成；逼张学良，反而把他推向了南京方面。现庄，他们找到了溥仪。虽说他是被中国历史早就唾弃了的亡灵，日本国内对他也有不同看法，但阍外少壮派军官要这么做，什么力量也挡不住。

土肥原走后，溥仪身边那些遗老遗少们各种议论都有。溥仪也还没拿定主意。土肥原为了“坚定”溥仪去东北的“决心”，便指挥驻津日军翻译官吉田施了个小计。

一天，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物，其中的水果筐里竟有两颗炸弹。

“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侍从祁继忠慌慌忙忙地跑进来大喊。溥仪听了，吓得在沙发里几乎都要瘫掉了。

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收到恐吓信。其中有一封信说：“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

祁继忠还告诉溥仪另一个“消息”，说住所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溥仪更加紧张起来。

其实，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他十分喜欢的侍从祁继忠，竟是日本特务机关安排的间谍。

11月8日晚，天津海河边，一场骚乱发生了。一伙流氓地痞从日租界冲向省政府和公安局，驻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戒严。

看来，在天津再呆下去凶多吉少，溥仪已成惊弓之鸟。急于复辟大清的心情，加上中了土肥原略施的小计，溥仪同意在日军“保护”下去东北。

11月10日傍晚，祁继忠把溥仪秘密安置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厢里，吉田翻译官坐在后面另一辆车里。所有岗哨见有吉田在督阵，一律免检。两辆车到了一家叫“敷岛料理馆”的日本饭馆后，溥仪象一个玩偶似的，被人穿上一件日本军大衣，又戴上日本军帽。化好装后，换乘另一辆军车被送到英租界一个码头，一艘小汽艇已等候在那儿。

溥仪上船，只见郑孝胥父子、祁继忠、吉田、上角等人都在。小汽艇在十几个日本兵护送下到了大沽口，换乘日本商船“淡经丸”。

3天后，到了营口的满铁码头。溥仪先被安排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翠阁旅馆。以后，又说这一带有土匪出没，迁到旅顺的大和旅馆。

一路上，没有热烈的欢迎场面，没有鲜花，没有掌声，看到的除了日本兵，还是日本兵。这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做法到底是为了什么？到了东北，与世隔绝，形同禁锢。溥仪对此极其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原来，所有这些，都是陆军省和关东军一手策划的。当时的政府、特别是币原外相，极力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认为溥仪形象不好。军部无奈了，只好先把溥仪软禁着，等待时机。

转机终于出现！新的犬养毅内阁产生，他们对军部和关东军所为，取默

许甚至支持的态度。

1932年1月6日，权垣征四郎到东京，向政府汇报有关建立“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构想，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的一致确认。

2月22日，坂垣到旅顺与溥仪会面。

他把一面代表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朝鲜族五个民族的五色旗放在溥仪面前，向溥仪说了未来新国家体制的构想：

国名：满洲国；

元首称号：执政；

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

年号：大同；

首都：长春，改称“新京”；

新国家的政治：民本主义。

溥仪问：“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坂垣不紧不慢地答道：“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溥仪一听，差点没跳起来。他满心希望的大清复辟转眼成泡影了。他大声叫起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皇帝称谓问题，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他为什么这样激动？后来，他写下他当时的心情说：“‘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000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

坂垣一看，遇到了麻烦。他又拿出另一个“法宝”：“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要，就不用这个字眼。这是共和制，是执政制。所谓执政，不过是过度而已。将来成立议会后，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法。”

一听“议会”二字，溥仪脸上就象被一只滚烫的红薯灼了一下似的。万万没想到，他这个“皇帝”还要经“议会”点头认可。他连连摇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

争了3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坂垣把脸沉下来：“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第二天早晨，坂垣给郑孝胥、罗振玉扔下的竟是这句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溥仪一听，傻了！他和他的臣下们想到了张作霖的下场，脊梁骨都冰凉了。

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溥仪只好让步。他说：“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这样，他抱着复辟大清的希望，横下一条心，先当起汉奸来再说。

一阵紧锣密鼓的幕后策划，“满洲国”这出丑剧要开演了。

2月18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宣言，妄称东北已脱离中国而“独立”。

2月19日，“全满建国促运大会”决定，“敦请”溥仪出任“执政”。

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代表”前来向溥仪“请驾”。溥仪仿照历代帝王的传统，要忸怩“谦虚”一番，“推辞”不受。

3月4日，“代表”二次“请驾”，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

3月5日，内定“满洲国”“议长”张景惠等人第三次“请驾”，溥仪才接受“执政”之职。

3月6日，“满洲国”人事安排定局，溥仪在出卖东北主权的文件上签字。

3月8日，溥仪“起驾”，乘火车从旅顺到达长春。车站上，军乐队吹打打。前来“迎驾”的，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装的，也有穿和服的。这种“热烈欢迎”的场面，把溥仪弄得晕头转向，自我感觉大清复辟还是有“希望”的。

3月9日。“满洲国”“建国”暨“执政就职”仪式在前吉长道尹衙门一间大厅举行。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以及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内田康哉、森岛守人等日本军政当局头面人物，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等汉奸，以及清室余孽、蒙古王公等参加。

溥仪身穿西式大礼服，不伦不类，目光呆滞地站着。张景惠、臧式毅“代表”“满洲”民众献上“执政印”。郑孝胥代表溥仪宣读“执政宣言”。满铁总裁内田致“祝词”，罗振玉代表溥仪致“答词”。

众人又来到院子里，升起了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满洲国”五色旗。

不管溥仪愿不愿意，他已正式成为日本傀儡政权之首，成为头号汉奸。

两年后的1934年，为使“满洲国”更具有“王道国家”色彩，日本又决定把国名改为“满洲帝国”。“执政”改名为“皇帝”，国号改为“康德”。溥仪的皇帝梦算是实现了。

3月1日，美国20世纪福克斯公司在当时“满洲帝国”首都新京（长春）郊外的杏花村拍摄下了溥仪正式当“皇帝”的登极大典情景。

溥仪身穿清朝皇帝即位时的传统服装——龙袍，出席皇帝即位的“郊祭仪式”。尔后，又按关东军规定，身穿“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眼，在“勤民楼”举行即位典礼。

连登极大典上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自己作主了，这样的“皇帝”算是个什么“皇帝”呢？溥仪后来写道：

“所谓的‘满洲国’对皇帝和清朝的旧臣而言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利用关东军实现清朝复辟，关东军利用我们实行日本的政治目的。这就是‘满洲国’。”

这种“皇帝”，大概在历史上还没有过吧。

第二章 卢沟桥的怒火

一、义勇军：白山黑水间的幽灵

难忘的“9·18”，日本垂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东北，终于沦陷了。3000万同胞或遭杀害，或遭蹂躏；4000多公里的铁路线，无数的财富宝藏被掠夺。这是我东北同胞的深仇大恨，这是我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东北的父老乡亲不会甘心当亡国奴，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奋起救亡。义勇军，不仅是活跃在东北最早的抗日武装，也是全国范围最早的抗日队伍。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首家喻户晓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早已响遍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早已成为我们年轻共和国的雄壮国歌。这首充满中华国魂、军魂的战歌，不由再次把我们带到了抗日初期的东北战场，把我们带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别人都叫他亮山，知道他真名的人并不多，他的真名叫刘存居，因为身材矮小，秃顶，乡人都叫他“亮山”。别看他其貌不扬，打起仗来却是一把好手。

1932年1月，隆冬腊月，锦西大地还铺盖着皑皑白雪。可是，侵占锦州的日军嘉村旅团第27骑兵联队，却不顾天寒地冻，向锦西进犯。

亮山以他原有200人武装为基础，又联络了许多村子的民团，组成一支抗日大队，大伙推他为大队长。当晚，亮山的队伍把锦西县城团团包围起来。

日军联队长古贺侍太郎见自己被义勇军团团围住，便要锦州方面派出紧急增援部队。援军刚出动，却被义勇军拦截。古贺被围得狗急跳墙，终于在1月9日率队出城，企图突围。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着一队骑兵，耀武扬威地来到龙王庙附近，正中亮山部署伏兵的袭击。

“打！”一声令下，枪声齐发。日军骑兵被打得人仰马翻，四处逃窜，小队队长石野当场被击毙，三面受敌的日军步兵见骑兵逃窜，慌忙抢夺龙王庙西面高地。

古贺进退维谷。突然听到报告，说归路已被切断，县城也受义勇军袭击，便赶紧率残兵往回撤。

“哪来的野种在这横行霸道，今天叫你们尝尝爷爷的黑枣！”冤家路窄，亮山这时正等候在古贺回撤的必经之路——西园子村一个炮楼上。他料到古贺会从这杀路上撤，便先把这个炮楼端了，在此正等着古贺呢。只听枪声大作，鬼子纷纷落马。古贺的左肩、腰部都被打穿，一头栽下马来，两个副官也被击毙。

鬼子招架不住，只得以攻为守，他们点燃了高粱秸火烧炮楼，趁炮楼内火药引爆，十几个鬼子才抬着古贺血肉模糊的尸体，狼狈逃回城里。

这边古贺遭伏兵袭击，那边松原小队队长带领的运输兵去锦州运给养。当这32个日军、5辆大车一到钱搭子屯东岭，也遭到亮山队伍的袭击，附近村庄民众也前来助战。

战斗很快就解决了。松原小队氏等32名日军全部被歼。缴获轻机枪1

挺，三八式马枪 28 支，马刀多把，大车 5 辆，军马 19 匹、弹药数箱、毛毯 20 多条，还有饼干、罐头等。

锦西之战，对日寇震动极大。后来，他们说起这一仗还心有余悸，说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王德林，这个山东汉子，早在甲午战争后就告别乡亲独闯关东了。1901 年，他曾拉起队伍，抗击入侵东北的沙俄。

“9·18”事件时，他是东北军驻吉林延吉镇的 27 旅 3 营营长。1931 年底旅长吉兴投靠了汉奸熙洽。王德林在吉兴的司令部里，见日本人向吉兴告黑状，当面就给这几个日本人几记耳光。知道此事的人无不为之竖起大拇指，连说“有种”。不久，他的队伍接纳了中共地下中心县委派来工作的干部，还接纳了好几名爱国大学生，他本人的水平也大有长进。

冬去春来。1932 年的元宵节刚过，刚刚担任“中国国民救国军”（“义勇军”的一支）总指挥的王德林，便决定趁日军主力推进锦州、黑龙江，暂时无暇东顾之时，拿下敦化县城。

敦化位于长白山北侧，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是日寇经营下的吉会铁路中心。拿下敦化，既可控制铁路，又可为救国军夺取有利地盘。

这天清晨 6 时，攻势开始，只见补充团的勇士用云梯越过城墙，打开城门，部队蜂拥而入。巷战 1 小时后，日军已守不住，救国军很快就占领了县城。日军退到城外山地，架起迫击炮轰击县城。救国军出城追击，残敌逃遁。

初战告捷，消灭日军 30 多人，缴获武器甚多。

日寇并不死心。驻哈尔滨的天野旅团闻讯后，立即拉起队伍由中东铁路推进，企图卷土重来。

王德林得到情报后，亲手率领一个团，星夜赶到海林车站，重创天野旅团，击毙 84 人，烧毁了日寇准备修铁路和牡丹江铁桥用的大量器材和工具。

天野旅团不甘失败，其主力 600 余人尾随救国军进入山崖路，埋伏在此的补充团待敌靠近后，火力齐发，毙敌众多，但消耗也较大。

日军另一支援军铃木旅团的一个支队也在佯攻山崖路，但他们的目标是以诱敌打援策略袭击救国军后方基地。此计被救国军识破，双方交火后，救国军将计就计，在靠近后方基地的南湖头附近设伏，日寇遭到救国军埋伏。赶来增援的日军在松乙沟也陷入火网。无奈，日军使出最后一招，动用了 3 架飞机救援，这才得以突围。这一仗，毙敌 130 多人。

次日，日军又重新集结队伍分进南湖头。开始时敌强我弱，安宁市城被日军占领。待王德林弄清情况后，于一周以后，突然袭击安宁日军。这一仗，使铃木、天野两旅团损失惨重。铃木本人只得仓皇乘火车逃往哈尔滨。天野也急忙乘飞机逃走。双方陷入残酷的阵地肉搏，此时救国军援军赶到，如虎添翼，日军仓皇逃窜。

沈阳，东北最重要的中心城市，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

1932 年 2 月，为阻止日寇拼凑“满洲国”，辽宁义勇军多支队伍，决定联合发动一次袭击沈阳城的义举。

3 月 9 日夜晚，华灯初上的沈阳城，虽然比不上哈尔滨那么繁华雅致，却也正是灯红酒绿之时，日寇想不到，这时竟有多支义勇军部队化装进驻了城内多个据点。

10 日清晨，一支义勇军化装成伪军游击队，混过防守北大门的伪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伪警察局第 8 分局，毙伤伪警察数十人。另

一支义勇军打到太清宫，与奉天警备队、日本守备队展开巷战。

火药味越来越浓，城内气氛紧张起来。因为事先安排不周，有几支义勇军未按时到位，只能撤军。即便这样，城内日伪也为之多日惊魂不定。

半年以后的8月份，关东军司令官换人，武藤信义接替本庄繁。

武藤一到沈阳，就风闻义勇军要进攻抚顺，急忙派兵增援，城内守备空虚。义勇军第21路军司令赵殿良认为，这是再攻沈阳的好机会。

8月28日晚，战斗打响。

23时30分，城内一路首先攻入大东航空处（沈阳机场）。机场内应带领义勇军用汽油点燃了飞机库，顿时，火光冲天，枪声大作，7架飞机被毁。

紧接着，电台被破坏，讲武堂被占领。城北，义勇军趁势攻入城内。日伪建筑多处被烧，到处燃起熊熊烈焰。

城外，义勇军与日本守备队、大批伪军展开激战。日军出于无奈，开出大批坦克，这才稍占上风。

日军的惨败是无疑的。第二天，武藤信义奏报日本政府，请求增兵。陆军大臣荒木9月1日在众议院报告中说：“自7月下旬至8月下旬，各地被袭击35次以上，其中奉天两次被攻，一袭飞机场，二袭兵工厂……”。

这下，沈阳城里的日军成了惊弓之鸟了。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马贼（指义勇军）的枪一响，日本兵一个的死；马贼的枪两响，日本兵两个的死。”

神经高度紧张，个个草木皆兵。

一滴水见太阳。

上面几朵小小的浪花，从不同侧面，向我们展现了义勇军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悲壮战绩。

义勇军从她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在内无粮饷、外无援兵的艰苦环境中求生存的。最高潮时，总兵力也仅仅达到30万人而已。从兴起、发展到失败，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他们面对的是数倍、几十倍于己的日伪军。他们所处的是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但他们的义举，给国难当头的全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鼓舞。

从日伪官方报告看，从“9·18”事变到1938年2月，东北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7名，双方交战平均每月达1500多次，每次死亡平均达73人。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国内的日军尸首，每月平均50具左右。由此可看到义勇军的赫赫战果。

1934年后，虽说义勇军已不复存在，但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却在逐步壮大。在他们的行列中，出现了杨靖宇、罗登贤、李兆麟、魏拯民、赵尚志、陈翰章、赵一曼等一大批杰出的抗日英雄，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垂青史。

二、“1·28”的炮声

1932年1月28日傍晚，上海东北角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

静悄悄的马路上，不时听到几声“笃、笃”的敲打声。顺着声响寻去，便可看到5个和尚打扮的人在路上行走。他们手敲扁鼓，走走停停，不时四处窥视。这5个日本僧人，为首的是天崎居升、水上秀雄，另外3个分别叫藤井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

三友实业社是上海的著名国货工业，他们以生产三角牌毛巾质优价廉而闻名。“9·18”以后，这个厂的工友自动组织了义勇军，每日操练，情绪高昂。

这几个和尚鬼鬼祟祟的不寻常举动，引起了工人义勇军的注意。他们马上派人盯上了这些和尚。和尚见有人跟踪，便奔跑起来。当他们跑到赵家巷附近时，工人拦住他们盘问。

就在这一刹那间，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了三友社工人行列。他们挥动着的拳头，雨点般地朝和尚身上打来，有的还捡起路边的地界石朝和尚猛砸。几个和尚被打伤，有3人立即逃到不远处的由日本人办的东华纱厂。其中有一人因伤重后来死去。那批不明身份的“工人”打人后即逃之夭夭。

这件轰动上海滩的“日僧事件”，成为“1·28”事件的导火线。

“日僧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

川岛芳子，原名金壁辉，是清朝皇族肃亲王的女儿。6岁那年，辛亥革命爆发，她失去了贵族地位。不久就成为日本特务川岛浪速的养女，到日本信州高等女校接受教育。

她的特殊经历、特长、活动能力，立即引起了日本军方的注意。军方专门对她进行了特务训练，使她学会了射击、骑马等多项技能。

1927年11月，日本策划“满蒙独立”。川岛芳子被派回国，安排她与蒙古王公之子甘珠尔察布结婚，以控制这个傀儡。不料，事未成功，皇姑屯炸车案使世界舆论大哗，“满蒙独立”运动随之夭折。川岛芳子与甘珠尔察布的婚姻关系立即解除，回到日本。“9·18”事件前后，她受日本间谍机关指派再次来华。

1932年，关东军要在东北策划炮制“满洲国”。为掩人耳目，转移国际视线，坂本征四郎找到上海的田中隆吉，给他20000日元活动费，要他制造一个日本向上海出兵的借口。要做这件事，田中自然想到了川岛芳子。

上海，东方大都会，冒险家的乐园。

上海的许多场合，经常会出现一名神秘的女郎。她风流潇洒，娇小玲珑。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男人一见，魂魄都会给她勾去。她一会儿女扮男装，一会儿袒胸露臂；一会儿是侠客，一会儿又是舞女。政界要人的沙龙里，学校严肃的课堂上，军队森严的兵营里，青红帮充满杀气的据点里，经常可以看到她不时出入的身影。

这时的川岛芳子，26岁，正在走向成熟和老到。她在社会各界的频繁活动、广泛接触中，主要是搜集情报，其次是组织破坏、收买汉奸、散布谣言。她刺探的情报准确性之高，连日军驻上海的头目白川义则、冈村宁次等人也

大为赞赏。

“日僧事件”是川岛芳子制造出兵上海借口的第一步。

这几个和尚是日本“日莲宗”一派的。日莲宗，是中国佛教中法华教流传到日本后演变而来的一支佛教流派。它的右翼以专门从事暗杀活动而闻名。川岛芳子利用这伙人去“点火”，那些冒充“工人”的，是她收买的汉奸。

三友实业社的反日情绪，早就引起在上海的日本人的注意和不满。本来，日商东华纱厂生产的铁锚牌毛巾就竞争不过三友社的三角牌毛巾，双方积怨已久。“9·18”后，三友社工人组织义勇军，更引起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仇视。川岛芳子选在这里肇事是早有预谋的。

第二步，他们利用“日僧事件”火烧三友厂，把事情闹大。

1月20日晨2时，“日本人青年同志会”70多人，气势汹汹地前往三友实业社“报复”。当他们路经临青路时，值勤的华人巡捕上前劝阻，他们立即就动手打人。华捕田润生当场被打死，华捕朱伍兰打电话报警，那只握听筒的手被砍掉三个指头。

三友实业社的周围篱笆都被撬开，他们把汽油、煤油浇到工厂板壁上点火，立即火势冲天。还嫌不够，又用手榴弹轰炸方才罢手。

第三步，当天下午，他们在公共租界日本人俱乐部三楼开会，要求日本当局和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出兵干涉以“保护侨民。”

会后，1000多名暴徒手持棍棒，在海军陆战队掩护下，气焰嚣张地在吴淞路、北四川路一带游行示威。沿途不少商店被他们用棍棒捣毁，电车也被他们阻拦，值勤的巡捕再次被殴打。

这个“三步曲”唱完，上海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关东军策划的日军进攻上海的借口终于制造出来了。

1月23日。龙华警备司令部。

19路军和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官长都在这里，其中有总指挥蒋光鼐、19路军军长蔡廷锴、警备司令戴戟和所属各部队的长官。

目光冷峻的蔡廷锴军长站起来，扫了大家一眼，用低沉坚毅的语调对大家说：“日本人这几天在上海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滋扰，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兄弟只有决心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共死。”

戴戟司令当众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等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最后，蒋光鼐总指挥训示：“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我们明知物质上不是日寇的对手，但是这种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当天，一份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4位将军签署的告19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流传在广大官兵之间，19路军将士的热血沸腾了。这份文告说：

“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劫不复之惨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

“我们为紧急应付起见，只有以我们爱国热血染成我们最后一片光荣的历史。只有把我们殉国精神葬在四万万未死尽的人们心坎里，我们没有回顾，

我们不管成败利钝，一刀一枪，死而后已！”

“自由之神已鸣，救死之血正沸，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资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哥哥们，弟弟们！冲锋吧！我们要永永远远在血泊中求最后的生存与胜利，我们来高呼：杀！杀！杀！”

中华民族从来是不可侮的！19路军的官兵全体动员起来了，他们抱着随时战死战场的决心，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迎击来犯之敌。

日本加紧了侵犯上海的准备。

“日僧事件”刚发生，日本第一遣外司令官盐泽幸一就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4项要求。吴铁成卑躬屈膝，全部接受这些无理要求。但是，紧张空气并未缓解，形势更加严峻。

1月23日晚，停在吴淞港外的日本轻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特别陆战队457人到上海。

1月24日，日本水上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到上海。

1月28日20时，盐泽幸一又提出进一步无理要求，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四川路并平毁工事，由日军进驻。

21时30分，部分日军登陆，他们和原来就在租界的海军陆战队会合后，趁着夜色向天通庵火车站集结。

23时30分，盐泽幸一下令进犯上海北火车站，准备以此切断中国守军的军事运输，并扩大租界外地盘。

“1·28”淞沪战争终于爆发！

盐泽幸一曾经叫嚣：“上海一旦发生战争，4小时即可了事。”

事实呢？从1月28日夜，一直到3月3日，松沪战争历时33天，其间曾3次调换指挥官。

闸北战役：盐泽幸一被撤职！

一阵枪声划破夜空。1月28日晚11时30分，从天通庵火车站开始的闸北战役打响。北四川路、虬江路等北火车站的周围地区也跟着打响。日军以20多辆铁甲车开路，向19路军阵地展开全面进攻。

要打破进攻之敌，先要解决这该死的铁甲车，战士们组成敢死队，潜伏在马路两旁的商店里。铁甲车吼叫着开了过来，敢死队员便瞄准车底投弹，铁甲车瘫痪了，后面的步兵失去了屏障。用这个办法，日军的几次猛攻都没有成功。

逼急了的日军于29日凌晨2时发起反扑。他们纵火焚烧沿街商店和民宅，趁着大火包抄北火车站。眼看车站要被日军占领了，前线指挥翁照垣旅长急调援兵，几小时交火后，双方进入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在刺刀相见之下，我们的战士个个不怕死，日军却极其懦弱。北火车站失而复得。

一夜奋战，闸北战役告捷，19路军摧毁敌铁甲车3辆，击落飞机1架，击伤2架，毙敌数百人，但自己伤亡也多达600多人。

英、法、美等国领事出面调停。双方达成停战3天的协议。由于屡战屡败，盐泽幸一被撤职！

吴淞蕴藻浜战役：野村吉三郎被替换！

2月6日，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幸一指挥淞沪战争。他和他的前任一样狂妄，声称“请诸君拭目以观，届时即可结束华北之抵抗”。他重点进攻的

目标是吴淞和江湾，同时包抄闸北 19 路军后方。

吴淞，长江与黄浦江的交汇处，这是上海通向外洋的必经水道。吴淞炮台南面吴淞镇，镇前有一条小河，这就是蕴藻浜。野村决定先拿下吴淞和蕴藻浜，以取得作战的主动权。7 日凌晨，10 多架日军飞机到 19 路军吴淞阵地狂轰滥炸，以掩护 2000 多陆军分两路向吴淞、蕴藻浜进攻。10 时左右，停在吴淞港外的 24 艘日舰向我军阵地开炮，日军趁势向蕴藻浜车站发起冲锋。

炮火重压，硝烟弥漫，明显的敌强我弱，造成正面战场上我军伤亡极大。守卫车站的 19 路军 78 师 156 旅 4 团 8 连连长赵全声灵机一动：对面的房顶不是很好的制高点吗？他一面阻击敌进军，一面率余部绕出车站，从南端民房占领制高点。从高处突如其来的火力使日军顿时大乱，前后被隔开的两部分日军互相开火，自相残杀，直到中午 12 时，硝烟中能见度增加，日军明白过来才告溃退。

下午 2 时，日本援军混成 24 旅团 6000 多人，在飞机和炮舰掩护下到达上海，他们在我军未加设防的张华滨铁路码头登陆，并从蕴藻浜南岸准备攻占吴淞炮台。

飞机和炮舰固然是他们的优势，但夺取阵地最终还得靠白刃肉搏。我 19 路军大刀队声势夺人，因而日军 10 多次进攻均被打退。

白天打不进来，日军准备晚上偷袭。13 日凌晨，日军趁着夜幕未散，3 次架设浮桥竹筏，企图偷渡蕴藻浜，两次都未成功。第 3 次进攻时，他们借助烟幕弹和炮火掩护，终于偷渡成功。

坚守阵地的是 19 路军 61 师 12 旅的官兵。他们多次冲锋，击退上岸之敌。但是，敌军越来越多，白天正面交锋伤亡极大。

你能夜里干，我也能。指挥作战的张炎副师长当天晚上率两个营的兵力偷袭日军营地。酣睡中的日军惊醒，惊慌失措，争先恐后从蕴藻浜渡回。

南岸敌军听到枪声，以为我们要渡河夜袭，于是以猛烈炮火轰击北岸，两岸敌军在黑夜中自相残杀。这一仗，偷渡日军伤亡 2000 多人。

野村的战绩不比盐泽好多少，终于在战败当天为植田谦吉中将取而代之。

庙行、江湾战役：植田谦吉再次受挫！

19 路军英勇抗击日寇的壮举，得到了全国人民有力支持。当时“在野”的蒋介石也通电赞扬 19 路军将士，表示“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

2 月初，当时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要求去上海作战。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将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的 87、88 两个师、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独立炮兵 1 团火炮营等合编为第 5 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开赴上海作战。第 5 军由蒋光鼐总指挥统一指挥。日本最精锐部队之一——陆军第 9 师团 10000 多人增援来上海后，植田谦吉计划从闸北到吴淞全线进攻，以分散我军主力，然后重点在江湾、庙行一带切断 19 路军和 5 军联系，再各个击破。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阵地战，双方都投入了所能投入的全部兵力。

20 日晨，日军由吴淞、庙行、江湾至闸北全线进攻，主力集结于江湾。7 时起，日军以 10 多架飞机和多门大炮猛烈轰炸江湾镇我军阵地。2000 多步兵在 10 多辆坦克掩护下分三路逼近江湾镇。日军多次猛烈冲锋，均为我江湾守军凭借战壕、工事所击退。21 日，日军进攻更加激烈，双方伤亡消耗都很

大，但江湾我军阵地岿然不动。

22日，日军见江湾阵地无法突破，便以主力集中攻击江湾西北庙行镇的5军阵地。5军88师527团3营阵地的防御工事全部被炮火摧毁，阵地一度失守。

张治中军长下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全力增援，令蕴藻浜北岸的88师261旅宋希濂旅长抄袭日军侧背。19路军蔡廷锴军长也急令61师张炎副师长率两个团出击。

我军全线反击后，日军三面受敌，仓皇溃退，傍晚，经过最后的肉搏战，我军阵地转危为安。

25日以后，敌重心转为江湾与庙行之间阵地。一连数日，日军飞机接连轰炸，江湾全镇成为一片焦土，尸横遍野，河汉一片腥臭。在阵地摧毁，我军不得不移师附近情况下，仍击退敌军10多次冲锋。87师155旅、122旅发起了反攻，再次短兵相接，终于收复阵地。

三次换马，三次战败，恰逢此时，我军敢死队员冒死潜入海中，日军旗舰“出云号”被炸。

日军再次换马，任命白川义则大将为派遣军司令官，并增派陆军第11、14两个师团和海军大批飞机参战，企图尽快结束上海战事。

当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却不愿继续向淞沪前线增兵。日军总兵力已达7万，我军却不足4万。

敌我力量的过分悬殊，使得3月1日浏河苦战中，我军在将被敌包围的危险面前不得不退至第二道防线。

葛隆镇、娄塘，这是位于嘉定、太仓之间我军第二道防线的外围。

3月3日，日军大部队再次企图包抄我军。张治中军长一面急令5军87师259旅517团奋起抵抗，一面调独立团火速增援。葛隆镇、娄塘一带的突围成功，我军主力由此从第二道防线退至远离市区的第三道防线。

“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后巡。曾经日月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食！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令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小儿啼，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需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指蕴藻浜），洒遍英雄泪。何必气短又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这是葛隆镇战役中阵亡的营长朱耀章在战场上留下的最后诗作，震人魂魄，催人泪下。

19路军和5军不得不退出上海市区，国际联盟也开始讨论淞沪战事。3月3日，白川义则宣布停战。5月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后签订了屈辱的停战协定。

白川义则笑了。他们要以这个胜利来庆祝象征天皇长寿的天长节。

4月29日，白川在检阅部队之后，来到虹口公园，参加庆祝会，正当庆祝会锣鼓喧天，达到高潮时，人群中有人向主宾席扔来一颗炸弹，得意忘形的白川义则当场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炸成重伤，成了终生残疾。

扔炸弹的人叫尹奉吉，韩国人。“1·28”时他来上海，早就想和日本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不料他到上海时已经停战。他就用这个炸弹狠狠教训了日寇。

尹奉吉还没来得及引爆另一颗准备自杀的炸弹，就被逮捕了，不久被杀害于日本大阪。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尹奉吉忠骨运抵釜山，韩国临时政府领袖金九和无数普通百姓隆重迎灵。从釜山到汉城，沿途无数的人焚香祭拜。

三、兵谏西安

华清池，以温泉著名，位于陕西临潼附近。

2800多年前，西周幽王在此建立“骊宫”，著名典故“烽火戏诸侯”大概就在这里。秦代，这里砌筑汤池，取名叫“骊山汤”。西汉武帝时，这里筑离宫，唐玄宗时，整个骊山环山建起宫殿群，外围筑起城墙。天宝6年，这里正式更命为“华清池”。

华清池内外是两个世界，唐代诗圣杜甫于天宝年间回乡省亲，经过此地，感叹系之，写下不朽诗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才古咫尺，惆怅再难述。”

五代以后，长安不再是都城，华清池也失去了昔日的荣耀。

谁知，1936年12月12日，沉寂了一千多年的华清池竟再次成为中外政坛和舆论瞩目的中心。

这天凌晨5时许，张学良将军属下东北军一个连的亲信卫士乘着汽车来到华清池。霎时间，枪声大作。这些卫士首先冲进外院，迅速解除了守卫在此的宪兵的武装。接着又冲进内院，负责保卫的二三十名卫士不是死伤，就是被俘。

原来，这里是蒋介石来西安的临时行辕。

睡在华清池内院最后一排房内的蒋介石被枪声惊醒，他以为是共产党和红军来袭，来不及穿衣穿鞋，就披着睡衣，光着袜子逃出来，准备从后面院墙逃跑。

这里借山势砌筑的院墙，里面看很矮，外面却很高。黑暗中，他从墙上摔到了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梁骨摔伤了，腿也跛了，只好在靠山崖形成的一个夹缝里躲避。

负责带队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等人在搜山中终于找到了蒋介石。不由分说，连拖带架，把他架上一辆汽车，押送到张学良与西安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联合组成的总指挥部——西安新城大楼。这个过程前后不过4小时。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由来已久，根子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不抵抗政策”把张学良、杨虎城逼上了“兵谏”的道路。

“9·18”事变使张学良蒙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难家仇使张学良痛心疾首。1933年3月，东北军下属汤玉麟丢盔弃甲，致使热河沦陷，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使张学良处境艰难，引咎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之职，转而出国考察。

在国外考察中，张学良接受了意大利、德国狂热吹捧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回国后，他也多次表示希望能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蒋介石利用他这一点；派他率东北军去西北“剿杀”共产党。

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的对立早在20年代就开始了。

作为英美势力和上海江浙财团的代言人，蒋介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逐渐暴露出反对大革命、仇视共产党人的右派立场。1927年他在上海制造的那场鲜血淋漓的“4·12”大屠杀，使国、共两党的对立激化到顶点。因此，内战一打就是近10年。

“9·18”以来，日寇铁蹄大肆践踏我大好河山，作为中央政府统帅，蒋介石本应改弦更张。可是，他打的旗号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他

可以一再推行“不抵抗政策”，对共产党和红军，从对江西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到对红军长征的围、迫、堵、截，那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张学良不能洞悉国共之间矛盾的由来。他认为按法西斯主义理论实行“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能够改变中国一盘散沙的弱国现状。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派东北军去“剿共”，既可杀伤共产党，又可杀伤杂牌军。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张学良当然不会从深层次这样想。

果然，东北军到陕北“剿共”中，整师整师的兵力被红军歼灭，损失极为惨重。

1935年10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他向蒋介石请求补充武器给养，还要给两位阵亡师长特别抚恤，设想到，蒋介石同意特恤，却撤销了这两个师的番号。

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着实不小。中国到底能不能实行法西斯主义？他如此死心追随“领袖”有无意义？张学良带着这些疑问，陷入了无比痛苦之中。

上海，一家幽静的咖啡馆里，有两个人对视而坐，娓娓交谈。在这里，张学良秘密会见了老朋友杜重远。杜重远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学识渊博，头脑清醒。

杜重远要张学良认清当前的主要危机是民族危亡，只有消灭日寇，才能有中国的根本前途。

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茅塞顿开，国难家仇再度涌上心头。

恰逢此时，张学良接到了共产党方面飘来的气球。

1935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确定，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中心任务。

1936年1月，毛泽东等20名红军将领表示，愿意和东北军联合抗日。

它不仅是宣言，更重要的是行动。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被红军包围好几个月，弹尽粮绝，红军完全能消灭他们，却主动撤了围。好几次大的战役中，几千名东北军官兵被俘，却受到了红军的礼遇。

这天，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又放了回来，他要求见张学良。

高：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我这次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

张：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

高：报告副司令，我要怕死就不回来干这种事。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消灭完了，更有什么理由还要去再打人家？

张：你回来很好，你说得很好，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很好，现在我们坐下来好好地谈。

就这样，高福源充当了红军与东北军联络的信使。

1936年2月，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举行了秘密的正式谈判。

4月9日，在延安一所教堂里，张学良与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举行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秘密会见。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

共产党原来的方针是“反蒋抗日”，张学良不同意。他说：“我们正愁抗日力量不够呢，为什么反而把最大的力量抛开？我们应当想办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把这个意见带给了中共中央。不久，中共决定改“反蒋抗日”的方针为“逼蒋抗日”的方针。

杨虎城从小家里很苦，辛亥革命后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北伐战争前后，他和共产党有过短暂合作。他当陕西省主席时，请共产党人南汉宸当他的秘书长。1930年他率17路军进驻西安后，蒋介石撤了他的省主席职务，还逼他去“剿杀”红军。他手下三个旅不到半年全部被歼。

痛苦和事实使他也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1935年11月，中共中央派汪锋秘密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

1936年5月，在共产党通过高崇民、杨明轩等进步人士沟通关系基础上，杨虎城去洛川，表面是向张学良汇报“剿匪”事宜，实际上是和张学良秘密谈判。张、杨达成默契，今后一致不打内战、联共抗日。

张、杨行动的蛛丝马迹，终于为蒋介石察觉。

1936年10月初，蒋介石到达西安，此行目的是要给张、杨施加压力，推行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杨却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一定要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

从西安到洛阳，再从洛阳到西安。张学良利用他所能利用的一切机会向蒋介石进谏，争取他抗日。蒋介石大动肝火，动不动就把他训一顿。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以“哭谏”方式同蒋介石争辩达3个小时之久，最后，蒋拍案而起：“你现在就是拿手枪将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哭谏”不成，怎么办？

12月8日，张、杨秘密商量对策：

张：国势危机到此，我们的爱国心愿不能为上峰所采纳，西北人民又是这样地责备我们，你看怎么办？

杨：副司令领导怎么办，就怎么办。我是跟着副司令走一路的。

张：我们既不能卸责，就不能不执行民众的意志，用非常举动，以武力迎接蒋委员长来西安，脱离南京方面亲日派的包围，听我们的救国主张。

杨：好！

12月9日，西安学生2万多人游行，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

蒋凶相毕露。他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制止学生去华清池。如果学生不服，要“以武力弹压”，“以机关枪扫射”。张学良怕学生吃亏，便驾着汽车前去阻拦。他面对学生慷慨陈词：

“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爱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请你们大家相信，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

用“事实答复”，什么事实？就是“兵谏”。果然，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街头热闹非凡，到处可听到“看号外！”“看号外！”“蒋介石被捉住了！”的喊声。人们争相传阅张、杨的通电，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整

个西安变成了欢腾的海洋。

南京。何应钦当天召集紧急会议。亲日派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他们打着“讨逆”旗号，下令在潼关结集20多个师，派大队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渭南、三原等地遭到轰炸。

上海。以蒋夫人宋美龄为首的英美派，急于主张设法营救蒋介石。她当天回到南京，找何应钦大吵大闹，何应钦大发脾气：“你妇人家懂得什么国家的事，只知营救丈夫而已。”宋美龄大骂他是“东方佛朗哥”。

东京。内阁连连开会，讨论西安事变。并指示关东军发表声明，支持南京“反共”。

陕西，保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无线电波把张、杨的“通电”和张、杨邀请中共代表团去西安的信息，送到了毛泽东的炕桌上。

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刚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还不到两年的高大汉子，此时正边看电报边思考。警卫员进来送开水，毛泽东叫住了他：“贺清华，告诉你一个消息，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抓住了。”

贺清华一听，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消息很快传开了，红军中不少人半夜起来，兴奋地跳起舞来，唱起歌来，一直热闹了大半夜。

毛泽东的办公室彻夜通明。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人都在这里开会。张国焘提出，要“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这的确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他打了个生动的比喻，他说：“陕北毛驴很多，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就用争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他，推他，再不干就打他。”

会议的结果，决定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由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中共代表团和红军代表团，前往西安参加谈判。

12月14日，空中飘着鹅毛大雪。毛泽东冒着雪欢送自己的战友。周恩来率代表团骑着骏马，顶着大风，沿着积雪，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去延安，再从延安乘飞机去西安。

同一天下午4时，西安上空发现一架飞机盘旋飞行。一会儿，飞机投下一只信筒，里面装着端纳给张学良的信。

端纳是美国人，当过张学良的顾问，此时应宋美龄之邀，作为信使访问西安。按照信中约定，机场燃起三堆篝火。端纳下飞机时，天已快黑了。

端纳给蒋介石带来了宋美龄的信，信中劝他要理解张、杨的举动，说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信的最后说：“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百戏。”

蒋介石深知“戏中百戏”指的是什么。要是中国一旦陷入内战，他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将不堪设想。回过头想想，张、杨不过是要他抗日，并无其他意图，在西安不会有生命危险。这样，他一面写条子命令何应钦停止进攻，一面考虑与张、杨谈判。

蒋介石同意谈判了。究竟怎么谈，张、杨又没底了。恰在此时，12月17日下午，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

金家巷张公馆。周恩来和张学良紧紧地握手。

“您辛苦了！”周恩来满面春风。

“美髯公，你的胡须呢？”张学良问。

“剪去了。”

“那太可惜了。”

两人很快就谈到了正题。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但是蒋介石的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滑铁卢战役以后的拿破仑。它既非革命，又非战胜，而是趁着蒋介石住在这里，出其不意，乘其不备，用军事阴谋的手段把他捉起来。”

周恩来提出了共产党的处理方针，这就是：“争取实现使中国走向更好的前途，现在只能是说服蒋介石，使他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条路，只要他答应我们的这种要求，我们应当把他释放回去，并且拥护他作全国抗日的领袖。”

张学良对此深表折服。要知道，论仇恨，不能有比国共之间更深的仇了。为了抗日，共产党捐弃前嫌，还能有比这更宽大的胸怀么？

12月20日、22日，宋子文、宋美龄先后到西安。经商定，宋子文代表蒋介石，张、杨、周恩来代表西安方面进行谈判。

24日，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达成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政治犯，保证人员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具体救国办法。

当天晚上，由宋氏兄妹陪同，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的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随后，周恩来和坐在病榻上苍老、憔悴的蒋介石达成三点协议：（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蒋指挥；（二）宋子文代表蒋与周解决一切；（三）蒋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要回南京了。

张学良没同杨虎城、周恩来商量，就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东北军部下，夫人、孩子都不同意。临走时，夫人叫两个孩子去阻拦汽车。张学良拔出手枪，大声喊道：“快站起来，让路！不站起来，我马上打死你们！我的事，不要你俩孩子管！”就这样，张学良把蒋介石送上飞机，送到洛阳，又送到南京。

周恩来知道此事再赶到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周恩来感慨地说：“晚了，汉卿当了窦尔墩了！”“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

一到南京，蒋介石就扣押了张学良。宋子文带话给蒋介石，说张学良要求见面。蒋对宋说：“汉卿犯上作乱，我不能让他回去，军事法庭一定要开。”就这样，张学良一直被幽禁着，直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去世才稍得自由。

杨虎城于1937年4月被蒋介石“革职留任”，不久出国考察。后回国途经香港时被逮捕。1949年8月蒋家王朝大势将去前夕，保密局长毛人凤请示蒋介石如何处置杨虎城。蒋介石说：“留了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终于被秘密杀害于重庆。

张、杨二将军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周恩来曾

经称他们是“大有功于抗日事业”的“千古功臣”。

以西安事变为枢纽，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终于发动起来。

四、黄河怒吼了

卢沟桥，北平西南永定河上的一座精美石桥。它建于金朝，距今已有八百多年。全长 266.5 米，桥上石柱间的雕柱在南北各有 104 根，柱头上雕着大小石狮共有 485 个。形态活泼，情趣盎然，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说过，卢沟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桥是燕京八大景之一。每当拂晓，人们远远望去，只见浑河水雾气漫漫，万里河山交相辉映，可使人发起幽幽思古之情。清朝乾隆皇帝御笔题写的“卢沟晓月”一碑，至今仍矗立桥东北侧。

1937 年的卢沟桥，不同于往常。

卢沟桥是北平的西南门户，平汉铁路的咽喉。“7·7”事变前，北平周围 4 个重镇——通州、丰台、南口、卢沟桥中，前 3 个已被日军占领，只剩下卢沟桥成为北平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如果卢沟桥失守，北京将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死城。但是，卢沟桥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因为它有 29 军爱国将士守卫。

提起 29 军，定会使我们联想到著名的《大刀进行曲》。

1933 年 3 月的喜峰口战役，29 军 217、218 两个团在旅长赵登禹指挥下，用大刀、手榴弹偷袭日军营地，杀得日军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毙敌 300 余，毁炮 18 门。从此，29 军威名传遍海内外，国际上公认喜峰口战役是个奇迹，日军也狼狈承认说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和耻辱”。

29 军大刀队的英雄事迹，立即传遍全国。作曲家麦新听到这个神话般的奇迹，激动得夜不能寐，专门谱写了《大刀进行曲——献给 29 军大刀队》：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9 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这首歌立即唱遍了神州大地。它既是人民对 29 军的赞颂，也是 29 军军魂的体现。

4 年后的“7·7”事变中，29 军的官兵再次用手中的大刀狠狠教训了日寇，打响了中国人民 8 年抗战的第一枪。

1937 年 6 月，日军为准备战争升级而进行挑衅的火药味已经能闻到了。

6 月 6 日，北平中南海怀仁堂。29 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日军驻北平部队连以上军官在这里举行联欢宴会。29 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董升堂、李致远等人出席，日本的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顾问松岛、樱井等人应邀参加。

酒酣耳热之时，松岛起立，时而舞蹈，时而弄刀，秦德纯悄声问董升堂：“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答：“先打拳，后耍刀。”说罢就跳到席位中间打了一套八卦拳，李致远也接着耍了一套国术。

何基沣跳上桌子，唱起了《黄族歌》：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

莫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凌……”

随着歌声，很多中国军官都拿出刀舞将起来。日本军官慌了，来了个杀手锏——他们把宋哲元、秦德纯等高级军官一一高高举起。

没想到，中国军官立即也把松宝孝良、松岛等人一一高高举起。

一时剑拔音张，双方如临大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幸亏宋哲元和松宝都讲了些中日应该亲善之类的话，此事才算平缓下来。

1937年7月7日，一个酷暑难当的夏日。

凌晨2时，一个拿着日本战刀的指挥官带领着一个排的日军步兵一字排开，向卢沟桥靠拢。

中国守军一个排长上前交涉，日军毫不理会。那个指挥官走到中国排长面前，一刀把排长劈死。后面的日军迅速分开，一阵枪声，中国守军一个排全部阵亡。

5时30分，日军向卢沟桥全面进攻。顷刻间，卢沟桥上，宛平城外，枪声大作。

6时45分，日军在炮火增援下，先后占领龙王庙和铁路桥。

还在前一天的7月6日，驻丰台日军就向中国当局提出，希望通过宛平县城到卢沟桥以西的长辛店演习，中国守军不许，为此双方僵持了10小时之久。

当晚10时许，37师师长冯治安接到日本方面电话，说有日本陆军一个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好像听到驻宛平县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使演习部队一时纷乱，结果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失兵。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又一次搞贼喊捉贼。人们在“9·18”柳条湖事件中已经领教过了。这次又玩这套把戏，莫非日本方面有什么新阴谋吗？

果真，“7·7”卢沟桥事变爆发。

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命令：

“全体官兵要坚决抵抗；卢沟桥即为尔等之坟墓；应与大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219团3营长黄金振中发出誓言：“宁为战鬼死，不作亡国奴。”还带伤领受了夺回铁路桥的死命令。他亲自率敢死队勇猛冲锋。

军刀是29军的军魂。此时，阵地上只见刀光闪烁，疾如闪电。在骑兵援兵帮助下，敢死队杀开一条路，日军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慌慌张张向龙王庙逃窜。敢死队发起猛追，日寇在他们的大刀下血花四溅，尸陈遍野，敢死队员身上、脸上都被鲜血染红了。

下午，趁着大雨，日寇又向卢沟桥反扑。

双方又展开了肉搏。入夜，长辛店等地的中国守军援军赶到，他们与桥东守军两面夹击，终于把铁路桥、龙王庙等处从日寇手中夺回。

三次失掉，三次夺回，卢沟桥仍在中国守军手里。

卢沟桥的怒吼，拉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序幕。

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发表。《通电》说：全国同胞们！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告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实援助29军，并立即开展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

同一天清晨，一份急电送到了蒋介石面前。他皱起眉头，立即叫来侍从

室主任陈布雷，一面下令调4个师的兵力北上增援29军，一面又指示外交部与各国交涉。

苏联表示支持中国抗战，英、美不置可否。日本则反咬一口，要中国政府惩办卢沟桥肇事者。

7月19日，全国各报头版头条刊载了蒋介石身穿军装在庐山发表谈话的照片，还刊登了庐山谈话的消息。照片上的蒋介石，情绪激昂，高举拳头。

庐山谈话说：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如果放弃了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图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蒋介石声明：（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是“最低限度的立场”。

舆论把中央政府的动员令传到了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耳中。卢沟桥的怒火点燃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黄河的咆哮将激起神州大地雷鸣般的枪炮声。

7月8日到7月30日，日军先以谈判为名拖延时间。待增援部队到位，便恢复向中国守军的进攻。7月30日前后，日军增兵越来越多，兵力比较越来越悬殊，以致29军不得不撤出卢沟桥，直到北平、天津失守。

这段悲壮的战史，是与佟麟阁、赵登禹、何基沣等29军著名将领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佟麟阁将军，辛亥革命时就参加了冯玉祥将军统帅的军队。20多年戎马生涯中，身经百战，驰骋南北，战绩卓著，从一个士兵逐步成长为一名副军长，一名将军，素有“儒将”之称。他常说：“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7月28日，日军在接连几天炮击宛平、长辛店后，把重点放在北平郊外的南苑。大批飞机在尖利的器叫声中不断俯冲、投弹。29军守军士气高昂，击落敌机1架，缴获坦克2辆。

但是，毕竟敌我悬殊。日军趁29军顾不过来，偷偷从大红门一带接近中国守军阵地。紧要关头，方显英雄本色，佟麟阁亲自率兵击敌。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腿，下属要他退下包扎。他怎么也不肯，“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轰”的一声，佟麟阁头部受重伤。不一会，他壮烈捐躯，牺牲时才46岁。

赵登禹将军，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他膂力过人，对太极、八卦、少林等各种拳术及刀、枪、剑、棍等兵器，无不精通，兄弟2人步行千里投奔冯玉祥。

在湖南常熟驻扎时，一次遇到一只老虎出山。赵登禹带领战士勇敢地打死了这只虎，还神气活现地骑在快断气的老虎背上照了一张相。冯玉祥将军亲笔题照：“民国七年的打虎英雄。”喜峰口战役中，著名的29军大刀队，就是他具体指挥的。

南苑战役中，赵登禹率一个团增援。当时我军只有2000多人，日军有3个步兵联队，1个炮兵联队，30多架飞机。当敌方推进到我守军阵地200米处，赵登禹亲自率部队挥舞大刀，大肆冲杀，吓得日军魂不附体，纷纷向后

溃退。

正当部队退回阵地时，日机又来轰炸扫射。赵登禹被机枪射中5弹，当即倒下。临终前，他说：“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受不了惊慌，还请副军长派人替我安排一下，此外我也没什么心事了。”不多久，佟麟阁副军长也牺牲了。

赵登禹和29军阵亡将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卢沟桥畔，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卢沟桥是29军的坟墓”这一誓言。

何基沓将军，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北平陆军大学毕业后，投奔了冯玉祥将军，“9·18”后任109、110旅旅长。喜峰口战役中，他率两个营用大刀同日军肉搏，使敌闻风丧胆。

“7·7”事变，日军包围宛平城，并向卢沟桥守军射击，何基沓怒不可遏，亲临前线指挥，并指挥部队夺回被日军攻占的龙王庙等阵地，迫使日军指挥官田代中将剖腹自杀。

事变后日军以谈判侍援兵，何基沓受命前往谈判。敌人拔刀威胁他。要中国守军退出宛平。何基沓毫无惧色，拔枪对峙，愤怒指出：“中国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让人践踏！”说完拂袖而去。

南苑激战中，佟、赵两将军壮烈捐躯。敌强我弱，兵力悬殊，何基沓受命率部边打边撤。

蒋介石一面发表强硬谈话，一面却仍寄希望于和谈。29军孤立无援，只得被迫撤出平津。何基沓痛心疾首，仰天长叹：“敌人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抵抗政策。”

他一恨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二痛自己报国无门，于是拔枪自射，左胸中弹，跌倒在地。部下来救他时发现有一张墨迹未干的纸条，上面写道：“不能打回北平过元旦，无颜对燕赵父老……。”

“卢沟桥上的石狮在怒吼，
卢沟桥下的河水在奔流，
战吧！
我们快用全面的抗战，
把民族敌人赶出神州。”

诗人田汉在平津失守时留下了这几句诗。他悲壮的笔墨告诉后人，平津失守不是29军的过失，他们已经用热血和生命唤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黄河的怒涛正向侵略者席卷而来。

五、啊，“8·13”

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

虽说已到下午5时，但夏日的傍晚仍然晴朗。

突然，一辆摩托车直冲机场大门而来。任凭军岗如何阻拦，那人却毫无顾忌，没有一点减速的意思。“叭！”一声枪响，那骑在摩托上的人被击毙，栽下车来。

他叫大山勇夫，从他口袋里的名片看，是日本海空战陆队的军曹。奇怪的是，冲机场的就他一个人，并没有别的部队跟来。

又是一个信号。卢沟桥事变不过月余，上海——这个具有“1·28”抗日传统的东方大都市，如今将再次面临战争的考验。

果不其然，虹桥机场事件成了新一轮战争的导火线。日军以此为借口，提出了蛮横无理的要求，要中国守军撤退，并排除其防御工事。

黄浦江上，日本巡逻艇多起来了。上海虹桥机场、杭州宽桥机场上空，不时会出现日军的侦察机。大批日军从日本本土向上海调运、集结。

上海的空气再一次紧张起来。

苏州，留园。这是一座久负盛名的江南名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如果说苏州的园林是全国最著名的景观之一，那么，留园就是苏州园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大名鼎鼎的清朝买办盛宣怀为后人留下的这座名园，亭台水榭，曲径通幽，花木鸟鱼，美不胜收。

如今，留园的大门口却多了一块招牌“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直到“8·13”之前，没人知道它究竟是干什么的。

原来，这是松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将军秘密工作班子的所在地。“1·28”以后，上海几乎没有什么防守，市区只有一个保安团，维持治安而已。张治中预料，日本决不会放弃上海，上海还会掀起更大规模的战争。

张治中研究分析了“9·18”到“7·7”的多次惨痛教训，他把中国对付日军的形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他打我，我不还手”，“9·18”便是；第二种，是“他打我，我才还手”，“1·28”、喜峰口战役都是；第三种，是“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先发制人”或叫“先下手为强”。

对眼下迫在眉睫的新的淞沪战争，张治中认为一定要采取第三种策略。他把这个意思电告南京政府，得到的答复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7·7”事变，证明张治中的忧虑决非杞人忧天。7月8日，他便从青岛疗养地急返南京，部署强化上海周围兵力配备。

虹桥机场事件，促使张治中作好迅速进入战争状态的准备。

8月11日晚，南京统帅部电示，将全军进至上海附近。一夜之间，吴淞、江湾、真如、大场、南翔等上海外围重镇以及上海市区，立即布满了军队。松沪警备司令部也从苏州移到上海南翔。

12日一大早，上海市民从睡梦中醒来一看，遍地都是抗日将士。人们惊喜交集，奔走相告，这些兵是哪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然而，13日拂晓南京统帅部来电却是“不得进攻”。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列强驻上海的外交团与南京交涉，希望上海改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此举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战争迫在眉睫关头来了。它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与日本之间有没有达成过什么默契。

8月13日下午,88师262旅在孙元良将军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抢占了从北火车站到江湾一带的阵地。只见大街上筑起了一个个坚固的街垒,将士们进入战争状态。

日军也不甘寂寞。他们在中国守军抢占阵地同时,也在构筑从虹口到北四川路一带的阵地。

八字桥,这个上海外围的交通要塞,关系战役成败的重要据点。中、日双方为争夺八字桥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下午4时,停泊在吴淞口外的军舰突然向闸北一带用重炮猛轰。顷刻间,闸北一带破旧的民房一片片地倒塌,硝烟带来的是一堆堆的瓦砾和人们的哭叫声。

“8·13”淞沪战争序幕被拉开了。

消息传到南京,南京军委会命令:(1)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9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14日向虹口、杨树浦一带发起总攻;(2)江浙边区军改编为第8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3)空军协同陆军作战。

扬州机场。

这是个设备简陋的军用机场,没有住房,没有床铺、桌椅,连棉被褥子都没有。飞行员们只好住在西门外一座小土地庙里。好在8月份天气炎热,大伙就睡在地上。

8月13日午夜,蒋介石亲自从南京打来电话:“在长江中的日本50艘军舰和轮船,正在向东逃跑。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

听说要出征,大伙情绪高昂。他们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很快钻进了座舱。一会儿,18架美制霍克式驱逐机,各载500磅炸弹升空了。

江阴一过,就可看到长江内的日舰都已逃跑,突然,发现有一艘日舰停在吴淞口东面的白龙港口。长机下达了改变队形命令,队伍变形后的驱逐机立即向下垂直俯冲投弹,那艘日舰立即被炸得无影无踪。

日军决计报复。14日上午,9架日军轰炸机突然袭击杭州笕桥机场。

高志航,这位技术高超的东北汉子,眼看敌机来袭,心急如火。他顾不上刚执行完任务的劳累,迅速率领着他的第4大队立即起飞。这番周旋,旗开得胜,击落敌机共6架。

这批日机是从台湾新竹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出发的。木更津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精锐。他们过去老是自吹自擂,说木更津是不可战胜的。笕桥上空日军败北,木更津航空队长气得自杀。

15日,木更津又来报复。中国空军又狠狠教训了他们,分队长乐以琴一口气就击落敌机4架。

从日本陆军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向来以军事家自诩,这次淞沪之战非同一般,如果战败,南京就很难守卫。所以,早在1936年底,他就开始着手上海一带的防务。为此,他不惜血本,把自己嫡系部队的精华,调到了上海附近,随时准备出现不测。一旦战争开始,他又千方百计要把战局的指挥控制在自己手里。

张治中是最早进入战争准备的指挥官,情况熟悉。可是,一进入战局,他的手脚就被捆住。张治中主张先发制敌,13日拂晓接到的还是不得进攻的命令,只好眼睁睁看着坐失良机。总攻开始当天,又接到蒋介石电令:“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17日恢复总攻后,18日又接到命令,再次“暂停

攻击”。张治中为此大伤脑筋。

张治中，这个参加过云南护法战争的早期将领，一腔爱国热情。尽管行动一再受困，但他一有机会，就命令部队狠狠出击。

他的上司——第三战区长官冯玉祥曾经到南翔第9集团军总司令部视察，司令部里找不到张治中，却发现他在弹火纷飞的战壕里督战，不由嗔怪他：“你是这方面的最高司令官，不能冒这个险。”但他总不顾这些。在位一个月，没有吃过一餐太平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眼睛总是红红的，喉咙老是嘶哑着。

8月23日凌晨，电话铃声惊醒了张治中：“狮子林、川沙口发现兵力不明的敌人登陆。”接到报告，他当即指示：“不惜任何代价死守，我立即调兵增援。”

日军利用汉奸，到处剪断中国守军的电话线路。电话不通了，张治中立即驱车赶往江湾。天上日军飞机在扫射，车子中途不得不停下来。张治中心如火燎，索性徒步走起来。一个传令兵骑自行车追上来，下车敬礼。他二话不说，蹬上这辆自行车就走。就这样，赶到江湾后，抽调11师、98师、51师增援罗店。

11师师长彭善提出，日军飞机炸得那么厉害，怎么走呢？张治中严厉训斥：“我能从南翔一路冒着轰炸走到江湾，你们就不能从江湾走到罗店吗？”

调兵十分及时，多股部队在罗店一带集结。罗店争夺战打响了。这场战斗打了整整10天，打得十分艰苦。

日军火力十分强大，空中、地面形成立体战局。我军则全靠地面力量。罗店守军67师师长李树森被炸伤，旅长蔡炳炎及团长、营长多人阵亡，罗店一度失守。14师火速增援罗店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形成了对罗店的包抄之势，但要拿下罗店却还欠火候。

王耀武统率的51师派出两个团兵力增援。部队急行军到达罗店附近接替11师部分阵地后，3天之内构筑好全部防御工事。29日，团长邱维达下令强攻。营长胡豪率领两个加强连如猛虎下山，一举突破南侧日军阵地，打开一道200米的口子，部队立即蜂拥而入。睡梦中的日军不及防范，仓促应战。

我军外围高射机枪和阵地机枪形成交叉火力网，发挥了巨大威力。2个小时左右，罗店日军溃退。

为协调全面战局，张治中又急忙赶往太仓、嘉定，要和刘和鼎、罗卓英两位将军商量有关事宜。日军飞机一路轰炸，张治中只得先到嘉定。

只见罗卓英一脸奇怪的神色：“张总司令怎么跑到这儿来了？”罗卓英的18军本来属张治中的第9集团军指挥，总司令前来视察是理所当然的事。面对这种神色，张治中十分不解。一打听，方知18军已划归第15集团军，陈诚刚被任命为15集团军总司令。

陈诚的履新，连他张治中都不知道。南京统帅部这么做，使张治中十分难堪。张治中只好快快而归。刚一回来，接到电话，说是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蒋介石的红人顾祝同到了苏州。

与南京已经多日失去联络，张治中正想向上司汇报，便一口气赶到苏州。还没见到顾祝同，他就先打电话给蒋介石，想出出这口窝囊气。

蒋：你在哪里？

张：在苏州。

蒋：为什么到苏州？

张：为了左翼作战，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到苏州来了，所以同他商量问题。

蒋：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张：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也不知道他已划归第15集团军陈修辞指挥了！委员长应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怎么样？

蒋：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么样？

“叭”，电话一摔，断了。

张治中感到莫大的委曲。天天在前方玩命似的奔波，别人却在用冷眼看你。他自信对整个战局的部署没有失误，但统帅部一连三次叫他停止进攻。总攻开始后，只有陆军，没有空军配合。现在整个战区兵力部署变动，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这种委曲，张治中无论如何无法忍受。他的心彻底凉了。

不久，张治中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呈，命朱绍良来接替他，并把顾祝同调来代表蒋本人指挥整个战局。

蒋介石重新调整了上海兵力部署后，亲自到上海，与顾祝同、白崇禧商定，从南翔、真如一带突破，迫使日军入海。21集团军按部署进入作战。

10月21日上午7时起，到22日下午2时，连续50多个小时，日军火力越来越猛，中国空军伤亡极其惨重，不得不退据二线。

10月24日，日军进攻大场。18师势单力薄，无力坚守，师长朱耀华自杀，阵地失守。

严峻的现实痛苦地告诫人们，再硬拼下去损失会更大。顾祝同向88师孙元良师长传达蒋介石的指令，要88师坚守闸北，以拖延时间，争取11月初国际联盟政治解决中国战局问题。88师选定一个团的精兵担当此任。

30年代，上海就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孙元良的88师指挥部就设在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大银行联营的仓库里。在这里，孙元良向524团团副谢晋元中校、1营营长杨瑞符少校下达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谢晋元很骄傲地接受了这个命令。四行仓库成了800孤军死守上海的最后堡垒。一四行仓库大楼在苏州河畔，它是一座钢筋水泥的7层楼房，仓库东南是租界，西北已被日军占领。这个团，名义上号称有800人，实际上只有450余人，部队在窗口堆好沙袋，楼顶架上高射机枪。

为死守据点，谢晋元带头写遗嘱，用自己必死的决心感召部下。他还写下诗作自励：

勇敢杀敌八百兵，
抗敌豪情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
说到倭奴气不平。

10月28日，2名日军偷爬仓库大楼。谢晋元眼明手快，一个箭步上前，一手卡死其中一个，又一拳把另一日军打落在地。

突然，一个女青年出现在他的面前。她叫杨慧敏，是上海市商会的女童子军。她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四行仓库，送来一面国旗。几天前，杨慧敏就有这个念头。她看到大楼三面不是太阳旗，就是米字旗，便心生一计，一定要让四行仓库上飘扬一面中国国旗，以鼓起上海的人心。于是，他脱下制服，把一面大国旗紧紧缠在身上，再穿上制服，冒着枪炮，慢慢爬到仓库东侧楼下。

朦胧的灯光下，壮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谢晋元握着杨慧敏的手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勇敢精神。”

东方刚露鱼肚白，壮士们用两根竹竿连接成旗杆。顶楼平面上，他们庄严地向国旗敬礼。虽然没有音乐，没有礼仪，但气氛悲壮肃穆。国旗升起来了，苏州河畔站满了人，他们都在向四行仓库顶上迎着朝阳飘扬的国旗招手欢呼。

30日，88师参谋长张柏亭用电话向谢晋元转达撤退命令。在3挺机枪掩护下，壮士们冲出大楼，退入租界，谢晋元最后一个离开。

意想不到的，租界当局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真金不怕火炼，谢晋元在逆境中励精图治，每天带领士兵操课，早晨举行精神升旗仪式。谢晋元遭人暗算后，上海数十万民众前往吊唁，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少将。

11月5日，上海终于失守。兵败如山倒，国军溃不成军。南京暴露在日军面前。

12月6日，眼看南京守不住了。蒋介石的车队缓缓离开南京，准备移居重庆。

送行的人群中，哭声震天。“想不到啊，想不到啊。”蒋介石万分伤感，欲哭无泪。

一周后的12月13日，南京终于沦陷于日寇铁蹄，令世界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开始了，30万人以上惨遭屠杀。

第三章 持久战

一、大战平型关

庐山牯岭，蒋介石行辕“美庐”。7月的南国，正是大暑天，这里却是另一个世界，只觉凉意阵阵，沁人心脾。蒋介石和周恩来正在这里举行新一轮谈判。

周恩来，这位共产党内的著名外交家，风度翩翩，潇洒自如。每次谈判，他那过人的机智，敏捷的才思，丰富的学识，令对手倾倒，对手经常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他的“口袋。”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再度开始。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国民党政府在杭州、庐山等地已举行多次谈判。这次，双方谈的话题主要是红军的改编问题。

“委员长，现在华夏危急。我党愿意在委员长领导下，全体抗日。眼下，红军的改编与边区政府的入选问题，希望国民党、特别是委员长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认真考虑我党的意见。”

8月19日，蒋介石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红军改编方案。西北主力红军3万多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称18集团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不久，18集团军划归第二战区，朱德兼任战区副司令长官。

改编后的八路军，立即开往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第2战区。

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在日军蚕食中正越缩越小，张家口、大同等城市一个接一个地陷落。兵败如山倒，一批又一批溃兵，用步枪挑着子弹、手榴弹，还有抢来的包裹，甚至老母鸡，象潮水般地往内地溃散。

这种状况使阎锡山十分头疼。不打一场像样的仗，无法交待；要打一场像样的仗，的确力不从心。因而，他巴不得八路军能快点来给他顶住日寇的南下。

9月中旬，日军分3路全面进攻华北。第1路，以1个半师团兵力，沿津浦路南进；第2路，以4个师兵力。沿平汉路南进；第3路，以3个旅团、1个师团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南进。其中，第2路是主攻方向。

阎锡山眼看快顶不住了。刚巧八路军115师在林彪带领下到达，他立即要115师开进灵丘，以阻止日军攻势。

师长林彪带了几个参谋，赶着大车直奔灵丘。一路上，听得枪声越来越密。到灵丘一看，城内硝烟弥漫。原来这里完全在日军射程之内，日军离此只有几华里。这个阎锡山，简直是要115师来这里当炮灰！林彪当机立断，灵丘不能守，必须移师平型关。

平型关在山西东北的古长城上，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关内外群山叠起，沟渠交错。关内只有一条由东北向西南沿伸的狭窄沟道，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沟底通道只能过一辆汽车，能走两辆车的地方极少，地势十分险要。而南北的沟岸，却是较平坦的山地。

正当部队要开进平型关时，副师长聂荣臻从西安赶回了部队。林彪向聂荣臻介绍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说着，摊开地图把初步作战设想说了一下。

“好！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打击敌人，这是便宜的事。”聂荣

臻显得很兴奋。“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題，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中共中央批准了作战方案。9月23日夜晩，115师在林彪、聂荣臻率领下悄悄地在距平型关东南30里的冉庄集结。

不可一世的坂垣第5师团在25日早晨8时左右，向平型关开进。关东军高级参谋出身的坂垣征四郎，如今已是师团级中将了。

雨后初晴，道路十分泥泞。第21旅团后援部队21联队第3大队及辎重部队，由100多辆汽车、200多辆大车，还有不少马车组成，向平型关开进。路不好走，车子象老牛拖破车似的，缓缓而行。

115师早在24日午夜就开进了长达几公里的伏击区。

“叭！”5时整，一声枪响。枪声就是命令。所有的机枪、步枪、手榴弹突然开火。685团、686团的两个连首先冲上公路，其他部队也迅速冲过去。整个峡谷中，杀声震天。狭长的路上，双方摆开了肉搏战的战场。

意外打击，使日军不知所措。车辆堵在路中，不少汽车被炸毁，行车纵队被分割成几段，几乎陷于瘫痪。

坂垣部队到底训练有素。他们从惊慌中立即醒悟过来，那些带着军刀的指挥官拼命地呐喊，日军立即向山上爬去，企图占领老爷庙等制高点。

最激烈的肉搏在3营、5营阵地上展开，外号“猛子”的5连连长曾贤生，率先带领部队向敌阵冲去，全连在20分钟内炸毁了日军20多辆汽车。他一个人就刺死了10多个日军。突然，一群鬼子向他包抄过来，他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日军使出了最后一招——用飞机增援。无奈，肉搏战中，飞机使不上劲。坂垣又要21旅团前往增援，却遭到了115师杨成武独立团和骑兵营的拦截。

从这天早晨到午后，被切割成几块的敌人全部被115师歼灭。阵地上，到处都是尸体、废弃的武器和炸毁的车辆。

平型关大战，115师歼敌1000余人，毁敌汽车80多辆。缴获步兵炮1门，步枪300多支，机枪20多挺，炮弹3000多发及其他大量战利品。

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数十年后，聂荣臻为此曾赋诗一首：

华师上塞运良筹，敢举烽烟解困忧；
潇潇夜雨洗兵马，殷殷热血固金瓯。
东渡黄河第一战，威扫敌倭青史流；
常抚皓首记旧事，夜眺燕北几春秋。

平型关大战在国内外反响强烈，全国各地的祝捷电报象雪片似地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前，不少人拉着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手说：“晋北得你们，八路军打得顶好。”

10月17日，蒋介石给八路军发来祝捷电：

朱总司令玉阶兄：

电悉，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中正

并送来大量慰问品、慰问金。

平型关大战后，115师还配合阎锡山部队打了忻口战役。

二、中国的抗战究竟该怎么打？

延安，杨家岭。身材魁梧、目光深邃的毛泽东正在一孔窑洞中边思考，边写。他在想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八路军的仗究竟怎么打法？中国的抗战究竟该怎么打？

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没有进过专门的军事学校，但是，他学问渊博，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从 1927 年的井冈山斗争到后来的瑞金中央根据地，他领导的红军打过一个又一个漂亮的游击战，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弄得蒋介石大伤脑筋，在第 2 次“围剿”红军失败时，蒋介石竟然禁不住内心的伤感，为自己的惨重失败黯然泪下。

现在，八路军代替了原来的红军，进入了抗日战场。红军的传统还要不要呢？八路军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战略战术迎击日寇？难道要八路军也和国民党军队那样去大打正规战吗？从瑞金中央根据地到红军被迫长征，无不是吃了那个李德的亏。

那个德国顾问李德，自以为是军事家，结果把红军引到了失败的边缘。国民党军队用正规战与日寇硬挤，最后只得丢城弃地，饮恨后撤，看着大好河山一片一片地失陷。打正规战，对八路军来说，绝对是死路一条。

毛泽东还是相信游击战。战争，无非是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红军人少，装备差，要和日寇硬拼，无疑是以卵击石。毛泽东一再告诫八路军领导干部，在开进正面战场后，八路军要保持独立性，要和过去红军时期一样，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游击战为主与日军周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打击敌人。

然而，红军中并不是人人都赞成毛泽东意见的。比如林彪，他就不太赞同。他觉得，游击战当然是对的，但如果有条件，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些运动战的打法呢？这样歼敌的效果，影响不是会更大吗？

阎锡山提出要 115 师在灵丘、平型关与之配合的意图后，毛泽东仍然主张我军在其中不起决战作用，我军仍然要在太行、太岳之间做群众工作。当林彪把作战意图向他报告以后，虽然他也同意可以打，但认为主要立足点仍然应当放在游击战上。

平型关大战的胜利，以及它在国内外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毛泽东的鼓舞极大，使毛泽东对八路军进行运动战的可能性有了重新认识。

1937 年 9 月 26 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10 月 25 日，他在会见英国记者贝特兰时，第一次公开提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并强调，“军事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从此，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成为八路军作战的指导原则。

1938 年上半年，毛泽东对 1927 年第一次带兵上井冈山以来自己的军事思想作了系统的总结，写了很多东西。特别是 5 月份，他写下了《论持久战》一书，从中国的角度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总趋势。

毛泽东坐在窑洞的书桌边，微弱的烛光照着他苍白的脸。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觉，只吃一点点东西。摊开的笔记本旁边是一块石头，手臂疼痛时，就紧握几下石头，使手指得到松弛。

5 天后，那充满毛泽东梁鹤不驯特点草书的书稿已有一大摞了，而毛泽

东的体重却减轻了，眼睛布满了血丝。警卫员一次又一次给他热过的晚饭。一次又一次地凉了。警卫员在那儿发愁，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主席吃点东西呢？一旦主席要吃饭了，警卫员将会看成是重大的胜利。

第7天，毛泽东突然痛得跳了起来。他右脚上穿的鞋被火盆中的火烧了一个洞，他却毫无觉察，仍在静静地沉思，直到烧到皮肉才大感疼痛。他喝下一杯烧酒，继续写《论持久战》。

第8天，他又突然感到头痛。一阵晕厥，几乎从书桌边栽倒下来。医生赶来给他诊断。采取了一些措施后，他又继续写作。

第9天，这部长达5万多字的雄文终于写完了。接着便叫人送到刘少奇等其他领导同志那儿征求意见。

6月，《论持久战》正式出版，毛泽东亲自核对了好几遍。

经廖承志的努力，《论持久战》等毛泽东的著作不久在广州公开出售。一年左右后，许孟雄把它译成英文，向国外发行，产生了巨大影响。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主要针对两种观点：一种是“亡国论”，一种是“速胜论”，同时对“唯武器论”等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民政府几百万军队，在最初与日军的几次交锋中，都以失败告终，于是节节溃败。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也在那儿吹冷风，老是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败必亡”，他们被日军的表面嚣张气焰吓破了胆。他们唱的是“亡国”的悲观论调。

还有一些人，觉得日军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值一打。共产党在平型关取得的重大胜利，国民党在台儿庄取得的辉煌战果，使他们觉得打败日本是指日可待的事，下一步便是中日之间的“大决战”了，这一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日寇等着“末日审判”吧。这种“速胜”的调子的确也迷惑过一些人。

在毛泽东看来，“亡国论”不可取，“速胜论”也要不得。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总趋势来看，一定会胜利，中国亡不了；但是，胜利不会来得那么快，必须经过持久战才能取得。

为什么呢？4个基本特点决定了这一点。

——敌强我弱。日本的社会制度决定，它在相当一个时期内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是十分强大，它是东方一等强国。中国则是个弱国，要和这个强国作战，不可能速胜。

——敌退步我进步。日本虽处于资本主义阶段，但其奉行的军国主义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中国正处在历史上空前进步的时代，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是进步的事业，所以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敌小我大。日本国小，人力、物力、军力、财力都极为有限，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支持长期战争。

——敌寡助我多助。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必然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必将得到全世界支持，所谓得道多助。

4个特点中，日本是1个长处，3个短处；中国是1个短处，3个长处。力量对比是可以通过战局变化而改变的，到了一定的阶段，强弱优劣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毛泽东把抗日战争称为持久战，他把这场持久战划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防御阶段，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第一、第三阶段时间都比较短，第二阶段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毛泽东是个具有哲学家头脑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以军事辩证法独特的魅力把中国抗日战争的总体趋势和全盘战略分析得明明白白，极为透彻。其实，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又何尝不是按这个趋势进行的呢？

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是极其正确的。时代呼唤着新的军事理论，时代造就了新的军事思想家。

三、喋血台儿庄

津浦铁路上，一列专车正由南向北徐徐驰来。

专车的中心人物是一个中等个头、身材结实的男子。他那宽阔的脸上，眉宇紧蹙，表情严肃，身着的毛料军服上，耀眼地镶嵌着上将军衔。

他就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现在，他正在从南京赴徐州上任途中。此时，临行前的一幕幕又浮现在他面前：

1937年11月的南京，日军正大举袭来，南京吃紧。

蒋介石连续3次召开高级幕僚会议，研讨南京防务。李宗仁觉得，南京在地形上是个绝地，三面将被包围，一面临长江，无路可退。倒不如公开宣布南京为不设防城市，以免敌人借口残杀平民。这个意见得到多数将领赞同。

蒋介石显然不这样想。他觉得南京就这样丢了，国民政府太没有脸面了；但又不好明说。就在这时，平时很难打照面的湘军将领唐生智一下子慷慨激昂起来：“现在敌人已逼近首都，首都都是国父陵寝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在南京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不特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本人主张死守南京，和敌人拼到底。”

蒋介石闻之大喜，于是把南京防务托付给了唐生智。

“呜——”，一阵汽笛，把李宗仁从沉思中唤醒。

一想到唐生智，李宗仁不禁摇了摇头。唐生智肯定守不住南京。南京一失，日寇就要把南北战场贯通。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国抗日整个战局中，我李德邻就被推上第一线了。假如我能稳住徐州，在津浦铁路上与敌人周旋它几个月，便可使重庆、武汉有充裕的时间整调部署，只要国际形势出现转机，就有胜利的希望。

蒋介石那么多军队都没能守住上海、南京，李宗仁能守住徐州吗？

徐州并不乐观。

12月下旬以来，日军加速向徐州的攻势。南路，从镇江、南京、芜湖一带直逼蚌埠；北路，从青城、洛阳一带过黄河，进犯济南，结果，南路守军31军把日军分割成几段，使之困于淮河一带。北路，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以至泰安、济宁失陷。这样，徐州暴露于北路日军面前。

韩复榘是山东军阀。看上去白白净净，象个白面书生，实际上绣花枕头一肚草，斗大的字不识几箩筐。作为杂牌军，他与南京政府一直不睦。蒋介石多次借杂牌军或者剿共，或者抗日，最终结果都不太好，不是全军覆没就是取消番号。韩复榘消极地为了保存实力，不惜和日本人拉起关系来。他曾和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小矶国昭、津浦北段指挥官西尾寿造秘密接头，希望妥协。但是，日本人要的是他公开当汉奸，宣布山东独立。韩复榘还不敢这样做，于是一拖再拖。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白崇禧到达归德，召集第1、第5战区师长以上将领开会。散会时，随从而来的刘峙突然说：“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同你讲！”当会场只剩蒋介石和几个卫士时，刘峙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走。”韩顿时大惊失色。

不久，韩复榘在武汉被枪决。蒋介石借此剪除了一个异己，李宗仁到徐州赴任，手下少了一个动摇分子。

台儿庄在津浦铁路台枣（庄）支线与台潍（坊）公路的交叉点，北连津

浦线，南接陇海线，西临微山湖和京杭大运河，是徐州东北 30 公里一个重要门户。

1938 年 3 月至 4 月，李宗仁以台儿庄为重心，以整个鲁南地区为舞台，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整个战役中，可以看到李宗仁高超的调兵和治军能力，特别是能自如地指挥杂牌军作战，这一点，事后连蒋介石都深为叹服。

3 月中旬的临沂、滕县战斗，拉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1 月中旬，坂垣第 5 师团在青岛登陆；2 月上旬便与津浦路上的矾谷第 10 师团策划进攻临沂。2 月上旬，临沂告急的消息十万火急地传到李宗仁那儿。李宗仁手头的兵力很紧，实在无兵可派，怎么办呢？他想到了庞炳勋。

庞炳勋也是个善于保存实力的杂牌军将领，人极为滑头，不易打交道。不料，当他去参谒李宗仁时，身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竟亲自到大门口迎接，弄得庞炳勋很不好意思。

李宗仁极为诚恳地说：“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军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担任一次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 50 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了，这样才不愧作一军人，以终其生。”

这番推心置腹的话，使庞炳勋十分感动，他表示：“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留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李宗仁又帮他向南京政府争取，使他手下一个本来准备要归并的特务团得以维持现状。庞炳勋为此极为感激，全军将士为之欢腾。

庞部一上临沂，果然不同凡响。它面对的是日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坂垣师团，再加上一个山炮团、一个骑兵旅，一起向临沂进攻。无论日军怎样冲杀，庞部始终死守，日军不能越雷池一步。当时，在徐州一带观战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武官不下数 10 人，大家没想到一支最优秀的“皇军”竟不敌中国的杂牌军，顿时喝彩声四起。

坂垣见连日不克临沂，不断增加兵力，庞部渐觉不支，要求李宗仁增派援兵。

李宗仁手里哪里还有兵可增援呢？突然，他想到了张自忠。

张自忠是与庞炳勋有仇的人。张、庞原先都是冯玉祥的部将，1930 年蒋冯战争时，庞为蒋介石收买，一度倒戈袭击张部，从此二人结下大仇。张自忠会去增援庞部吗？

张自忠当过 29 军的师长，军长宋哲元曾派他出任北平市长。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张自忠只能忍辱负重，与日本人周旋。外界不明真相，以为他当了汉奸，舆论界攻击他最厉害，给他加上“国人皆曰可杀”的罪名。卢沟桥事变后，29 军后撤，张自忠只好独自逃离北平。京、沪舆论界一路指责他擅离职守，不事抵抗。他到南京后，整天灰溜溜的，好像真当了汉奸一样。

李宗仁了解情况后，及时找他深谈。他说：“荃铭兄，我知道你是受委屈了。但是我想中央是明白的，你自己也明白的。我们更是谅解你。现在舆论界责备你，我希望你原谅他们。”李宗仁还专门找蒋介石，建议中央应该让张自忠回去带兵，还说“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决不是想当汉奸的人”。

张自忠极为感动。离开南京前特向李宗仁辞行：“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

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缱绻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以报国家，以报知遇。”后来，张自忠的部队也调入了第5战区。

现在，庞部告急，李宗仁找到张自忠，对他说：“你和庞炳勋的宿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奋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曲，捐弃个人前嫌。我今命令你即率所部，去临沂作战。任务要绝对服从庞军团长的指挥。切勿迟疑，致误戎机。”

“绝对服从长官命令，请长官放心！”张自忠二话不说，立即率部开往临沂，中国守军阵势明显增强。3天血战，日军被全线击垮，残敌向莒县方向逃窜。

临沂一战是台儿庄战役的第一个胜利，它打破了坂垣师团和矶谷师团会合的计划，从而使冒险而来的濑谷支队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临沂方面顶住了坂垣师团，而矶谷师团却直逼滕县。他们急于攻下滕县，准备与权垣师团按预定计划会合。滕县的中国守军是邓锡侯率领的川军。

邓部原驻川西，因为长期受军阀刘湘封锁，武器装备很差。尽管如此，这支队伍爱国热情却很高，主动请缨，要求出川抗日。

南京统帅部将其编为第22集团军，编入第2战区。谁知阎锡山说他们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就是不肯要。第1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不要这支部队，说：“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蒋介石为此勃然大怒：“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到四川去称王称帝罢。”白崇禧便想了个办法，试探着问第5战区，看李宗仁要不要。

李宗仁很爽快地就要下来：“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白崇禧特别提醒：“他们的作战能力要差一点。”李宗仁不以为然：“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

邓锡侯率部到徐州时，对李宗仁的豪爽大为感激。他们说：“李长官肯要我们到5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李宗仁还向南京要了大量武器弹药补给邓部，他们简直是高兴极了。

这次李宗仁派邓部防守滕县，他们果然不辱使命。

3月中旬，战斗打响，邓部面对的日军近3万人，其中有步、炮兵各4个半大队，还有坦克、装甲车和飞机掩护。但是，川军是能打硬仗的，他们只凭手中的简陋武器，多次肉搏冲锋，击退了日军进攻，始终固守阵地。

兵力越打越少。调上去增援的汤恩伯第4师，却借口在外围受阻，迟迟不上去，3月17日，日军炮弹密如骤雨，滕县东城、南城城墙被轰塌多处。师长王铭章“决以死力扼守，以报国家”。日军十多次进入城内，十多次被打退。守军用沙包、盐袋堵缺口，顽强抗敌。下午5时，日军攻入西城，王铭章腹部中弹，在打死3名敌军后悲壮殉职。

滕县虽然最终失守，但王铭章率部拼死坚守整整2天，为台儿庄战役从总体上取胜赢得了时间。

日军矶谷师团攻下滕县后，便长驱直入，直奔台儿庄而本从3月23日开始，日军逼进台儿庄主阵地。顿时，台儿庄上空硝烟笼罩，各种炮声震耳欲聋。城内到处是残壁断墙，一场恶战开始了。

李宗仁正在前线督战，此情此景，促使他果断命令空军参战。

归德机场。空军第3大队18架驱逐机刚到归德不久，便腾空而起参战。

40 分钟后，便到了台儿庄上空。一阵俯冲投弹，日军阵地立即一片鬼哭狼嚎。

5 战区阵地守军看到自己的飞机，士气大振。日军之架飞机立即前来拦截，不料却被我空军当场全部击落。

战斗越来越残酷，担任台儿庄主阵地正面守卫的 31 师，其兵力已消耗了十分之七，师长池峰城通过第 2 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向李宗仁请求撤退。

李宗仁知道伤亡的严重，但他咬咬牙，硬着心肠说：“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 5 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到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

孙连仲只好说：“好罢，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

李宗仁深知他手下兵力已不多，便说：“我现在悬赏 10 万元，你将后方凡可拿枪的士兵、担架兵、炊事兵与前线士兵一齐集合起来，组织一敢死队，实行夜袭。这 10 万块钱将来按人平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你好自为之。胜负之数，在此一

举。”

孙连仲亲自到台儿庄组织敢死队，并命令 31 师师长池峰城：“士兵打完了你忧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完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者，杀无赦！”

在这种背水一战的气概下，4 月 6 日夜组织起来的敢死队数百人，奋勇异常，一举夜袭敌方营地。日军想不到中国守军还有这么大的威力，顿时大乱，台儿庄的四分之三街面竟被敢死队夺回。

4 月 7 日凌晨，李宗仁来到台儿庄郊外指挥最后的反击战。这时，日军阵地已一个个被克，加上援军部队赶到，日军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了。

在一片震天的杀声中，台儿庄守军对矾谷师团的全面反攻开始。矾谷师团长眼看大势已去，只得率残部突围逃窜。

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在台儿庄战役最激烈时，日本共同社曾夸下海口：“华方最精锐部队之国民党军已被击溃，我军已将台儿庄完全占领。”

事实是，尽管台儿庄成了一片焦土，中国守军的伤亡的确极其惨重，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 2 万多人被歼，中方缴获步枪 1 万多支，机枪 931 挺，步兵炮 77 门，战车 40 辆，大炮 50 多门。

捷报传来，举国欢腾。全国同胞、海外侨胞的贺电雪片般飞向台儿庄。

四、“我们都是飞行军”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都是飞行军，
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

著名老音乐家贺绿汀创作这首《游击队歌》时，正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开始不久的時候。刚从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充分发挥自己擅长打游击战的优势，在华北抗日前线这个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生动活泼、威武雄壮的活剧。

雁门关是古长城一个著名的隘口。

1937年10月，115师正配合阎锡山部队打忻口战役时，120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就派贺炳炎、廖汉生率领一个团开进雁门关附近。

3天急行军，部队来到雁门关西南十多里的老窝村。住下不久，便发现日军的汽车不时从这里经过。经侦察了解，大约四五天，就有一队汽车从大同经雁门关开往忻口。

10月16日，老百姓送来情报：大同日军集结了300多辆汽车，满载武器弹药，有经雁门关开往忻口的模样。这个情报，和掌握中的敌方过往规律相符。

连以上干部动员会上，廖汉生政委把情况摆了一下，便问大家：“怎么样，你们说打不打？”

3营营长王祥发霍地站起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鬼子在宁武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要叫敌人以血还血，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这是我的决心，也是我们全营同志的决心。”

王营长的话使大家的情绪一下子严肃起来。几天前，部队在往雁门关开进途中，一路上看到到处是夷成瓦砾的村镇，到处是被杀同胞的尸体。在宁武县城，几乎家家的菜窖都成了活埋人的土坑，所有的水井都塞满了被刺刀捅死的男人、小孩和被奸淫后杀害的妇女的尸体。战士们眼都红了，行军不愿休息，住下不想吃饭。现在，干部会上廖政委的话，就象一颗小小的火种，把大家心头的仇恨烈焰一下子点燃了。会上，大家都争着要最艰苦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团长、政委前去察看地形。到了黑石头沟的山顶一看，只见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从雁门关盘旋而下，在石头沟由西向东绕了一个大圈，公路两面是悬崖峭壁，北面是一段陡坡，公路向南不远是一座石拱桥。

真是十分理想的伏击地形。

18日清晨，才鸡叫头遍，部队就沿着崎岖小道，插入了黑石头沟。从黎明前一直等到太阳升得老高，公路上仍然冷冷清清，毫无动静。有些战士开始不耐烦了，不时抬头张望。团部指示：耐心等待，绝对防止暴露自己。

10时左右，北面公路腾起一股尘土，隐隐约约地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战士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悄悄他说：“来了！来了！”

不料，情况有变。3营送来报告：“南面阳明堡又开来100多辆。”原来，日军为免除后顾之忧，经常要在这一带南北会车。团长贺炳炎说：“既然送上门来了，就一起吃掉它。”

两路汽车毫无顾忌地开过来了。南面车队，只有第一辆车上十几个日

军，后面只有少量伤兵和死尸，大部是空车。北面车上前面是掩护部队，后面是弹药，北面车上见南面车上拉着死尸，便由军官指挥，全体脱帽致哀，还扯开嗓门唱起挽歌来。

两车队全部开进狭窄的黑石头沟时，贺炳炎一声令下：“打！”只听轻重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两路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蒙了，互相冲撞起来。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弹药车被打着了，发出巨大的爆炸声。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部队一齐冲杀了上去。大刀、刺刀显示出无比的威力。公路上火药味浓烈扑鼻，鬼子兵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车上的弹药崩得到处都是。

战斗胜利结束，战士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打扫起战场来。一个战士正用铁锹狠砸汽车，边砸边说：“我叫你再跑，我叫你再跑。”贺炳炎一看，笑了：“这么多汽车，哪砸得完？”廖汉生也说：“不要砸了，应该炸掉。”顿时，响声四起，大量汽车在雁门关下焚饶起来。

警戒部队报告：阳明堡鬼子增援来了。八路军迅速撤离了战场。

部队到山顶时再远眺刚才的战场，只见雁门关方向又开来几十辆汽车，一队日军正在公路上搜索，空中还出动了2架飞机在黑石头沟上空盘旋。可是，除了燃烧着的汽车和横七竖八的“皇军”尸体外，别的啥也没有。

平型关战役不久，日寇变更作战部署，从平型关、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阎锡山的晋北防线，气势汹汹地沿着同蒲铁路直下太原。

八路军129师769团在刘伯承师长部署下，由团长陈锡联带领奉命来到山西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苏郎口是漳沦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顺着漳沦河南下便到忻口，那时，忻口战役正在进行之中，南面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只听得日军的飞机老是2架、3架地不时在我军头顶掠过。

从各种迹像分析，机场很可能离这儿不远。向老乡一打听，果然在隔河十来里外的阳明堡有个机场。

陈锡联带着几个干部，顺着一条山沟边走边谈，很快就到了滹沱河边。登上山峰，只见东面是峰峦重叠的五台山，长城线上矗立着巍峨的雁门关，西面的管岑山在雾气中忽隐忽现。

“飞机！”突然，2营长叫了起来，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望远镜，只见对岸阳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刺目的闪闪光芒。

他们正在仔细观察机场内外的每一个目标时，只见有个人从河边走来。这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打着赤脚，神色很紧张。大家迎上前去热情地喊道：“老乡，从哪里来？”

那人听到喊声，见到眼前是几个陌生的军人，更加惊慌不安，好半天才哆嗦着说出两个字：“老……总……”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打鬼子的。”

他一听“八路军”三个字，马上扑上来抓住陈锡联的手，激愤地诉说起来。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一个小村庄里。一家三口被鬼子杀得只剩一个人了，他自己也被抓进机场做苦力。整天搬汽油，运炸弹。他受不了这个折磨，才由机场偷跑出来的。最后，他指着机场狠狠地说：“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

经这位老乡介绍情况，部队又通过侦察后了解，机场共有24架敌机，白

天轮番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守卫机场的只有一小股部队，阳明堡街里驻扎着日军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

陈锡联判断，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他的，这正是歼敌的好机会，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给它以突然袭击，胜利是有把握的。于是，决定作以下部署：3营负责袭击机场，1、2营破坏哼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桥梁，阻击可能的敌援军；迫击炮连、机枪连还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随时支援3营。

苏郎口的耆乡听说八路军要去打鬼子，几小时内就扎起了几十副担架。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

3营是支老部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是一支能攻善守、尤以夜战见长的部队。今晚，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出响声的装备，都绑得紧紧的。先前遇到的那位老乡充当了向导，他对这一带道路了如指掌。在他指引下，部队很快渡过滹沱河，来到机场外围。

机场里死一样沉寂。此时，日军正在酣睡。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八路军已经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机场来了。赵崇德营长带10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鬼子守卫队，11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这些战士过去只看到过天上飞的飞机，在地面这么近看到飞机还是第一次。大家又惊喜又愤恨，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耍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

突然，听到西北方有鬼子在哇啦哇啦地呼叫，接着便响起了一连串清亮的枪声。显然，10连与日军哨兵遭遇了。

11连战士高声喊杀，勇猛地冲上去。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火光照亮了夜空。机场周围正在值勤的日军哨兵、在机舱里值勤的飞行员都被惊醒了。惊恐中，他们盲目打起枪来。

正打得热闹，鬼子守卫队来了。八路军和守卫队在飞机之间展开了肉搏。

赵营长从10连那边迅速来到11连阵地；他刚到停机坪，只见一个鬼子从机舱里跳下抱住一个战士，那战士回身向后就是一刺刀，结束了那个鬼子。赵营长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只听“轰！轰！”几声，几架飞机立即起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顷刻间，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烈火，把所有的敌机都烧着了。

在机枪队火力下，鬼子守卫队被杀退。突然，一颗子弹击中了赵营长。几个战士来扶他，他却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话没说完，就合上了双眼。

“为营长报仇！”战士们怀着万分悲痛，冒着密集的弹雨向敌机冲去。

20多架飞机都被燃起了熊熊大火，守卫队也大部被歼。这时，驻阳明堡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忙赶来了。

可是，当他们赶到机场时，八路军已经撤离了。

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消息迅速传开。那些国民党军官们一开始还不信：“就凭八路军那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然而，一连几天过去了，忻口、太原就是没有遭到敌机轰炸，他们这才无话可说了。

五台山，苍松古刹，郁郁葱葱。1939年，它又成了华北的一个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因为它地处平汉、平绥、同蒲、正大4条铁路之间，战略地位重要。

这年5月，日寇制定了一个分5路围攻五台山根据地的计划，眼睛盯着的就是当时驻在龙泉关的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他们打算出动步、骑兵共5000多人，每路约1000多人，从五个关口到龙泉关。如果走得顺当，2天多时间就可到达。如果不加设防，2至3天，阴谋即可得逞。

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120师359旅王震旅长得知探报后，立即部署了反“围攻”的计划。

5路敌军的主力是从大营向龙泉关的这一路，它由日军“北支那派遣军”宫崎部队组成。

我军反“围攻”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首先，兵员不够。当时，主力之一718团还远在下寨一带，要其赶到指定作战地点神堂堡，要有10天时间。王震旅长命令，就用现有的一点兵力立即投入战斗。我们的骑兵大队虽然人不多，但他们以马代步，行动比较迅速，让他们先赶到大营口一带分散袭击敌人。同时，命令教导营在敌军必经之路神堂堡南北两面大山设伏。两支队伍都是为了拖住敌人，把他们压向西南，决不让它走上东南的大道。

时间就是胜利。多拖住敌人1天，甚至1个小时，对战斗胜利都会是至关重要的。

骑兵大队果然出手不凡。他们把大部队分散成小分队，四处出击，迫使敌人不得不随时停下来应付他们，甚至要调过头来对付后面部队的袭击。

敌人本来预定5天到达龙泉关。哪知被骑兵大队左右骚扰，不得安宁，从大营口到神堂堡就用去4天。他们一到神堂堡便遇到了教导营的袭击，他们只好仓促分开，就地应战。

入夜，日军就地宿营。教导营估计，718团还要1天才能赶到。于是，连夜派出几支小部队，和当地民兵一道，把敌人折腾了一夜。

次日凌晨，正当敌军要继续前进时，718团提前赶到。他们是跑步一天一夜赶来的，浑身上下汗水浸透了衣衫，可一到战场，气也没喘便立即投入战斗。

教导营配合718团打起了“麻雀战”。敌人只见满山都在打枪，摸不着头脑，只好向丛林退去。718团陈宗尧团长大喝一声：“冲！坚决不准敌人前进！”先头部队一鼓作气冲了下去，把敌军冲得四分五散。

这伙日军还相当顽强，他们倚仗人多炮多，弹药充足，想摆开阵地与我军打阵地战。顿时，他们的炮火变得极其猛烈。

王震旅长指示：“敌人目前还很顽强，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消耗它，疲惫它，同时注意保存我们自己的有生力量。”陈团长带领718团也打起了“麻雀战”，我军的小红旗好几次变换地方，致使敌军多次中计。当他们发现这样不行时，又企图甩掉包袱继续前进。集结在后山的718团主力像猛虎下山那样，一下子冲下去，把他们打得不知所措。

不得已，敌军又围在这里过了一个夜晚。这个夜晚也够呛，小分队照例是轮番袭击，打得他们又是一夜不得安宁。

天亮时分，抓到一个俘虏。这是个被打散的日军士兵。只见他双眼布满血丝，上下眼皮直打架，脸上又黑又脏，双手捧着一个熏得乌黑的饭盒，里面只有两根指头般大小的山药蛋。一双军用大皮鞋，不是穿在脚上，而是挂在肩上，脚上磨满了一串串又红又紫的大血泡。这副狼狈相，让人觉得十分滑稽。

显然，敌人被拖得十分疲劳，他们又累又饿又困，装备又笨重，很不适

应爬山。

王震旅长当即指示，不准他们沿原路退却，一定要把他们压向西北的深山穷谷；再向军区报告，请兄弟部队拖住其他方向的敌人。同时，又命令又一主力 717 团迅速赶来，准备围歼这股敌人。在 717 团到来之前，还得用老办法——拖，把他们一个个地压到西北沟底去。

敌人似乎也看出，这条深山穷谷对他们不利，无论如何他们也不肯下到沟底，只是沿着两侧山头且战且迟。我军便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展开肉搏，迫使他们一个个下到沟底。

沟深崖陡，他们想爬都爬不上来。敌军便试着突围，他们在黑夜中，朝着细腰涧一带逃跑。

说来凑巧，717 团正在向细腰涧一带运动，侦察部队报告，说对面发现敌军正在整理队伍，看样子十分狼狈。刘团长一听大喜：“好啊，一定是旅长要我们赶来消灭的那股敌人。”送上门来的礼，岂有不收之理？刘团长命令部队分两路迂回，要求包围敌人，全歼灭之。

敌军早就被拖垮了，这时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说。3 个小时不到，全部解决问题。

一千多人的宫崎部队在比它少得多的八路军连拖带打的游击战面前，肥的拖瘦，瘦的拖垮，最后成了瓮中之鳖。主力一消灭，其他 4 路敌人都赶紧退走了。

五、新四军：敌后游击健儿

赣州，这个位于章江和贡江汇合处的江西省第二大城市，10年内战时期充当了国民党“围剿”中央红军的桥头堡。1937年8月下旬，国民党的赣川市党部却戏剧般地接待起一个红军游击队的头面人物来了。

代表红军游击队前来谈判的，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将军。

陈毅，这个高大的四川汉子，早年到法国搞过勤工俭学。1927年，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他和周恩来、刘伯承、朱德、贺龙、叶挺等人一道发动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和朱德一道，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红4方面军建立以来，他一直是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秋，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陈毅和少数干部奉命留下，在赣粤边的油山打了整整3年的游击战。和他一起打游击的，还有项英、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这样的小游击部队，分散在南方8省的14个地区仍红军到达陕北，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形势急转直下。昔日的敌对双古国共两党，再度出现合作，不久前，国民党军队还在“围剿”游击队；没多久，陈毅将军就成了国民党请来谈判的座上客了。

酒席宴前，那些国民党党棍多次问陈毅，下山后有什么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不舒服。在井冈山的时期，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两千，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期，花红涨价了，涨到了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一下子从五万跌到二百，你们出二百就想买我的这颗头，太瞧不起人了。”这帮国民党党棍个个面面相觑，一个劲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谈判中，尽管国民党当局玩弄各种花招，一会儿造谣说陈毅已向他们投降，一会儿又派来叛徒游说，但最终都没达到目的。国共双方只得就共同抗日达成协议。

这样的谈判，在闽、粤、湘、赣、鄂等地都有过。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4军。一开始，国民党提出要让陈诚或张发奎当军长，遭到共方拒绝。10月5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

叶挺将军是一员虎将。他当过孙中山先生的卫队团营长。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的4军独立团所向无敌，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次战役中，一举击溃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获得“北伐名将”的美名，他所在的第4军被称为“铁军”。1927年，他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年底又和张太雷、叶剑英等人领导了广州起义。两次起义失败后，叶挺离开了红军，隐居干澳门。

虽说离开了红军，叶挺依然忧国忧民。“9·18”以后，叶挺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存亡深为焦虑。

共产党没有忘记叶挺。1937年，中共中央请他出任南方红军游击队整编后的领导，他心里无比激动。他有个愿望，这支新编的队伍一定要保持北伐4军的“铁军”声誉，保持井冈山“红4军”的传统。所以，南方游击队改编后的番号，叶挺特地建议叫做新编第4军。

12月，叶挺到了延安，毛泽东会见了，向他详细介绍了国内外形势，解释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亲自陪同他参观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共中央党校。在党校的

欢迎会上，毛泽东致词：“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叶挺激动他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前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来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了叶挺的心声。从这天直到他光荣殉职，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1938年：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筹备就绪。1月6日，新四军在南昌正式宣布成立，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下设4个支队，总共一万多人。3个月内，千里之外分散各个山头的各路游击健儿，都汇集到了皖南和皖中。

一开始，日军并不把新四军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几百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都不战而逃，区区共产党游击队又何足挂齿呢？国民党官兵也讥笑新四军，说是人数这么少，装备这样差，到敌后必败无疑。老百姓也为新四军担忧：可怜的新四军，无衣无食还管打仗？

卫岗一战，新四军显示的威风使人刮目相看。

卫岗在镇江到句容的公路线上，离镇江不到20公里。镇江是江苏一个重镇，也是日军在江南重点防守的水陆码头。卫岗在他们看来是个十分安全的地方。

1938年6月17日，刚从皖南东进不久的新四军一支队的先遣队，在粟裕率领下冒雨夜行军赶到了卫岗，预先在公路两侧设下了埋伏。

日军过来了。几十名日军在少佐土井、大尉梅泽等军曹的率领下，分乘5辆军车沿着公路开过来。他们进入伏击圈后，枪声顿时大作。新四军跃上公路，用自己手中的刺刀与日军厮杀起来。5辆汽车当场被炸毁，日军死伤达数十名。

镇江守敌得到消息后，连忙调来上千名日军，还有好几辆坦克、大炮甚至还有3架飞机助战。当他们赶到卫岗时，除了正在燃烧的汽车和一堆尸体外，什么也没有了。

卫岗伏击战是新四军进江南后的第一仗。这对日军来说，犹如发生了一次强地震。捷报传来，1支队司令员陈毅十分兴奋，特为卫岗初战赋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6月的江南，雨水频仍，俗称黄梅天。初夏中的湿热，给人以闷热感。6月24日，东进途中的一支新四军突击队，踏着雨后的泥泞，一步一滑地走在洒满迷蒙月色的田间小路上。偶尔可以看到村舍里稀落的灯光，听到几声狗吠声。

午夜，他们到达沪宁铁路上一个小站——浒墅关车站附近。这是日军在沪宁线中段的一个重要据点。

突击队悄悄地摸进车站，先用隐蔽动作悄悄地干掉敌哨兵，接着便摸到日军的兵房。里面，敌人正在酣睡。突击队冲上去，一颗颗手榴弹扔进屋里。“轰！轰！”几声爆炸，敌军乱作一团，没死没伤剩下的那些都拼命往外跑。

屋外，机枪、步枪已封死兵房。接着，兵屋起火烧起来。

这时，离车站不远的铁路桥方向传开一声巨响，铁路桥被炸毁了，熊熊烈焰映红了半边天。3个小时不到，战斗就告结束。

袭击浒墅关车站，造成沪宁铁路停车近3天。为此，上海、香港等地报刊都作了披露，影响极大。

黄浦江东岸的青浦，隐蔽着一支新四军。

10月的一天，数百名日伪军到青浦一带“扫荡”，不觉间接近了我军阵地。率队的叶飞一声令下：“打！”分成两路的新四军和当地民兵武装立即出击，日伪军搞不清突然冒出来的新四军有多少，赶紧调头拼命往回跑。

他们逃窜的方向是虹桥机场。支队长廖政国立即率一支部队咬住敌人，紧追不放，一口气追了60多里。

眼看天黑了，虹桥机场就在眼前。他们把守卫机场大门的伪警察和办事人员关进一间屋子，加上锁，然后冲进了机场，只见4架飞机停在机坪上。

机场周围的日军碉堡发现苗头不对，赶紧把探照灯全部打开，并开枪射击。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们的战士个个都是好样的。只见他们迅速打开了汽油桶，把汽油浇到飞机上，再把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顿时火光冲天，4架飞机全部燃烧起来。待敌军大部队赶来，我军早撤离了。

第二天，上海《导报》、《译报》、《密勒氏评论报》等中外文报刊都作了报道另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官陡门是芜湖近郊日军机场附近一个据点，地形险要。它的周围都是河汉，大约50米宽，而且极深，不能徒涉。原先几条道路全被破坏，只有架设木板才能通过，并且设有3层铁丝网和其他障碍物，铁丝网内又筑有掩蔽的战壕。据点有伪军200多人，周围据点还有1000多名日军。

1939年1月一天黄昏，粟裕率领新四军一支部队，从70里外渡河准备对它突然袭击。先头部队分两路，一路在据点前边掩蔽，另一路从据点背后进去。当他们摸到离据点30米处，对方发现了，连声问：“哪个？哪个？”霎时，机枪、驳壳枪齐发，就像爆竹店失了火一样。前边那路新四军一听枪声，知道里面已经交上火了，立即冲破铁丝网杀了进去。作预备的第2梯队迅速地赶上来控制了交通要道，并迅速占领了伪军司令部。

战斗只用了8分钟时间，打扫战场也不过20分钟。在这不到半个小时的战斗中，俘虏敌军57人，缴步枪60余支、短枪10多支、机枪4挺和大量弹药，附近日军赶到时，新四军已安全撤离了。

也许有些人会说，新四军只能打一些小规模的游击战，打不了大规模的阵地战。1939年，陈毅司令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我们没有被敌人赶出苏南，这一点是可以告慰国人的，倘若今天有人以我们不能打一个象台儿庄一样的胜仗来责备我们，这是过分的。”几百万人的国民党军队在苏南都站不住，一万多人的新四军能站稳苏南，这不是一个重大胜利吗？

究竟是新四军会打仗，还是国民党会打仗呢？

1939年元旦，国民党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冷欣所部捉到1个日本俘虏，冷欣要陈毅司令员也去看看，同去的还有不少国民党军官。介绍那些国民党军官时，日本俘虏十分冷淡，没有任何表示。当介绍到陈司令员时，俘虏立即来了一个90度的鞠躬。翻译问他为什么对陈司令特别尊敬时，他说：“新四军会打仗。”那些在场的国民党军官脸上都热辣辣的。

六、武汉会战：从防御走向相持

对武汉人来说，1938年的新年是不要想过好了。日本军用飞机屡次袭击武汉。这回，该轮到中国空军教训他们了。

2月18日，天气出奇的好。刚吃过午饭，空袭警报就拉响了。敌情就是命令！正在樊城机场的空军第4大队立即进入临战准备。不一会，战鹰就拉上了蓝天。

3000米高空刚过，就遭遇上敌机了。一架敌机居高临下向关鼎臣驾驶的战机俯冲过来，关鼎臣引它上钩后，一个急转弯，一下子咬住了对方的尾巴，敌机发现不好，可要逃已来不及，关鼎臣机上的4挺机枪齐射，这架敌机立即拖着黑烟报销关鼎臣回头一看，另一架敌机正在向我机偷袭，情况十分危急，便立刻追上去袭击敌机。可是四周已被敌机包围，没办法，只得拉开保险伞跳伞降落。

战果是出色的，共击落敌机13架。我军损失也是严重的，大队长李桂丹等5人英勇牺牲。

一些胆大的市民从防空洞星出来，爬到屋顶上去观战。一些外国记者和驻华外交官也兴致勃勃地出来观战。他们向着飞机欢呼雀跃，喝彩助威。

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日军打算再次空袭武汉，以庆祝这个天皇的寿辰。

午后，60多架飞机来到武汉上空。刚巧，苏联空军志愿队正在孝感机场。得此消息，他们和中国空军组成2个大队，立即升空迎战。100多架飞机在武汉上空摆开了战场，引来了不少观战的市民，场面煞是好看。

当时任国民政府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任政治部3厅厅长的郭沫若都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这场空战。郭沫若后来以其充满激情的笔触写道：

“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炸弹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怕应该成为‘鹰斗战’吧。忽然有的放出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

这次空战，日机被击落23架，我方损失5架。我空军英雄陈化民在遭敌机攻击、机身中弹起火的危急关头，抱着以身殉国的大志，扭转机身，向敌机猛冲过去，与敌机相撞，坠落于武昌青山之间。

武汉空战，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

武汉是中国心脏腹地重镇，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枢纽。上海、南京沦陷后，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统帅部的所在地。谁能拿下武汉，谁便能控制中原地区。

台儿庄战役只是延缓了日寇的进攻。徐州失陷后，武汉就成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了。为此，日军专门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兵团、3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140多艘，总计约35万兵力。

武汉军事统帅部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1938年4月20日凌晨2时45分，日本本上还处在一片梦乡之中时，中国空军的2架轰炸机，在空军14队队长徐焕章率领下从武汉起飞，一直飞到了日本九州上空，并继续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城市上空转了一大圈。如果这时飞机上频频落下的是威力无比的炸弹，日本军部一定会惊得跳

起来。

可是，飞机上投下的却是 20 万份传单，上面写着：“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护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当时日本有关方面发现这些传单是从飞机上扔下来的，才采取紧急灯火管制措施。

机组回到武汉时，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亲自前往迎接。然而，蒋介石下令搞的这次攻心战，对阻止日军逼近武汉，如同对牛弹琴，处于战争疯狂中的军阀迟早要把利剑指向武汉的。

蒋介石的下一步棋，便是炸毁黄河大桥和黄河大堤。6 月 7 日，郑州黄河大桥——中国当时最长的铁路桥被彻底炸毁。

6 月 9 日，郑州北面花园口黄河大堤边，国民党军队先用炮轰，再用人挖，终于扒开一道 2 丈多宽的缺口。缺口一开，滚滚黄河之水滔滔而下，堤坝口被越冲越宽，直至 100 多米。汹涌而来的黄河水涌进了河南、安徽、江苏 3 省 40 多县的 1700 多万亩耕地。首当其冲遭殃的是中原地区的老百姓，一下子死了 90 多万人，还有 610 万人挣扎在汪洋泽国之中。

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日军有没有被挡住呢？没有。日军仅仅一个骑兵团支队的退路被截断，继而被消灭，其他日军大部队并未损伤丝毫。

不久，日寇把豫东的军队调向南方。蒋介石又下令用轮船装满石头，在马当附近沉入长江，把长江航道堵塞，以阻止日军舰队前进。此举仍然无济于事。6 月 15 日以来，日寇沿长江南下，先后占领马当、湖口、九江、宿松、黄梅等地。

武汉会战看来不可避免了。这一战不仅是武汉本身，它是以武汉三镇为中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及湘赣为外围展开的。为此，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李宗仁的 5 战区、顾祝同的 3 战区、程潜的：战区从外围作战，还新组建第 9 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负责武汉防务。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一周年。处于日军进攻态势中的武汉，对此更为敏感。刚担任第 9 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以特大字号在《武汉日报》醒目标题下刊登《以全力保卫大武汉》的文章，文章号召：“我们每个人都同固守大武汉见危受命的责任，每个人都要以空前的努力，无比的忠勇来准备奋斗牺牲。”“保卫大武汉，为当前最急迫的任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每个人民的具体贡献，人人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去进行英勇的光荣的战斗。”

素有三大火炉之一雅号的武汉，气候炎热难当，但人民的抗战热情比这酷暑更热。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重心放到了武汉，到处都可听到卖《新华日报》的喊声，到处都可看到街头宣传抗日的文艺演出。郭沫若出任政治部 3 厅厅长后，战地宣传、战地服务红红火火，工人、农民、商人、职员 的捐款很快超过百万，孩子们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掏出来了。

这一段，国民党决心抗战的确是认真的。然而，防卫是否真象决心那样坚决、象口号那样响亮呢？

长山指挥部观测所。这天，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陆战支队第 2 大队队副杜隆基正用高倍望远镜观察江面，只见封锁线外有 3 艘日军舰艇在试图排除水雷。这种状况虽说已经有好几天了，但今天总觉得不对劲。

杜隆基想和 3 总队 1 大队通话，可是奇怪，电话怎么也要不出去。再摇 16 军 313 团，还是不通。糟了，要出事了！

这天是6月24日，16军军长李韞珩办了一次为期2周的抗日军政大学训练，今天举行结业典礼，上尉以上的主官大多数都参加结业典礼去了。隆重的典礼结束了，大家又留下来参加欢庆宴会，一个个举杯痛饮，喝得满脸通红。

杜隆基想我的任何部门的带队长官都找不到，正在此时，通讯兵边喘着粗气边跑进来：“报、报告，香口街上发现日军。”杜隆基的脑袋象被猛击了一下，他好不容易才要通马垵要塞司令部的电话，可是要塞司令王锡煮也去参加结业典礼、去划拳碰杯了。

日军在中国军官的碰杯声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占领了香口街，接着便占领了香山。从香山上看长山炮兵阵地，看得清清楚楚。上午8时，日军向长山阵地发起攻击。

日军3个突击组在炮火掩护下企图穿越大白湖水荡，被长山阵地中国守军发现。轻重机枪立即吐出愤怒的火舌，敌突击组士兵一个个倒在水里。

几天来，封锁线的水雷已被敌军排除了10多颗。此时，日军估计威胁已大力减小，便耀武扬威地来闯雷区了。19艘日舰对着长山阵地炮弹齐发。在猛烈炮火袭击下，长山阵地守军伤亡严重，日军趋势乘着汽艇向阵地靠近。

阵地危在旦夕，突然，听得空中一阵马达轰鸣，9架中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日舰上空。飞机向日舰一阵轰炸，日舰炮火哑了。飞机一走，它又要轰击了。不料又是9架飞机冲着日舰而来，炸弹在舰上不断开花，只听一阵阵哭叫声。日军不甘失败，他们的飞机也凌空前来助战，结果被中国炮兵击中。敌机在长山上空爆炸，引起阵地上守军的阵阵欢呼。

如此江防，要没有空军助战，真不知会怎么惨呢！当天下午，蒋介石来电嘉奖，陈诚也传令嘉奖。那些在阵地上奋战的长山阵地守军的确应该褒奖，空军英雄也该赞扬！那些都去碰杯的官长们呢？

马垵要塞一个步兵营在两天来日军的猛烈炮火下再难维持，援军却迟迟调不上来。6月26日，长山阵地终于失守。

在马垵战役前的安庆战役，国民党军6个军13个师竟不敌日军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和海军陆战队3个连的兵力，致使安庆不战而自动放弃。安庆失守，武汉江防等于失去了前哨；马垵失守，武汉江防的门户也被攻破。

7月的庐山。这个昔日游人如织的避暑圣地，如今却成了武汉会战的外围主战场之一。

日军华中派遣军烟俊六大将指挥的106师团攻陷湖口、九江后，国民党军第2兵团司令张发奎命令19师撤至庐山一带阵地。以阻击日军深入，掩护其他部队后撤，他自己却缩回南昌去了。

7月31日，日军106师团主力企图从金官桥、沙河一带突破，几次进攻都遭到19师交叉人力的阻击。第二天，日军集中飞机大炮猛轰19师阵地。19师官兵在异常艰难的情况下把牯岭守军移至牯岭西南的鸡窝岭，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压制敌军。

果然，战斗一打响，地形的威力就显示出来。敌军的飞机大炮再凶猛，却不敌我军从高处予以反击的迫击炮、重机枪。日军几次冲锋都无法得手，山野里到处是敌军死尸，血流遍野。打了4天，两座山的峡谷里一片焦土。大暑天里，战场来不及清理，尸体来不及运走；整个山谷血腥尸臭，不堪目睹。

战斗到第5天，19师114团团团长刘阳生阵亡，战场上没了主心骨，眼看

阵地就要失守，鸡窝岭阵地上的 110 团利用高处交叉火力网，再次把敌军击溃。从缴获的敌军遗尸中的日记中看到，他们写下如下记录：“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全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

战斗坚持到 8 月中下旬，敌军仍然紧紧咬着鸡窝岭这个钉子。一天早上，敌军分 3 路又往上爬。当其进入有效射程内时，鸡窝岭上的手榴弹、迫击炮、机枪一齐响了起来，敌军纷纷倒下。敌军几次想上，就是上不来。8 月 27 日，团长刘湘乘敌炮延伸之机，率一个营加一个连发起冲锋，敌军溃退。从此，敌人再不敢冒险仰攻。

有个专科学校毕业的敌兵在日记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难见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皇军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第 19 师的坚强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的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是困难的。”

庐山之战打得英勇顽强。德安瑞昌之战，条件极好，地形是一道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日军一个随军记者说这里“足当百万军，可作战一年”，而国民党在此却未支持半日。

江阴、马挡、田家镇几个江防要塞接连失守，给长江中海军压力极大。

“中山舰”，这艘具有北伐光荣传统的舰艇，如今在武汉战役中尤其出色。15 架日机对它狂轰滥炸，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坚持不下火线，用手紧抱着铁柱坚持指挥。

终于寡不敌众，“中山舰”被击沉，全舰官兵英勇殉国，在中华民族海军作战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又一页。

10 月 11 日，广东大亚湾。日军 21 军在几乎未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登陆成功。10 天后，驻守广州的 12 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丢弃广州而后撤，广州沦陷，中国失去了唯一通往海外的门户。日寇可从粤汉铁路直达武汉。

10 月 22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看来，现实使蒋介石都在用持久战的思想来思考问题了。

整个武汉会战，国民党战略部队达 134 个师，110 万人，日军则只有 9 个半师，不足 20 万人。兵力比是 14 师：1 师，人数比是 6：1。古人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结果竟被战败，令人不可思议。尽管如此，武汉外围仍然还有大量兵力，后来的随枣战役、长沙战役、昆仑关战役、上高战役等，实际上都是武汉会战的继续。

武汉会战使抗战防御阶段达到高潮，又是相持阶段的开始。1938 年整个：年里，华北、华中战场上的八路军、新四军毙伤、俘虏日伪军已达 3 万 6 千多，抗敌达 40 万，占当时侵华日军半数以上，成为抗日战场的主力。它使日寇在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向更深的腹地进攻，而必须花大力来对付华北、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从而使日寇陷入了战略相持的漫长泥淖之中。

第四章 抗战逆流

一、远东慕尼黑

1938年9月15日。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的高山别墅。二楼书房里，德国元首希特勒正和英国首相张伯伦进行会谈。

张伯伦已经69岁了，他这辈子还从来没坐过飞机。可是，他为了给英、法带来“永久的和平”，不惜自己已是个耆年老者，居然坐了4个小时的飞机，从伦敦来到慕尼黑。

在慕尼黑，希特勒没到机场来迎接他。一辆敞篷汽车把他运到火车站，从那儿又坐了3个小时的火车到了伯希特斯加登。希特勒仍然没到火车站来迎接他。迎接他的，却是一列又一列满载德国军队和重炮的火车，它们不断地在张伯伦眼前开过。

汽车开上了盘旋公路，空中一阵黑似一阵，乌云遮住了群山。下午4时左右，才到达希特勒的高山别墅。早上从伦敦起飞到现在，张伯伦赶了11个小时的路。

希特勒毫不客气，他不顾张伯伦的年事已高，也不顾他旅途疲劳。在喝了点茶后，二人便开始会谈。

这个自负的日耳曼人，象往常的演说那样，滔滔不绝地吹嘘他对德国人民、对世界和平、对英德亲善所做的丰功伟绩。张伯伦只好象小学生那样洗耳恭听，连一句话也插不上。好一阵子，才接触到了正题。希特勒说，他已下定决心，不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境内300万日耳曼人必须“重返”德国的问题。

张伯伦心里当然明白，这个300万人的概念，特指捷克的苏台德区。因为，还在希特勒上台不久，他就通过他的代理人康拉德·汉伦组织了“苏台德日耳曼人党”，这个被人称为“小希特勒”的汉伦不断地在捷克制造事端，目的就是为把苏台德从捷克肢解出去，划入德国版图。张伯伦这次就是专门为这事来的。

“如果元首已决定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根本不想在我们之间讨论一下的话，那么为什么还要让我来？”张伯伦禁不住问了一声。

希特勒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敢和他顶嘴，便用咄咄逼人的口吻亮出了他的底牌：“英国是否同意割让苏台德区？”同意不同意让苏台德人“按民族自决的原则作出的割让？”

使希特勒意想不到的，张伯伦的回答出人意料地干脆。张伯伦说，他个人可以说承认苏台德区脱离捷克的原则，他希望口到英国向政府报告他的个人态度，并且取得政府的批准。

其实，在他来德国之前，他就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商量过这件事，张伯伦心里对此事早就有答案了。英、法为何要满足希特勒肢解捷克的野心呢？因为，在英、法看来，希特勒的确是他们的威胁，但却不是最大的威胁。最大的威胁，他们认为是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苏联。英、法希望希特勒去打苏联。为了把祸水东引，希特勒的一切其他要求都可以满足，包括在西班牙建立势力范围，包括现在对捷克的领土要求，都要予以满足，只要德国这股祸水能引向苏联，英、法就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为了让希特勒不费一枪一弹就能得到苏台德，张伯伦不辞疲劳，16日回

到伦敦当晚，就召集内阁开会，希望他提出的满足希特勒要求的建议能通过。2 天以后，达拉第和他的外交部长庞培到伦敦同张伯伦商量。很快，双方就提出了一项办法：“凡是苏台德区的日耳曼居民占 35% 以上的全部领土，都直接转让给德意志帝国。”并逼迫捷克政府要“立刻接受”这项“建议”。捷克政府明明知道自己的祖国“被卑鄙地出卖了”，仍然屈服于英、法的压力，接受了这个“建议”。

张伯伦以为，他为希特勒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苏台德，希特勒应该感激他。9 月 22 日，张伯伦乘坐的飞机在德国一座小城戈德斯堡降落时，只见仪仗队肃立，乐队高奏两国国歌，到处插着卍字旗和英国国旗，他自我感觉极为良好，以为希特勒会对他另眼相看。

下午，他坐渡船渡过莱茵河，希特勒在其老朋友德莱森开的饭店里等候他。这次轮到张伯伦滔滔不绝发表议论，希特勒洗耳恭听了。半晌，张伯伦的话讲完了，希特勒开口了。

希：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英国、法国和捷克政府已协议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德国？

张：是的。

希：我极其抱歉，由于过去几天内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已经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

听了这些，张伯伦吓了一跳，他那猫头鹰似的脸涨得通红。他感到极为难堪，因为希特勒象一个欲壑难填的奸商，不断在向他敲竹杠，他一松口就立该涨价了。眼看他为“和平”搭建起来的“大厦”顷刻间就要倒塌，他当然不会甘心。他奉劝希特勒先按这个办，再考虑新的要求。

希特勒却不为所动。会谈僵持了 3 小时，毫无结果。9 月 23 日晚上 22 时 30 分，希特勒交给张伯伦一份备忘录，还附有一张新的地图，上面只有一个新的期限：捷克人应在 9 月 26 日也就是两天以后上午 8 点开始撤出割让地区，而在 9 月 28 日撤退完毕。这份地图上，除了苏台德区割让外，还有捷克南方说德语的几个地区。

“这不是最后通牒吗？”张伯伦无比感叹。

希特勒立即反驳：“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根本不是什么命令。请看，文件上明明写着是‘备忘录’。”

真一副活脱脱的流氓相。

希特勒太过份了。当张伯伦把这个“备忘录”的要求转达给捷克政府时，捷克国内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在国内舆论压力下，捷克政府拒绝了德国的要求。苏联政府通知法国，在苏联西部边境已有 30 个师的红军集结待命，只要捷克政府求援，红军就立即行动。德国国内 80% 的德军军官也认为，一旦战争打起来，德国非失败不可。

形势显然对希特勒不利！

然而，英、法却坚持要祸水东引，坚持要把捷克出卖给德国。张伯伦向达拉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法国凭什么去打仗？法国能投入多少兵力到战场上去？法国的机械化部队有德国那么多吗？法国空军能同德国较量？炸弹如雨一般落在巴黎，你怎么办？张伯伦紧紧拉着达拉第，并要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出面安排一个不包括苏联在内的大国会议，以讨论捷克问题。

希特勒简直高兴极了。这对正在走钢丝的他来说，无疑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大利本来就是法西斯国家，墨索里尼当然乐于帮希特勒这个忙。

美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他却极力支持英、法的做法。

9月29日午后12时30分，希特勒在慕尼黑迎接英、法、意3国政府首脑到来。12时45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在柯尼斯广场的元首府内开始了。

会议进行到次日凌晨1点，4国领导人终于在《慕尼黑协定》上签了字，这是对捷克斯洛伐克主权的大叛卖！《协定》共8条，主要内容是：捷克政府在10天内将苏台德区和与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再成立“国际委员会”来确定其他地区的归属。

捷克代表只能坐在隔壁房间的冷板凳上，象一只羔羊一样，听任强盗的宰割。

张伯伦回到伦敦后，在唐宁街10号的3楼阳台上面对欢迎的人群笑逐颜开地说：“我的好朋友们，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希特勒可不象张伯伦想象的那么天真。就在慕尼黑会议开幕当天，据当过意大利议长的齐亚诺说，在开往慕尼黑的火车上，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说过：“终有一日我们要并肩对英国和法国作战。”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1939年3月30日，斯洛伐克被策动脱离捷克而“独立”。同时，德军越过《慕尼黑协定》规定的新边界，占领了布拉格。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并入了德国版图。

9月1日，德军“闪电式”地侵占了波兰。之前，张伯伦、达·拉第又想在波兰搞一次“慕尼黑”，但希特勒已经等不及了。

1940年4月，德军占领丹麦、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40万英法联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这个天然港口。这时，英国顾不得法国了，5月底到6月初，英国动用大量船只把英军撤回本土，大批法军成了德军的俘虏。

6月，英国本土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烂炸。法国在德、意夹击下陷落。张伯伦在国难当头被迫下台，不久死去；达拉第被贝当傀儡政权押送到德国去了。

慕尼黑的阴谋，是英、法自导自演，自食其果的一场丑剧。本来，他们希望把祸水引向苏联，没想到最终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938年夏，东京，日本外务省。

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与日本外相字垣正在举行会谈。自广州、武汉沦陷后，英国在华利益遭到巨大损失。奇怪的是，克莱琪不是来向日本抗议或者索赔的。相反，他向字垣表示：“英国只要日本能接近民主国，即使在长江方面受点损失，与日本妥协都是可以的。”

从这种反常举动不难看出，“慕尼黑”之风已经从欧洲吹到远东来了。看来，英国也要在远东导演一场“慕尼黑”，希望能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苏联，为此不惜中国的利益，甚至英国的在华利益。

日本看透了英国的软弱。对软骨头只有强硬，才能使其让步。1939年以来，日本先占领了海南岛，继而又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7月，东京连续出现反英示威，日本浪人捣毁了东京英国使馆。

克莱琪坐不住了，日本的大棒把他敲到了谈判桌边上。7月15日，他与日本新任外相百田开始谈判。22日，《百田—克莱琪协定》签字。英国确认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造成的一切既成事实，承认这场战争是“必要的”，“合理的”。

华盛顿也不甘落后。

1940年，一份从标题到内容都很奇怪的文件出笼了。这份文件叫做《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军队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简称《日美谅解方案》。这是美国两个神父同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岩畔等人用了2个月时间炮制出来的。

主要内容是：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不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只有在德国受到侵略进攻时，日本才能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由美国方面出面敦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谈判，如蒋政府拒绝，美国停止援蒋；等等。

罗斯福总统收到这个方案后又作了补充，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开始了秘密谈判。

所有这些，后来罗斯福也承认：“我们无论在事实上，或是在实质上，都是在讨好日本。”

1938年夏秋季，英国驻中国大使卡尔杉极其活跃。他利用英、美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频频穿梭于上海、重庆之间，多次与蒋介石秘谈，逼蒋介石与日本“和谈”，还提出要召开“远东国际会议”，由英、法、美出面调停，解决中日争端。

对这种十分明显的远东“慕尼黑”倾向，蒋介石是十分欢迎的，他说：“太平洋国际会议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孔祥熙和重庆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公开发表讲话，欢迎英、美调停，以解决“中日之纠纷”。

英、美为什么如此怂恿日本？在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抗战是不可能取胜的。张伯伦说过，中国抗战“已经濒临崩溃”，“蒋介石就要变成（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了”。美国也这样看，他们认为“也许1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就会被一个日本的傀儡政权所取代，那时全中国就会变成一个大满洲国了”。

这是他们导演远东“慕尼黑”的出发点。

中国毕竟不是捷克，远东“慕尼黑”阴谋最终要破产。形成这一结局的原因，除了希特勒在欧洲全面爆发战争，英法遭受沉重打击，美国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遭受日本突然袭击的现实外，中国共产党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及时揭露也起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1939年6月向国人敲响警钟：“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就是远东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中共告诫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推动各方共同行动起来，”“反对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

正是把英、美、日、蒋的种种幕后交易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远东“慕尼黑”阴谋才没有得逞，但这个阴谋对中国国内的投降势力趋于猖狂，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汪精卫

慷慨歌燕市，
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这是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一首五言诗，它的作者，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汪精卫。1910年他参与对清朝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被判处极刑后，他作过悲壮动人的《被逮口占》4首，前面所录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担任《民报》主笔时常以“精卫”为笔名。“精卫填海”是古代的美丽传说。精卫是鸟名，相传炎帝女儿女娃游东海而死，化作精卫鸟，常去西山衔石填东海。汪精卫以此鸟名作自己的名字，表示了他坚定反清革命的决心。

然而，这个早年的革命家，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大人物，30年代竟堕落为中国举国声讨、“国人皆曰可杀”的头号汉奸卖国贼，成为中华民族十恶不赦的罪人。

重庆珊瑚坝机场。1938年严冬，嘉陵江上一阵阵凛冽的寒风不时地灌进这座山城，格外寒冷。

12月18日上午9时，一辆吉普车飞驰而来。车上下来三男一女，其中有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死党曾仲鸣等人。只见他们个个神色紧张，惊慌有余，离预定时间只有5分钟了，一辆黑色小轿车驰进机场，汪精卫等3人下了车。

他们上的这架飞机，是从重庆飞往昆明方向去的。这次旅途，迈开了汪精卫正式叛国投敌的第一步。

汪精卫走上这条路，最初是由他与蒋介石的矛盾引起的。

汪、蒋早年都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但无论是资历还是地位，蒋都无法与汪相比。孙中山临终前的遗嘱是汪精卫代为起草的，其地位曾达到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广东国民政府主席。

蒋介石后来居上，根本就在于他握有军队。1924年的“中山舰事件”，表面看蒋介石在反共，实际上连同汪精卫一起排挤。1927年蒋发动“4·12”政变，汪精卫也在“7·15”从“左派”迅速变成右派，汪蒋趋于合流。但是，汪精卫一向以国民党的“正统”自居，他对蒋介石独揽大权、大搞独裁却极其不满。

1935年11月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开幕时，汪精卫被刺，旋即出国疗养一年多。当他回国时，国内已发生重大变化。西安事变促成了蒋介石再度被迫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汪精卫却仍然坚持反共顽固立场。虽说蒋介石抗日也不坚决，时不时也会弹几句和谈老调，但他站在英美派立场上，与日本有根本利害冲突。汪精卫则不同，他早年在日本时间较长，对日本天然有好感。加上他顽固反共，看不到中国抗战力量之所在。卢沟桥事变后基本立场是悲观、妥协的。他和周佛海等组成的“低调俱乐部”搞到一起，认为“战必大败”，“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恰逢此时，远东慕尼黑之风吹到中国，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站在日本立场上搞中日间的“调停”。虽然蒋介石对此也取赞许态度，但却比不上汪精

卫对此极为卖力。可是，日本当时正志得意满，为报台儿庄之仇而大举围攻徐州，“和谈”要价也越来越高。这样的“调停”当然无法成功。日本见蒋介石不上钩，便改变策略，希望“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把诱降目标正式转向了汪精卫。

日方的方针与汪精卫的主和思想一拍即合。这年11月中旬，汪精卫派梅思平、高宗武去上海，与日方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梅机关”的首领影佐侦昭、今井武夫等人在江湾路东体育会馆一座花园洋房进行谈判。这座叫“重光堂”的别墅名义上原是土肥原的公馆，现在是日本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的别墅，实际上是“梅机关”的所在地。梅思平、高宗武与影佐等人达成多项密约，双方商定汪精卫不日便脱离重庆政府，日本政府为此发表议和的声明。

11月27日，梅思平把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象做贼一样从香港飞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汪与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曾仲鸣等人商议后，决定经昆明到河内，再到上海，以秘密出逃的方式脱离重庆政府，正式投靠日本。

于是乎，他们抓住蒋介石外出演说、汪精卫不必出席的机会，演出了重庆珊瑚坝机场那匆忙出逃的一幕。

汪精卫一行刚上飞机，只见空军司令周至柔出现在他们前面，十分恭敬地前来谒见汪精卫。汪紧张起来，以为他们的计划暴露了。其实，周至柔不过是同机去昆明而已。

为在“副总裁”面前露一手，周至柔亲自操纵起驾驶杆来。汪精卫做贼心虚，却又不好阻拦他。曾仲鸣只好让汪的卫士桂连轩处于戒备状态。陈璧君惊叫一声：“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驾驶员哈哈一笑：“是沧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真是虚惊一场。

下午1时，昆明到了。汪精卫走出机舱，没想到“云南王”龙云率领当地文武大员肃立机前，军乐大作。这是怎么搞的？当初不是商定严格保密的吗？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原来，这是龙云一个计谋。他怕别人以为他事先知道此事，将来在蒋介石面前不好交待，才布置了这个热烈欢迎的场面。

第一天，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陈春圃、陶希圣、曾仲鸣等十多人乘飞机离开昆明去河内。过了一天，陈公博也从成都直接去了河内。

河内，高朗街27号。这幢法式2层小楼原是军阀朱培德的公馆，环境宜人。虽然时值寒冬，亚热带气候却十分温暖可人，院内的法国梧桐绿荫正浓。

汪精卫住进这幢小楼后不久，日本内阁以近卫首相的名义发表了“对华声明”。这一声明，比《重光堂密约》进了一步，条件更加苛刻。虽然如此，汪精卫叛国投敌的决心却并不动摇。

12月29日，汪精卫的“艳电”（“艳”即29日）——投降日本的声明正式发表在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它公开要求重庆国民政府响应近卫声明，“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否则将“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艳电”一发表，遭到全国上下一片反对，连龙云这个当时送汪出国的人都发表通电予以反对。

1939年2月的一天，高朗街27号客厅里来了一位长者，他就是蒋介石秘密派来的谷正鼎。

汪精卫一行出逃后，开始蒋介石还为其保守秘密，给汪留了条后路。哪知“艳电”一发表，此事再难包住。元旦，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但是，蒋对汪还未死心，希望死马当活马医。2

月，蒋派他的秘书陈布雷和外长王宠惠去河内，送汪经费，劝其出国休息。汪收了钱，话却听不进去。

谷正鼎是国民党改组派老人，国民党资深中委，他是蒋介石派来劝汪的第3人。他带着汪精卫、陈壁君、曾仲鸣3人的护照和一笔巨款。见了汪精卫，便转达了蒋介石的话：“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壁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并要谷给蒋介石传话：“他如果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这些话能成为当汉奸的理由吗？

蒋介石被激怒了。

3月19日，他通过号称“戴老板”的“军统”特务头目戴笠，给正在河内的陈恭澍去电：“着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原来，在谷正鼎去河内前1个多月，戴笠就奉蒋之命，在河内设置了陈恭澍行动组，要他对汪精卫予以监视。

次日晚23时40分，陈恭澍带了6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来到高朗街27号后门。外留2人接应，4人翻墙入内，从屋后小门上楼，冲到事先探知的汪精卫卧室外，用利斧在门上劈开一洞。屋内漆黑一团，伸手不见五指。凭借手电筒光亮，特务看到里面有一男一女，男的听到响声已爬到床底下。特务认定这就是汪精卫，并开枪连击，那男的倒在地上，地板上留下一大摊鲜血。

其实，那天屋里住的不是汪氏夫妇。那天白天，刚巧曾仲鸣的老婆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的卧房让给曾氏夫妇住。结果，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汪精卫则得以化险为夷。

刺汪未果，终导致汪、蒋彻底翻脸。

广东汕头海面，飓风刮得正猛，风暴卷着巨浪。一艘小货轮在风浪中一簸一颠，十分艰难地向一艘大轮船靠近。这艘叫“芬·福林哈芬号”的法国小货轮好不容易才靠近了叫“北光丸”的大货轮，有几个人战战兢兢地通过救生艇爬上了“北光丸”。爬上去的那几个人，正是仓皇出逃中的汪氏一行。

高朗街的枪声，使汪精卫感到在河内难以再呆下去。4月25日夜里，汪精卫在海防附近登上法国小货轮。本来，日本人要他们直接登“北光丸”的，汪精卫觉得有失“体统”，还得顾一顾面子。没想到，海上风浪十分厉害，小货轮实在颠得吃不消。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在颠了5天后，终于向“北光丸”发出信号，于汕头海面碣石湾的湾口爬上了“北光丸”。

当天晚上，汪精卫赋诗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干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谁都知道，“过零丁洋”是南宋末年文天祥的著名诗篇。文天祥是个颇具强烈爱国精神的热血将领，他在蒙古侵略势力面前大义凛然，英勇就义，汪精卫却要反其道而用之，“凄然不作零丁叹”，表示他自甘堕落的心态。

5月6日，“北光丸”到达上海虬江码头。在日军保护下，汪精卫一行住进了重光堂——原土肥原公馆。

一架日本海军飞机徐徐降落在日本横须贺的追滨机场。汪精卫一行从那儿再换乘汽车去80公里外的东京。

虽说日本军政要人都接见了汪精卫，但他的如意算盘并非那么容易实现。原先汪精卫想利用他的“党统”、“法统”建立一个以他为首的中央政府，没想到日本方面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日本希望原先属于日军控制的地区和伪满洲国、华北傀儡政权下控制的地区都不准汪精卫染指，这个“新中央政府”，除汪记“国民党”势力外，还包括原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伪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伪维新政府头目梁鸿志等。

这不是一个空架子吗？汪精卫想撒手不干了。于是，他提出“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来要挟与他谈判的权垣征四郎。陪同汪赴日的“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把脸沉下来了：“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在坂垣、影佐施加的压力面前，汪精卫除了屈服别无他法，只是日方后来同意把临时、维新两傀儡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以顾全一下汪精卫“新中央政府”的面子。

接下来，双方在“国旗”问题上僵持了好长时间。汪精卫一向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他建立伪中央政府也要打着“国民党还都南京”的旗号。所以，他坚持要以原来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作“国旗”。坂垣大会如何不同意。他说：“现在前线正和青天白日旗的抗日军继续进行战争，如果现在突然使用国旗，将会发生混淆，引起种种误解。”

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日方提出在青天白日旗上方加上写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三角形小黄旗，以示区别。汪精卫不同意也只好同意了。周佛海说这条小黄旗象条“猪尾巴”。

汪伪政权公开登台亮相，还必须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加以确认，这就是汪记国民党“六大”。

最初把“代表”名额定为300人。上哪儿去弄那么多“代表”呢？凡是能够拉来的特务、死党、亲戚、朋友都拉来了，还差很多，怎么办呢？只要能凑数，威胁、利诱甚至绑架都用上了。

上海有个颇具知名度的中学校长，有一天应邀去朋友家吃饭，宾客一共6人，吃完饭一起相约游兆丰公园。汽车刚到静安寺附近一座大厦，大门顿时打开，几个人被送了进去。在杀气腾腾的刺刀护送下，他们来到一间装饰豪华的大客厅，一个病态恹恹的人正坐在那儿“恭候”，这就是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丁默村。这些人在一张纸上摁了手印，就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代表”。

就是这样，最后还只落实了100多名。

8月28日上午，汪记“六大”在汪伪特务机关——臭名昭著的杀人魔窟、上海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内一间石库门房子召开。会场戒备森严，进出“代表”都要接受搜身。

外面是瓢泼般的大雨，门口却搭起一座彩色牌坊，用灯泡组成一个“寿”字，以掩人耳目。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正孕育着一个卖国傀儡政权。

汪记“六大”宣布重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的“死刑”，宣布废除总裁制，

设主席制。接着便选举“中央委员”。在候选名单上，一大批老牌汉奸赫然在目，会场上引起了骚动。

有个叫胡志宁的“代表”要站起来发言，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突然，汪伪特头目李士群带了两个彪形大汉过来站到胡的左右，另一头目丁默村向胡挤眼睛，要他“识相点”。胡志宁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汪精卫赶快出来打圆场：“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要宣读‘大会宣言’，请大家通过。”

所谓“大会宣言”，无非是按“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授权汪同志”，领导大家积极推行“和平运动”。

弄到这个份上，日本方面还不满意。他们意外发现“代表”中居然还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派出的“代表”，便提出责问：“该地已建立满洲国数年，与这个会还有什么关系？为何派代表来开会？”当汉奸也有疏漏的时候，大会“秘书长”梅思平还为此向日方“道歉”才算了事。

有了“党统”，汪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又进入了筹划之中。北方的临时、维新两“政府”头目王克敏、梁鸿志对“六大”决议颇为不满。本来他们是儿皇帝，现在却把这个地位让给了汪精卫，自己被降格为儿皇帝的臣仆，心里当然不高兴。

但儿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在汪伪政权公开亮相前，日方要从傀儡身上狠狠地剥下几层皮来，就象当年对待“满洲国”和溥仪那样。

11月1日，日汪双方在上海六三花园一座小楼里“谈判”。日方的胃口更大了，许多要求大大超过了《重光堂密约》和近卫政府声明的范围，尽管这是一场刺刀下的交易，但也免不了讨价还价。最后，这个密约于12月30日黄昏时，由汪精卫最后签字画押。

这个“密约”，比袁世凯时期的21条更加厉害。例如军事上，日军将拥有驻屯权，在驻屯范围内有铁路、航空、通讯、水路的要求权及监督权，日本军事顾问有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经济上，日本有开发特定资源的企业权，拥有铁路、通讯等优先地位，还有许多其他特权。按这个“密约”，中国的主权将所剩无几。

也许太见不得人，双方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怎么也料不到，“密约”刚签字不到1个月，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就全文公开披露了这个“密约”。原来，就在这当口上，参与谈判的高宗武、陶希圣突然叛汪而去，倒戈于重庆方面。

高宗武本来想当“外交部长”，日本人不同意，汪精卫也说他“年事太轻”，他一肚子不满。陶希圣是个好利之徒，他本想当个“工商部长”，没想到却只捞到个没有油水的“宣传部长”。两个人凑到一起，越想越窝囊。

重庆方面趁机前来“策反”，宋美龄亲自出马，要高宗武的妻子说服高离开汪精卫，重庆特务也威胁她说，如果高宗武继续效忠汪精卫，就要对不起她了。蒋介石甚至亲自过问此事，专门要上海帮会势力的“老头子”杜月笙给高宗武带信，以拉拢高。

1940年1月3日，高、陶带着偷拍的“密约”原文，在杜月笙协助下乘美国“总统号”轮船离上海去香港。到重庆后，高、陶成了蒋介石的亲信幕僚。

高、陶的离去是对汪精卫最致命的一击。手下本来没几个骨干，一下子去掉两个。没办法，只好派陈璧君去香港，把陈公博请出来参加政权。陈璧

君半哭半骂：“公博！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都这样态度，不肯帮一点忙，局面怎样展开？汪先生急极了，他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样对得起汪先生？”

这番激将法把陈公博的愚忠激起来了，他毅然说：“夫人！我明白了。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请夫人先回，报告汪先生，我随后就到便是。”

3月30日，南京城里到处挂起了带有“猪尾巴”小黄旗的汪伪“国旗”。上午7时半，汪记“国民党还都”仪式在原考试院大礼堂举行。苍老憔悴的汪精卫以伪国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宣读其“就职”演说。

伪政权建立，没有一丝喜庆气氛。楼鼓、新街口一带闹市区森严的戒备，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是恐怖气氛。各使节一个都没来“祝贺”，而占领南京的日本派遣军司令也没参加。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日本人为什么突然把汪精卫冷落了，原来，此时此刻，日本正与重庆方面拉关系，今井武夫等人正在香港与重庆“某要人”接洽。日本政界一些要人公开宣称，只有蒋介石才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找蒋介石，那汪精卫又往哪儿摆呢？他们说汪精卫“在历史上总是抛弃同他合作的人。不过在目前形势下，日本也只能找到象他这样的人”。

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汪伪小朝廷，连日本人都认为它无足轻重，还能有其他什么价值可言呢？

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941年1月18日，浓雾中的陪都重庆。

满街的“卖报”声，伴随着山城的寒风。人们稍加注意，就可看到一些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正在分发报纸，他们是《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位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也和大家一起，正忙碌地分发报纸，他就是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大智大勇的周恩来。周恩来这一举动，旨在抗议国民党、蒋介石一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议国民党军队屠杀新四军数千官兵的重大惨案。1月17日，正是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新四军“叛变”并取消新四军番号的时候，周恩来悲愤至极，挥笔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还写下一首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并趁着当晚《新华日报》因为“检查”而开“天窗”的机会，把印有挽词、挽诗的《新华日报》赶印出来，从山后偷运进城，使皖南事变的消息冲破山城的浓雾传遍了全城。19日，经周恩来修改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的真相》一文，以传单的形式散发到重庆各处。

皖南事变，意味着远东慕尼黑和投降阴谋愈益猖獗，国民党当局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

蒋介石早年在上海时，曾经和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多年证券生意，这段经历使他与江浙财团、上海帮会流氓势力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这种环境中走过来的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就和他当年玩证券那样，始终在中、日、英、美几股势力之间玩平衡。他采取对日本抗战的基本态度，主要是从江浙财团和英美派的利益出发。在抗战中他又要和日本搞妥协，时不时弹弹“和谈”调子，是希望与日本及国内的亲日派搞平衡。

日本要价太高，他就打；日本拉拢他了，他就谈。基本立足点盯着英美，总希望英美在国际上迫使日本撤军。

远东慕尼黑阴谋前后，蒋介石多次派人与日本拉关系。汪精卫出逃，外界传言纷纷，有的说汪是受了国民政府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汪出逃第二天，蒋在日记中表示“痛惜之至”。汪伪政权建立，汪精卫自任代理“主席”。“主席”的位子让给谁呢？表面看给林森，实际上不言自明。陈公博曾经说：“战由蒋先生战，和亦当由蒋先生和，南京地位只好处在一个中间交涉的地位。”1940年初，今井武夫等人在香港与重庆接触的“某要人”，据说是指宋美龄一族的兄弟宋子良。尽管后来证实，这个“宋子良”是军统特务曾广假冒的，但宋美龄亲自参与了此事的策划。

投降、和谈带来的副产品，一定是反共高潮不断迭起。国民党5届5中全会公开提出“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指导原则，反共的内部文件纷纷出台，“平江惨案”、“竹沟惨案”等屠杀新四军、八路军的血案一个个被制造出来。

一向奉行“中庸之道”的阎锡山，过去经常标榜自己是善于在3个鸡蛋上跳舞的专家，如今再也按捺不住其真面目。1939年12月，由他策动的“12月事变”充当了反共高潮的急先锋。

阎锡山命其所部61军等部队从背后进攻八路军决死队第二纵队。这个纵队的政委韩钧致电阎锡山表示抗议。接到电报后，阎锡山立即召开高级干部

会议，摆出一副声颤手抖的气呼呼模样：“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12月12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韩钧反了。”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已“叛变”，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结果，决死队二纵队损失惨重，只好被迫转移。

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主力新358旅对阎军坚决反击，打退了他们的进攻。

1940年2月25日，肖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阎锡山长官部。临行前，毛泽东说：“你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诚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擻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得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是软弱可欺。”

双方见面一谈，阎锡山理屈词穷，不得不答应与八路军停止冲突，划区抗敌。谈判结束时，肖劲光强调：“我们的原则，毛主席已明确讲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6个字，报界可以公布。”阎锡山不自然的一笑，说：“这‘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似乎太强硬了些，二位代表回去禀报一下毛先生，是不是改成‘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这样报界公布也显得更好一些。”

毛泽东听了肖、王的汇报，斩钉截铁地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就是要坚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6月，重庆、国共两党谈判再度开始。表面看，战场上的磨擦似乎有所收敛，但国民党已把目标从战场转移到了谈判桌上，他们要在谈判中达到“溶共”、“限共”、“灭共”的目的。

杀手锏终于使出来了。7月16日，国方向共方正式提出《中央提示案》。要害问题所在，是“关于18集团军（即八路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它的中心，是要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借黄河之天险，堵塞共产党军队的退路，又可以借日本人的机械化兵团，横扫河北大平原。

蒋介石不是要和日本搞“和谈”吗？日蒋联合“剿共”是“和谈”的一项主要内容。他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打死、困死、饿死，以此既解心头之患，又向日寇邀功，此计何其毒也！

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这个《中央提示案》，反共高潮由此再次掀起。

显然，国民党反共的重心已从华北移到了华中，新四军已成了它的重点目标。新四军啊，你的命运将会如何？善良的人们真为你捏把汗呢。

韩德勤，这个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对共产党有着刻骨仇恨。早在江西5次反“围剿”时，韩德勤就被红军活捉过。现在，他又受了蒋介石的指示，企图发动一场“苏北战争”，以报一箭之仇。新四军挺进苏北后，他一天几道指令：“日人不足为虑，共匪为心腹大患。”对新四军要“一律严缉，以遏乱萌。”

第一个回合，韩德勤利用杂牌军李明扬、李长江的势力突然袭击新四军挺进纵队。结果，郭村（江苏扬中、江都一带一个小镇）保卫战激战1小时，打垮二李的精锐，200多人被俘。叶飞指挥的挺进纵队与前来支援的苏皖支队配合，内外夹击，全歼李部主力3个团。事实教训了二李，他们在与陈毅通电话时，表示要“重修旧好，协力抗战”。

第二个回合是黄桥（江苏如皋、泰兴之间的一个大镇）战役。韩德勤在郭村一战中没达到目的，便指令税警总团、保安4旅南北夹击，企图在泰州以东歼灭新四军。新四军首先打败税警总团，占领了黄桥，随后打败盘踞在姜埭的保安9旅，一举夺下姜埭。

韩德勤见目的还是没达到，便于9月30日倾其主力全面进攻黄桥，狂妄叫嚣：“这一下要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了！”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集中主力3个纵队7千多人，在黄桥对顽军形成包围态势。一纵队经3小时激战，全歼独立6旅。随后，一、二纵队配合东西夹击，三纵队从正面出击，顽军89军全部被歼，并歼其首脑机关。保安4旅从战场上溃退时，被新四军指挥机关全歼。

黄桥战役，全歼顽军11000多人，新四军获大胜。周恩来说：韩德勤被打败了，“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要报仇的”。皖南事变就是他策划的更大的阴谋。

1940年12月25日，重庆黄山别墅。蒋介石与周恩来相对而坐。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得以见面谈话为好。”蒋介石的开场白，把人的思绪带到了“西安事变”那扑朔迷离的难忘日子。那次事变，即使张、杨没有杀他的意思，如果别人要杀他，他还是相当危险的。共产党不计前嫌，主张和平解决，等于是救了他的命。难为他还记得这个“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那他怎么报答共产党的救命之恩呢？

“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

“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是为你们着想。现在肥土瘠地的争夺，实在是太小了。要开到河北，照划定的区域，多么大，多待你们发展，可实施你们的抱负。”

“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所谓“那个办法”，就是《中央提示案》，还包括10月19日（皓日）、12月8日（齐日）何应钦、白崇德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简称《皓电》、《齐电》）。两个电报还是坚持那种说法，就是命令在一个月之内，“将黄河以南的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蒋介石的谈话，除了对共产党进一步施加压力，还加上了哄骗的色彩。

他一再声称：“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可是，这个一贯耍流氓手段的“统帅”，早在11月14日，就批准了国民党军令部拟定的《黄河以南剿灭共匪作战计划》。12月10日他又对顾祝同下达了如下密令：“至限期该军（指新四军）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12月中旬，何应钦批准了李品仙歼灭从皖南渡江的新四军的计划。

为了使蒋介石能直接遥控皖南战局，顾祝同赶修了从重庆到上饶的长途载波电话。12月中旬，这条线路正式完工。每天晚上，顾祝同可直接同蒋介石通话。

歼灭新四军！这就是蒋介石在“西安事变”4周年对曾“共患难”的共产党的报答。

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这是一块方圆不到100公里的弹丸之地，北靠长江，东临日寇，西、南

两面是国民党军的阵地，国民党派有重兵监视着，在国共摩擦加剧的此时，军部长期留在这里十分危险。

毛泽东、朱德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多次致电新四军副军长（实际是政委）项英，要他经苏南把军部转移到江北，与陈毅领导的江北新四军会合。这样既可敷衍蒋介石，新四军已经北移了，也能争取新四军的独立地位。

项英对中央这个意见是有保留的。

项英是 1922 年入党的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时组织过武汉工人纠察队，1928 年到莫斯科参加过共产国际“六大”，斯大林接见过他。1931 年他到瑞金中央苏区后，毛泽东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他是副主席。红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人留下坚持并领导了南方 3 年游击战争，他总结的游击战争经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抗战爆发后，他是新四军的实际组建者。8 省游击队的“山大王”们下山来进入了富庶的江南，是项英把这支四面八方会台而来的队伍整治成一支有战斗力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军队。

项英有个想法，他一心要守注皖南，发展皖南根据地，使皖南成为第二个延安。他希望在日寇向浙赣铁路发起攻势后，新四军的活动范围能间南发展，继而恢复过去的南方根据地。

如果新四军北移，项英就要奉中央之召去延安，就要交出新四军的军仪。这对他来说是极其痛苦的。

所以，他对中央的北移方针采取拖延的态度。实在拖不下去了。他才被动地组织北移，即使是北移，他也主张向南走。这样，本来具备的北移条件和时机就被他丧失和错过了。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

1941 年 1 月 4 日夜晚，新四军 9 千健儿，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这首悲壮的歌曲，冒着大雨踏上了向南北移的征途。

泾县，茂林，滂沱的大雨使河水猛涨，千把人刚在章家渡过河，河上的浮桥就断了，大部分人只得趟水过河，15 个小时才走了 40 里路，部队不得不在茂林休息。

1 月 6 日上午 9 时，国民党 40 师 119 团的一个搜索排对新四军特务团先头部队两个连进行阻拦，新四军被迫自卫还击。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一带，早就调集了国民党 40 师、108 师、52 师、79 师、144 师、62 师、新 7 师等 7 个师的 8 万多人，枪口正对着新四军，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枪声打响了！

项英对此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突如其来的敌情，使他在百户坑召开的军部紧急会议上决定，新四军重新由原路折回。此后一个星期之内，新四军在高岭、高坦、铜山、东流山、石井坑等地，与重重包围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日夜展开了生死恶战。

部队在被动挨打中大量伤亡，血淋淋的现实告诉项英，他原先的决策错了。怎么办？以往游击战争的经验告诉他，大部队突出来很困难，小部队也许可以。只要领导核心在，只要不被俘，部队可以再收拢，战局可以重开。因而，他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等人单独离开了部队。

项英出走，带领部队的重任落到了叶挺身上。

“想不到蒋介石卑鄙无耻到这个地步，这是个连秦桧都不如的十恶不赦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有革命传统的。为了抗日，为了民族生存，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国民党不打鬼子，反而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的时候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叶挺激昂的动员，使士气倍增。

叶挺是北伐名将，他指挥过的一些著名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都是靠打硬仗拼出来的。人的思维定势最容易照搬自己的成功经验。项英如此，叶挺同样如此。

石井坑守备战就是这种硬拼硬打决策的产物。

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石井坑的周围都是敌军。东北有 108 师，东面是 52 师，西面是 144 师，西北是新 7 师，西南是 79 师，东南是 40 师，正南是 62 师，面对顽敌的疯狂进攻，叶挺说：“我们要在这里死守。我们在这里即使全部牺牲了，将来在中国革命史上也会写下光荣的一页。革命是不会失败的，革命的火焰是不会扑灭的。大江南北还有新四军队伍，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从 1 月 9 日到 1 月 13 日，石井坑守备战打了 4 天。顽敌越来越猛，新四军弹尽粮绝，队伍越打越少。叶挺仍然主张坚守，他想起了广州起义，他想再创造“第二个黄花岗”。

项英等人没能突围，又折回来了。严酷的现实，迫使下一步还是用游击战的老办法，分两路分散向外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总的目标是苏南，目的是保留更多的力量。

在从石井坑向大康王山脉撤退中，饶漱石代表党组织建议叶挺与顾祝同谈判。没想到，叶挺一去谈判就被扣留。

袁国平率部突围时，身负重伤，至巧峰镇附近时，国民党军已逼近，他要别人快走，自己拔枪自尽。

项英和周子昆从大康王突围后，在田坑里一带隐蔽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叫蜜蜂洞的山洞里，他的副官刘厚总发现了他身上携带的金条等贵重物品（党的经费）。财迷心窍的刘厚总趁项、周睡下后向他们打了黑枪，夺走了钱财，叛变投敌。

皖南事变，新四军共牺牲了大约 7 千多人。

1 月 17 日，当国民党宣布新四军为“叛变”，要取消新四军番号时，周恩来在电话中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事变发生后，全国进步力量纷纷谴责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卑鄙行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上书蒋介石，对皖南事变深感不满和义愤，要求释放叶挺将军。

美国在华的卡尔逊上尉将皖南事变的经过报告了罗斯福总统，美国政府通告重庆政府：“在内战的危险没有消除，国内的团结尚未恢复之前，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

周恩来和德国朋友安娜把事变真相告诉了英国驻华大使。英国政府听取

了大使的报告后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只有汪精卫对此事表示赞扬。他说：“蒋介石近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的不错。”

参与皖南事变直接指挥的国民党 32 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心里很虚。他的参谋长要把“围剿”新四军的“战功”列入全军参谋长会议报告，他却说：“不要列入，不要在会上作报告。”“这是内战，自相残杀，在抗日战争民族大义上是理屈的，摆不上桌子面的事。”

蒋介石以为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就被他们消灭了。然而，仅仅一周以后，1月23日新四军就得到了重新组建。代理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参谋长赖传珠等新四军新的领导人宣誓就职。新四军又重新活跃在江淮之间。

第五章 黎明前的黑暗

一、百团大战

青天霹雳太行头，
万里阴霾一鼓收。
英帅朱彭筹此役，
竟扶危局定神州。

这是刊登在 1940 年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一首赞颂百团大战丰硕战果的诗。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参战兵力最多、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果最为卓著的一次大战役。

河北涉县温村，到过这里的人都知道，这里有一座高大的天主教堂。那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与河北农村千屋一面的普通民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可是有谁知道，就是在这座教堂里，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高级首长酝酿、决策了轰动中外的百团大战。

还在春天时，八路军首长就到各部队，与各部队首长议论过正太路破袭战问题。正太路是从河北正定到山西太原的铁路干线，日寇的兵力、物资很大部分要靠它来运送。如果能把正太路搞掉，使它瘫痪，八路军晋察冀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不是能连成一片了吗？

在 129 师师部，政委邓小平听了左权副参谋长传达的彭总的初步设想后，果断地说：“这个设想我看行，可以这么干！”师长刘伯承也赞同地点点头。他们还说，只有切断敌人的交通命脉，华北敌后的抗战局面才能有所改观。

那时，日寇正为在华北推行“囚笼政策”而洋洋得意，他们把铁路当成“囚笼”的“柱”，把公路当成“囚笼”的“练”，把据点当成“囚笼”的“锁”，如果我们把铁路、公路、据点都给端掉，它的“囚笼政策”还搞得成么？

夏季到了，晋察冀平原上，高粱红了。远远望去，高大的青纱帐成片覆盖着平原。它象一道道天然屏障，掩护着游击健儿与敌寇周旋。夏秋之间，是华北一年中雨水最充沛的季节。雨水，固然会增加我军作战的困难，但是日寇的机械化兵团更难使上劲。大雨会带来山洪，利用它来冲毁路基、淹没矿井，真是再好不过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大路破袭战计划酝酿成熟了。7月22日，八路军前总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参谋长的名义发布战役预备命令。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计划。

8月20日的黄昏，部队悄悄地开进敌人眼皮底下，敌人毫无察觉。

20点，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打破了华北宁静的黑夜。5000里长的突击线上，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太路以及敌寇的车站、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震撼着正太路100多公里的整个地域。

聂荣臻司令员率领晋察冀军区的46个团，击破了正太路东段，以及北宁线、津浦线的北段、沧石线、平古线和平汉线北段。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率领129师和太行军区的47个团，击破了正太路中段，以及平汉线中段、德石线、白晋线、同蒲路南段。贺龙司令员、关向应政委率领120师和晋西北军区、抗日决死队，击破了同蒲路北段、汾离公路全线。

在正大路中段，129 师刘邓首长号召部队，要“砸核桃”，不要“啃核桃”，对正太路要破坏得越彻底越好。当时，每公里铁路线上都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有八路军，也有自愿参加行动的老百姓。他们敲击着，呐喊着，夜以继日地炸桥梁，毁隧道，拆铁轨，烧枕木，平路基，砍电杆，收电线。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烈焰腾腾。远远望过去，简直象一条飞舞的火龙。经过 10 个昼夜，以正太路为中心的华北大部铁路线和一些公路干道被夷为废墟。

娘子关，这个晋冀咽喉的隘口，自从 1937 年 10 月失守以来，一直是日寇把守正太路的重要据点。日寇的司令部就设在娘子关西面的大庙里。在关南角的山上，敌寇利用险峻的山岩，加固了原有的工事，又加修了 4 个大碉堡。

战斗开始后，晋察冀军区右纵队 5 团官兵，以极短的时间先消灭村里的伪军，再凭借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寇发起强攻。陡峭的山坡上，战士们冒着浓密的火网，向娘子关上的堡垒发起冲锋。

损失是惨重的，但经过 3 小时的反复冲击，敌堡垒终于被拿下。黎明时分，八路军把国旗插上了娘子关头。老百姓看到高高飘扬的国旗，兴奋得热泪盈眶。

井陘煤矿是日寇在华北开发军需物资的一个重要据点。这里的煤质地优良，日寇除了供给华北需用外，还大量运往日本本土。煤矿四周修建着 1 丈多高的围墙，墙上挂着电网，电网外有铁丝网和壕沟。电网内，还修了十来个碉堡。日寇以为，这种工事用来对付武器低劣的八路军，真是铜墙铁壁了。

工事再坚固，也锁不住人心。熟悉地形的矿工，自愿来给八路军当向导。深夜，八路军悄悄地越过了壕沟，砍断了铁丝网，按矿工指点的方向破坏了电网。“轰！”随着第 1 颗手榴弹投向敌碉堡，炮火齐发，机枪齐鸣。慌乱中，敌军使出了最后一招——用“晋造大炸弹”来炸爬墙的八路军。无奈越乱越打岔，那些大炸弹掉下来时，被炸的尽是他们自己，八路军一个也没炸着。

经过 2 个小时的激战，八路军占领了煤矿。在工人协助下，矿中 14 盘机器、10 座锅炉、3 座风车、2 个大水池、2 个烟筒、1 个开车站、1 个电机房、1 座火车站、5 座铁桥，以及矿上所有建筑，全部在隆隆的爆炸声中被炸毁。有个被俘的日本技师说：“这次袭击，日本方面至少损失 3000 万元以上，起码要半年以上的修复期才能复工。”

阳泉，狮脑山，日寇片山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狮脑山控制着整个正太路的咽喉。该旅团下辖 5 个步兵大队，还有骑兵、炮兵、工兵等待种兵。

正太战役对日寇的打击，使片山气急败坏。正在气头上，八路军打到他家门口来了。没想到片山这么不经打，仅仅一个夜晚，他的兵力全部被消灭，他防区内的桥梁、隧道、水塔、车站也悉被摧毁。

片山为挽回面子，纠集了所有日伪军和在阳泉的日侨，拼凑了 1500 多人，对狮脑山我军发动了整整 1 星期的反扑。然而，任它怎么冲锋进攻，我军始终岿然不动，紧扼阳泉咽喉，直到完成任务转移。

井陘煤矿战斗，还留下一支美好的插曲——聂荣臻司令员救下了两个日本小姑娘。

战火中，八路军战士发现两个日本小姑娘，大的才 5 岁多，小的还在襁褓里。她们的父亲是井陘火车站的日本副站长，受重伤抢救无效而死，她们

的母亲也在炮火中死亡。部队请示如何处理，聂司令员答复，立刻把孩子送到指挥所来。

半天工夫，孩子送来了。那个受伤的婴儿，伤口包扎得很好。聂司令员忙派人到村里找正在哺乳期的妇女来给孩子喂奶。那个大一点的女孩，怯生生的。聂司令员牵着她的手，把梨用水洗干净了给她吃。吃饭时，炊事员做了一盆稀饭，聂司令员还用小勺喂给她吃。

小女孩的伤好些了。聂司令员找了个可靠的老乡，准备了一副挑子，送她们下山。那时，挑子是太行山最好的交通工具了，翻山越岭，不怕颠簸。聂司令员怕孩子路上哭，还在筐里放了许多梨。

为了两个小姑娘的安全，聂司令员专门给日本官兵写了一封信。小姑娘在送交日军后，日军方面还回了信，说八路军这样做，他们很感谢。

1980年，美穗子——当年那个大一点的小姑娘来中国访问。日本各地人民看到聂司令员寻找她的通讯报道后，给她写了许多书信，有的还送来了礼物，他们感谢中国人民，称聂司令员是“活菩萨。”当年的聂司令员——聂荣臻元帅接见她时说：“这件事，不是我一个人会这样做，我们的军队，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会这样做的。”

参加正太战役的部队，据当时统计是105个团，后来各军区编写战史时统计又说，实际作战部队有115个团。8月26日，左权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负责同志的电报中说：“正太战役我使用兵力约百个团，于20日晚已开始战斗，序战胜利已经取得，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就这么叫开了！

毛泽东在看到百团大战的胜利捷报后，非常高兴。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蒋介石也在9月11日给八路军发了嘉奖电：

“朱、彭总副司令，迭电均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其交通为要。”

以正太路为中心的破袭战旗开得胜。八路军趁热打铁，继续对河北南部的德石线、济邯线，山西西北的同蒲路宁武北段等铁路进一步加以破袭。

榆辽公路是日寇进攻太行山根据地的据点公路。公路起点在榆社县城，日寇经过多年经营，形成了坚固的构筑，屯有足够半年的军需、粮秣。129师刘邓首长决定，用8个团的兵力，把榆社拿下来。

9月23日晚23时，战斗打响。

400多日军集中把守关东第9中学。这是个高水平的据点，四周都是高墙，墙上环绕着铁丝网的碉堡群。强攻开始了！八路军在强大火网掩护下，用几条梯子结成的高大云梯架起来，冲上去的战士断然用浸湿的棉被堵住敌人的枪眼，碉堡里的火舌哑了，4丈多高的母堡顿时失去了威风。

外围，炮兵以猛烈的炮火集中轰击敌军较为集中的文庙阵地。

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敌寇，竟无视国际法准则，把毒气大量施放出来，顿时，毒雾弥漫全城，指挥作战的陈赓旅长和突击营官兵全部中毒。

地上不行，干地下。一支地下尖兵此时正在紧张地作业。工兵的快速掘

进方式，把坑道一直挖到敌军碉堡的地基下，埋上了大量炸药。

25日下午，第4次总攻开始。只听“轰”一声巨响，敌人的几个主要碉堡同时飞上了天。敌人被炸懵了，八路军突击队天兵神将般地出现在敌军操场上。一阵白刃战，剩下的敌寇都成了刀下鬼。40分钟血战，中队长藤本以下全部就歼。

榆社成了八路军自抗战以来第1个以强攻手段从日军手中收复的县城。

金秋十月，八路军又以反“扫荡”的歼灭战，把百团大战推向了高潮。

还在8月31日，彭德怀就对新华社记者说过：“敌寇在我们的严重打击之下，必将更疯狂地组织新的进攻，新的‘扫荡’，……我们必须加紧准备新的战斗。”

果然，敌人的报复说来就来，10月，日军36师团，110师团，独立1、4、9三个混成旅团共2万多人，对太行山区实行“毁灭性扫荡”。他们的战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分进合击，深入腹地“辗转清剿”，再中内向外“反转电击”，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以消灭八路军生存的条件。

10月6日，敌主力3000多人进犯榆社、辽县等地，企图寻找八路军主力和首脑机关，结果东奔西扑，到处挨打，后勤被断，折腾了10天无功而还。

10月20日，日军又集中上万兵力再犯太行，重点是清漳河东、西两个地区，这里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线指挥部、129师师部和太行边区政府所在地区。

关家垴歼灭战是彭德怀亲自指挥的战役。10月30日，日军862师团冈崎大队窜到关家垴一带，彭总命令刘伯承师长组织129师5、6、10三个旅及决死队的一部分对敌发起进攻。

炮兵准确地摧毁了敌前沿阵地。趁敌混乱，我突击部队迅速冲到敌阵地前，展开了手榴弹大战。5个小时的冲杀后，我军占领关家垴近处几个高地。第二天，我军乘胜4次冲锋，4次肉搏战，全部占据有利地形，冈崎大队消灭殆尽。

辽县、武乡一带的日军赶来助战时，关家垴只留下280多具敌尸和3大堆尸灰了。

百团大战在3个月又15天中，消灭日军2万多，俘虏280多人，消灭敌伪据点2993个，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解放区，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4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煤矿5所。战功赫赫，令人鼓舞。

当时的重庆《新蜀报》说：“这次持续如斯，范围如斯广大的敌后战争，是怎样的雄伟，我们数十万将士驰骋北方原野，是如何自傲与艰辛，我们每天看到如雪片飞来的条条捷报，真是要兴奋感动得流泪！”

受到沉重打击的日军大本营也不得不承认：“‘百团大战’给予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日军华北方面军称之为“挖心战”，并把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二、长沙：战略相持的缩影

长沙，湘江上的明珠。

“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

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

杜甫这首《发潭州》，把我们带到了三湘四水之中的长沙。自古以来，长沙经历了多少战争烽火，接纳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迁徙，孕育出多少雄浑壮丽的诗篇，浸透了多少百姓的血汗。

武汉会战以后，抗日战争从防御走向相持。长沙，以它的特有位置，历史的成为陪都重庆的外围屏障，成为与日寇反复拉锯格斗的主战场之一。4次长沙会战的磨难经历，在其他任何城市都未曾遇到过。

湘江将记住这段历史，它曾经经过日寇的重创；岳麓山将珍惜这段悲壮的回忆，它告诉后人，长沙是一座不屈不挠的英雄城市。

第一次长沙会战在1939年9月，指挥这场战役的薛岳将军，刚担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之职。蒋介石曾经给薛岳指示：决定“不守”长沙。白崇禧消极理解“持久战”，说是“长期抗战，须保持兵力”，意思也是让薛岳放弃长沙之争。

薛岳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老虎仔”的雅号。早年，他曾当过孙中山身边的总统府警卫团3营营长，大革命中参加过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抗战开始时，他曾经是“8·13”淞沪抗战的1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曾称他“百战名将”。

能不能守住长沙？薛岳不禁想起了半年多以前的南昌战役。

半年前，也就是1939年3月，薛岳凭他多年沙场的直觉，预料日军拿下武汉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南昌。也是那时，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电报上要他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遏制日军攻势。

薛岳参加过淞沪抗战，从上海退到外围，再一路退下来，使他产生了许多思考。他反对以阵地战与日寇硬拼实力的做法，反对搞大兵团攻坚战。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上屡屡挫败，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战略思想造成的恶果。中国军队要取胜，不是靠硬拼实力，而应该扬长避短，只有靠运动战和阵地战结合，发挥地形熟悉的优势，才能扭转被动局势。

所以，薛岳一面委婉地给重庆去电，说“本战区准备实有不周，当无力取攻势作战计划”，一面却命令前线总司令罗卓英作准备。

罗卓英的准备，寄希望于鄱阳湖和洞庭湖之间的有利地形，凭借这一带大小湖泊交叉的有利地势。他在这一带部署了25个半师，并把主力放在修水河南岸。他以为，凭这样的阵势，南昌城固若金汤。

没想到，一开始就开局不利。日军调集大量汽艇和浅水军舰控制了鄱阳湖面；加上时值3月，春雨绵绵，修水河暴涨，中国守军构筑的工事全都“泡汤”。罗卓英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天亡我矣。”

在这不利形势下，日军攻势开始了。当时担任日军11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部署101、106两个师团主攻，配以1个坦克联队、2个山炮联队、3个榴弹炮联队、2个加农炮大队，还有汽艇、军舰助战。

先虚晃一枪，佯攻修水南岸的吴城镇，然后就攻向了修水主阵地。为了速战速决，日军还使用了毒气弹，76师师长王凌云等一大批官兵中毒。就这样，2个师团凭借毒气弹的烟幕强渡修水河，一举攻破了3道防线。

修水告急，直接危及南昌。

罗卓英的部署失误，打乱了薛岳原先的预想。事情到了这个份上，只好硬顶了。他一面要罗卓英和滩溪前线顶住，一面调援军增援。无奈，大雨滂沱，援军无法赶到，滩溪前线当天就失守。在中国守军的节节败退中，日军机械化部队却长驱直入。

滩溪失守，南昌城便暴露在日军面前，罗卓英赶紧命令 32 军回守南昌，并炸毁了赣江大桥，以阻止日军渡江。

南昌失陷惊动了蒋介石，他下令调来了第 3 战区的 32 集团军。该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在好几次战役中建有战功，这次奉委座命令前来南昌。他先以智取方式准备里应外合拿下南昌，无奈没有成功，于是只好强攻，南昌城下，中国守军伤亡极其惨重，29 军军长陈安宝等相继阵亡。

薛岳一向不主张硬拼，此时便托陈诚婉言向蒋介石进言。恰巧，白崇禧也电请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南昌。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得下令停止进攻，长叹一声：“就让你小日本再猖狂一时罢。”

薛岳想到这里，怒火中烧：“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至甚，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这次是长沙，不是南昌；是秋天，不是春季。你小日本在南昌暂时得逞，这次进犯长沙，我定叫你头破血流。

日军指挥官还是老对手冈村宁次。这次他调集了 4 个师团、2 个支队、100 多架飞机、300 多艘舰船，从赣北、鄂南、湘北分 6 路进犯长沙。薛岳在赣北、鄂南和洞庭湖畔部署了 21 个军、52 个师，主力置于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浏阳河等正面，重点放在两侧山地。为最大限度遏制敌机械化部队优势，薛岳下令，彻底破坏交通线，铁路拆掉，公路挖掉，乡间稻田全部犁翻放水，整个地区实行坚壁清野。

9 月 14 日，赣西、赣北日军首先向中国守军 184 师阵地进攻，战斗打响。敌军初来乍到，定是气势汹汹，只有避其锋芒，将其拖垮打疲，方可出击。于是，中国守军对日军打起了消耗战。先是湘北 15 集团军在关麟征总司令指挥下反复争夺，接着又在草鞋岭一带抵抗。看起来，日军步步得手，实际上正在渐渐向我军口袋里钻。

新墙河一带，日军开始进入中国守军主力圈范围。他们出动大量飞机，对阵地狂轰滥炸，又大量放毒气弹，这才过了新墙河。正面进攻的同时，他们又从侧翼——洞庭湖东岸汨罗河口登陆成功。汨罗河第 2 道防线受到了威胁，薛岳下令，反击新墙、汨罗二线敌军。总观这段战局，虽然丢失了第 1 道防线，但逐渐消耗敌军的目的基本达到。

9 月底，薛岳准备部署反攻，恰好此时重庆统帅部也电令第 9 战区反击。薛岳获电极其兴奋，他的长官部也从长沙迁到衡阳，他本人率指挥部设在株洲。经过部署，15 集团军从湖北后撤到长沙周围，4、73、新 3 三个军和 15 军团准备反攻。长沙城内守军也准备向北突围。

经过多日激战，日军已气衰力竭。中国守军已在长沙郊外设置了伏击防线，并派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出没于丛林，声东击西，以乱其阵。9 月 28 日，日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伤亡惨重。

另一路日军越过捞刀河，沿途 130 多公里多次遭到伏击。

这时日军已逐渐感觉，自己铺的摊子太大，战线拉得大长。为了收缩阵线，准备后退。

中国守军原先就是以运动战对付日军的阵地战，机动灵活，以逸待劳。

现在，趁日军后退之际，关麟征即率 15 集团军变防守为追击。

10 月 5 日，冈村宁次下令，为避免不利态势，宜速向原阵地撤退。然而，送命令的飞机被中国守军击落，命令内容也被截获。

本来，中国守军还可猛追穷寇，获得更大胜利，但指挥部担心日军可能是佯撤实攻，致使日军退却极其顺利。

这次战役，日军伤亡近 4 万，中国守军伤亡也差不多。日军没能拿下长沙，这就算是失败。蒋介石致电嘉勉第一次长沙会战说：“况此湘江战役，歼敌过半……举国振奋，具见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慰。”

薛岳终于出了南昌败绩这口恶气。

南昌败绩令主将有愧的，不仅是薛岳，罗卓英更感无地自容。长沙会战的胜利，给他很大鼓舞。以后，一系列捷报传来：第 5 战区杜聿明的第 5 军在昆仑关取得大捷，南宁失而复得；八路军在华北获得百团大战的重大胜利。罗卓英坐不住了，他下决心要报仇雪耻。刚好此时，赣北日军发动了“鄱阳扫荡战”，目标正对着罗卓英的 19 集团军。

1941 年 3 月 15 日晨，日军向 19 集团军阵地 3 路进攻。一开始，日军攻势很猛，很快就把奉新打了下来。少有的顺当，使日军误认为中国守军空虚，不禁飘飘然。经过 3 天激战，日军又推进到高安一线，进入中国守军第 2 道防线。罗卓英此时心中已有数，日军已开始衰竭，便转入对其包围合击的部署。

18 日，日军援军赶到，企图对中国守军左翼实行反包围。王耀武的 74 军乘势退到上高东北阵地。至此，罗卓英全面反攻的计划部署完毕。薛岳对此十分满意，电令其“务将人捣乱之敌，歼灭于高安锦河南北地区”。

19 日，反攻开始。预 9 师、19 师、新 15 师、新 14 师和 74 军、26 师分别形成对高安、上高一带日军的包围态势。日军 33 师团主力进入伏击圈后，损失惨重，后撤时又陷入 19 师主力和预 9 师的合力包围。形势急转直下，日军赶紧设法从北路全线撤退。

20 日，日军池田 20 独立旅团向锦河南岸的 51 师阵地进攻，意在为北撤大部队开辟一条路。51 师给予池田旅团迎头痛击，堵住了日军北撤之路。无奈，日军的出路只得寄希望于中路的 34 师团。34 师团是日军主力，它一直被王耀武的 74 军困在上高。罗卓英立即调两翼部队增援 74 军主阵地。

范围越缩越小，最后决战集中于上高的 74 军主阵地。战场上拼杀极其残酷，双方的消耗每天都在 4000 人以上。日军、已作狗急跳墙之势，尽管他们有飞机助阵，但就是拿不下上高。24 日，日军出动 100 多架飞机最后一搏，74 军主阵地大部工事被炸毁。57 师余程万师长激励官兵：“弟兄们顶住哇，小鬼子的末路就要到了。”58 师廖龄奇师长对罗卓英立下誓言：“人在阵地在，我廖某决心战至最后一人。”

最后关头仍有曲折。日军又急调援军从九江赶来，奉新之敌 33 师团 215 联队也在赶来之路上。然而，这已于大局无补。26 日，雨雾交加，飞机无法起飞。中国守军利用这个机会发起进攻，日军也借助毒气弹企图突围。面对困兽犹斗，罗卓英下令穷追猛打，彻底歼敌。

28 日，107、58、57 师向官桥一带挺进，官桥很快被收复，日军 34 师团岩永少将被打死。29 日中午，70 军、49 军分左、右两路向高安、安义追击。30 日，高安收复。

上高战役取得了胜利，全歼日军 15000 余人。

重庆军委会和第9战区长官部通令嘉奖19集团军。罗卓英也终于出了南昌败绩这口恶气。

日寇不甘长沙之败。2年以后的1941年9月，新任第11军总司令阿南惟几调动了4个师团、2个独立旅团共15万人，加上100多架飞机、200多艘舰艇集结于岳阳，这次，日军吸取了上次分散用兵的失败教训，改为主力集中向长沙突破的策略。

薛岳有了上次长沙会战成功经验。他还是老套套，部署了17个军、20万兵力，准备诱敌于汨罗河以南和捞刀河一带地区歼灭之。

一开始，情况还算好。9月7日，日军第6师团分3路包抄大云山，激战2天攻克之。敌40师团从湖北南下，准备与第6师团联手，却设想到一路上尽挨打，在甘田、港口、白羊田连续遭中国守军新40师、59师、新10师的打击。阿南惟几闻讯后，急忙派荒木支队增援。又是一路遭阻击，损失惨重。

但是，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两次战役。战场上的成功经验只能说明过去，不能说明现在。眼下情况就发生了变化。9月18日，日军平野支队从洞庭直穿而过，在湘江口强行登陆；19日，日军4个师团强渡汨罗江。薛岳赶紧部署对汨罗河的防守，但日军破译了这一部署后，立即改变计划，于捞刀河北面企图反包围中国守军，形势非常不利。

在日军猛烈攻势下，中国守军溃散严重。9月26日，薛岳命令：“各部组织督战队，于重要路口收容离队士兵，使其归队或重新编组，如有不服从收容者，就地枪决。”尽管如此，溃散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长沙外围防线已失去作用。27日，日军没费多大劲就渡过了浏阳河，接着便轻而易举地攻占了长沙。

然而，日军毕竟已打了20多天，弹尽粮绝。即使打下长沙，也只得到一座空城。中国守军早就坚壁清野，日军得不到补给。出于无奈，只得退出长沙，准备后撤。

转机出现了！这时，重庆军委会命令薛岳：“立即开始追击！”中国守军经过重新组合，对日军予以全面追击。在捞刀河一带，98师重创日军早渊支队；在路口番，99军猛追日军第3、第6师团。日军无力招架，只得退守新墙河北岸。原先守军丢失之地全部收复。

第二次长沙会战可说是险胜。

两次长沙之战，值得冷静总结经验。战役后不久，第9战区开了官兵代表大会。薛岳在会上总结了2次长沙战役的经验教训。他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天炉战法”。

什么是“天炉战法”呢？薛岳解释说：“在预定之各作战地带，构成网形阵地，配备必要的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灭敌之主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带，使用优势兵力，炽热之火力，施行反包围及反击，用优势之态势，予敌以歼灭性打击。”

日军11军总司令阿南惟几是典型少壮派军官，他对长沙战役未取得全胜颇为遗憾。2个月后，他再次下达攻打长沙的命令。这次调集了6个师团7万多人，准备快速解决。12月22日，阿南把指挥所从汉口迁到岳阳。23日，日军40师团主力推进到新墙河，第3次长沙会战拉开战幕。

本来，12月的湖北，晴天居多，谁知这年的冬季却一反常态。连日的雨水，造成道路十分泥泞，加上这些道路原先已破坏殆尽，日军每前进一步都

要付出巨大代价。阴沉沉的天，飞机无法助战，这对中国守军又减少了一重压力。

日军打了将近4天，才到了汨罗河，防守汨罗河的37军和99军吸取了上次战役的教训，在汨罗河一带布置了可攻可守的纵深阵地。99军不敌日军第3军团进攻，被迫后退；但37军防守极其顽强，连续几天打下来仍能保持着良好态势。

这时，消息传来，12月25日日军已占领香港。本来，日军第11军在湖北的行动是为了牵制中国守军主力，以保证香港战役，现在已失去打下去的意义。按计划，日军该撤军了。可是，阿南坚持要攻占长沙。日军已连续作战一周，再发动新的攻势，肯定会有不少新问题。但阿南对长沙志在必得，命令部队主力全力挺进长沙。

第9战区已作好迎击进攻长沙之敌的准备。薛岳部署10军守长沙，其他部队在东、南、北3方集结，待机缩小包围圈，一鼓作气全歼来犯之敌。

1942年的元旦早晨，日军第3师团在飞机助战下，渡过浏阳河向长沙近郊中国守军阵地挺进。日军攻势虽然猛烈，但弹药已严重不足。当天下午，中国守军从被击毙的日军大队长加藤身上搜到一份文件，得知这一情况，异常兴奋。

长沙郊外的激烈战斗，已遍及东、南、北各战场。日军在攻破第1道防线后，倾其主力攻第2道防线，却始终不能得手。形势对日军不利。1月3日，阿南在幕僚的劝说下，不得已才作出停止进攻长沙的决定。

薛岳闻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长沙郊外守军从各方面追击，把最后决战战场定在汨罗河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19集团军罗卓英指挥73、26、4军从南面进攻，27集团军杨森指挥58、20军从北面进攻，30集团军王陵基指挥37、78军从东面进攻，99军从西面截击，包围圈越缩越小。

这下，日军成了瓮中之鳖了。第3次长沙会战以漂亮的围歼战告捷，共歼敌5万多。这次胜利，为多年来国民党战场所罕见。捷报传来，重庆震动了，英美也为之震撼。罗斯福、丘吉尔致电蒋介石表示祝贺，蒋介石非常高兴，授予薛岳青天白日勋章1枚。

平静了2年多后，日寇又再一次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长沙。漫长的战略相持，使日寇处处受困。从华北、华中一直到亚大战场，日军一蹶不振，处处受困，时时挨打。1944年1月，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号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意在打通中国战场的铁路大动脉，重点在平汉、粤汉、湘桂等干线，以扭转被动局面。

5月，按“1号作战”计划，日军在豫、湘同时展开攻势。第9战区面临的敌军，还是老对手冈村宁次为首的第11军，指挥官中还加入了当时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权垣征四郎。5月25日，日军以8个师团共20万人集结于岳阳，外加600多架飞机配合作战。

第9战区已有3次长沙会战的成功经验，薛岳决定再次运用“后退决战”、“分取外围”的方针，准备将主力集结于后方，诱敌深入，再围歼之。

5月27日，日军分3路发起进攻。这次从战役数量上看，日军占绝对优势。它一路长驱直入，新墙河、汨罗河、捞刀河防线先后被突破。第9战区72、58、44、73、99等军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其中也有局部胜利，如在宁乡一带对日军包围攻击；然而从总体上说，日军仍居于主动地位。中国守军部队明显不够，调集援军又受到日军阻击，无法到位。最后，日军突破

浏阳河后，从背后对长沙实行包围。湘潭、株洲等周围城市相继失陷，6月19日，长沙失守。第9战区又组织了反攻，无奈未取得成功。8月8日，衡阳又落敌手。

长沙虽遭失陷，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军取得了最后胜利。从整个大局来看，这是疯狂的最后一跳，是黎明前的黑暗。

黑暗终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长沙重见天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三、反“扫荡”，反“清乡”

1992年北戴河。一座浓荫密蔽的庭院里，风朗花香，海风阵阵袭来，毛毛深情地看着88岁的父亲：“你那时一个人在前方，也够不容易的吧？”邓小平——当年的129师政委轻轻一笑：“我没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

的确，武汉会战以后，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战场已经成为牵制日寇主力一半以上的主战场。1941年以后的几年战略相持时期，是抗日战争最最艰苦的岁月。

那几年，日寇在华北对我军经常实行灭绝人性的“扫荡”。他们采取的手法无奇不有，诸如“铁壁合围”、“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北、华中的抗日群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留下了许多悲壮的故事。

1941年9月，晋察冀1分区1团7连在河北易县狼牙山地区阻击日伪军3500多名后，这个连的6班引敌上主峰，以掩护党政机关、主力部队和群众转移。激战一昼夜，4次击退敌军进攻，歼敌90多人，最后弹尽粮绝。马宝玉、葛振林、胡福才、胡德林、宋学义等5人砸碎武器，纵身跳悬崖，留下了“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史实。

1942年3月，冀东八路军主力突破日军3万多人的重围，某部12团4连在河北遵化东南遭到3000多日伪军包围，他们在歼敌600多后，全连2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同年5、6月，日伪军对冀中发动的“五一大大扫荡”中，冀中军民用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歼敌11000多人，但他们自己也损失严重。16000多名八路军、5万多群众遭到屠杀。冀中平原出现了一片“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无村不带孝，遍地是狼烟”的凄凉景象。

1942年夏秋之交的“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寇竟下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无人区”来置八路军于死地。

.....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人是杀不绝的。就是在最艰苦的年月，华北、华中战场上的反“扫荡”、反“清乡”在敌后一波高于一波地展开。

1942年5月，日军从正太、同蒲、平汉等铁路线纠集了3万多兵力，分3路寻找合击八路军领导机关，前2路，129师正在那里对付，剩下一路，兵力不够，只得由总部机关警备部队来对付了。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一起，因此负责掩护的任务极其繁重。

负责指挥的左权副参谋长对警备连指示：“你们连里80%都是共产党员，90%以上都是老红军，相信你们一定能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告诉同志们，太行山压顶也决不要动摇。”

敌军沿着辽县到麻田数十里的山道、大路一路烧杀过来。200多人的警备连掩护几千人的机关转移，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就在这时，左权找到连长唐万成，他说：“看见没有？那边山上还有老乡哩，快派人去牵引一下敌人，让他们跑出去。”八路军就是这样，自己转移，却时时想着群众。

唐万成正在指挥作战，忽听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唐万成，敌人上来了！”他一转身，见左权正在他身边，但见左权右手提着左轮枪，浑身满是尘土，这时，一群日军正装扮成八路军的模样，钻茅草入丛林，从十字岭横插过来。左权当即指示：“快，抢占前面山包。”

唐万成带领部队反击上去后一看，遭了，敌人的另一路正从左侧准备偷袭，企图切断整个转移部队的道路。左权对此早就看得十分清楚，他胸有成竹，早已把政治部警卫连部署在山垭口前一座高耸的山梁上。唐万成舒了一口气，他对左权胸有全局的指挥十分敬佩。

大队已经转移了，可是左权始终和最后掩护的部队在一起。太阳偏西时，领导机关终于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就在这几千人转危为安之际，一颗罪恶的炮弹却落在左权的身旁，左权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从敌军重围中转危为安的机关和群众，听到左权壮烈殉国的消息，个个热泪盈眶，悲愤不已。太行人民为了纪念左权将军，把将军殉国的辽县改名为左权县。

接连的“扫荡”，带来了饥荒，威胁着部队，威胁着群众。部队每天只能喝两顿照得见影子的稀饭。粮食，粮食，成了当务之急。

这天，大岳军区陈赓司令员和太岳纵队决1旅李聚奎旅长，命令38团准备下霍州去搞粮食。

霍州一带是山西的粮仓。自从太原失守，日寇控制了这一带交通要道后，这一带的粮食已有3年送不过来了。陈赓说：“这一回，你们必定要碰上老对头板井，这是个不可轻视的敌人！”李聚奎也说：“他自称有‘五虎’啊！既然称‘虎’，总比狗难对付。”

板井大队是日寇一张“王牌”。1939年“九路围攻”时曾被八路军打得落荒而逃，重整旗鼓后移驻霍州，据说他手下有“五虎”。每条“虎”下都有1个中队，还配有伪军1个大队。板井一再扬言，要与八路军决一雌雄。

两天后，一切准备就绪。部队、民兵和运输队向霍州方向进发。连续的黑夜急行军，运输队再翻过一座山就是霍州城了。山上有一条道路，如果能控制这条路，就赢得了运粮的主动权。按预先部署，团参谋长余丙钩带2营插下山，左侧是1营，右侧是3营，各营都摆成梯形，指挥部设在半山腰一个小山庄。如果敌人来攻，每个阵地打它1小时，起码拖它7个小时才能打上山来。此外，霍县游击队、武工队也分成3至5人为一组，遍布敌人据点四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牵制城内敌人，争取时间运粮。部署好以后，团工作队便和地方工作队分头征粮去了。

尽管行动十分隐蔽，但板井还是觉察了。霍州城里的鬼子出动了。

从早上到中午，敌人向2营阵地发起了7次冲锋，又向侧翼迂回，全部无功而还。团里的20多个特等射手全部使上了劲，他们个个枪法高超。今天，他们大显神威，一枪一个，接连打掉几个日军指挥官，“五虎”之——独眼龙也被特等射手从洋马上揍下来。

板井十分气恼。一过中午，他就按捺不住，决定亲自出马了。一个侦察员从山下上来报告：“板井大队全部出动，霍州城里空了。”要硬拼，我们的实力肯定拼不过一个大队的敌军，唯一的办法就是斗智。指挥部几个同志一合计，决定趁板井倾巢出动之机，派一支部队去抄他的老窝。几分钟后，陈赓司令员来电，批准了这个方案。蒋副团长立即带着2个步兵排、1个侦察排跑步绕到敌后，直扑霍州城而来。

这回，板井是下了血本了。钢炮、迫击炮、轻重机枪都使上了。2营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看不清人，也看不清天和地。1个小时中，2营打退了敌军7次冲锋。

正在焦急之时，霍州方向枪声大作。这一着棋，恰似当头炮，完全出乎板井意料之外。他万万没想到，八路军会去抄他老窝，不得不拨马而回。1营见敌人杀回马枪，立即冲击追杀，杀得敌军阵势大乱，夺路而逃。等板井打回城里，蒋副团长带的3个排已经携带大量胜利品和山上主力会合了。

据传，板井在逃跑时，耳朵也被削去一半，“五虎”2死1伤，他再也不敢出城应战了。接连两天，风平浪静。在战场攻势影响下，征粮也十分顺利。一些地主豪绅和伪保长，把3年来未交的口粮都交出来了。一到夜晚，各村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浩浩荡荡运粮过霍山。

据点里的敌军好像发现八路军在运粮，但因为受到过沉重打击，只好干瞪眼，不敢出窝。就这样，38团在霍州城外工作4天，圆满完成了征粮任务，并运了回来。

1941年秋季，日寇在晋察冀边区发动了大规模“扫荡”。那时，边区党、政、军、民领导机关的8000多人住在阜平以北30公里的雷部。

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出马，指挥10万日伪军，矛头专指边区领导机关所在的北岳区而来。他们企图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扫荡”、“对角清剿”等办法，边合击，边压缩，把边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一步步挤到狭小的区域内，再集中兵力一举歼灭。冈村把这种新战法称为“向心扫荡”。

冈村的算盘打得太如意了。聂荣臻司令员听完情况汇报后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就讲过，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指挥员的心尽可能搞乱，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我们的胜利。”

聂司令员找到军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罗文坊：“从现在起，把拖住敌人的任务交给你。敌人已经从军区的电台方位上，侦听到我们的位置，他们就要对这个地区进行合击。因此，我们决定今天黄昏转移。我们要将计就计，从今天开始，军区的所有电台暂时停止对外联系，由你带一个侦察排，一部电台，在机关向西转移的同时，留在雷部东边不远的台裕，仍用军区的呼号，不断和各方面联系。

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给敌人留个空中目标，让他们向几十个人搞“合击”，把他们拖住。罗文坊向聂司令员敬个礼：“请司令员放心，一定圆满地完成任务，保证不会吃亏。”一支50多人的小分队组织起来了，电台的一个小战士打趣地说：“司令员可真想得巧，用我们的电台指挥起敌人来了。”2个小时以后，小分队来到了台裕。

登上山顶一看，果然，山下河滩上，敌人的炊火足有10里长。罗文坊派侦察队刘文明副队长带了侦察排部分人下山，沙滩那边顿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喊杀声。这样，“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都让敌人“捉住”了。

第二天下午，敌军步兵分几个方向向台裕压过来。磨磨蹭蹭，走了好几个小时，到天黑才到台裕。为了继续迷惑敌人，小分队不断地用电台与各方“联络”，还在沿途故意用不同番号贴路标、号房子，有时还丢掉几张无关重要的废纸片。这一带群众本来就熟，见到罗文坊就问：“罗科长，咱们司令部又回来啦！”罗文坊顺口就答：“回来啦！”消息越传越神。

敌军摸了4天，捉了4天迷藏，军区领导机关的影子也没摸到。这时，军区电话指示，领导机关为了便于指挥，决定转移到沙河以南，但敌军有一部分仍拦在西大道，阻挡着大队行动。聂司令员要小分队再设法牵制敌人，保证领导机关转移。

电台又紧张工作了起来。小分队运动到西大道公路边，发现一辆装甲车，侦察队上去把它一炸，搅得四周敌军到处鸣枪放炮。为了虚张声势，50多人加上临时收容的力量，100多人的队伍在沙滩上跑起步来。“一、二、三、四、……”夜深人静中，嘹亮的喊声在河谷回荡。敌人的注意力便转移到这边来了。

就在这时，边区领导机关从西大道的西部安全横渡沙河，转移到南面的满山去了。冈村的“向心扫荡”失败了，他们始终没有发现边区领导机关的行踪。

1943年秋季，冈村宁次对华北太岳根据地实行“铁滚扫荡”。整个战役行动，先由北向南横扫，迫使我军退到黄河边上背水而战，再由南向北滚扫回来，以“扫荡”可能出现的突围部队，这叫“大滚”。再用“抉剔”，“清剿”部队每天前进40公里，再后退10里，这叫“小滚”。冈村亲自担任“扫荡”总指挥。他对东京参谋本部夸口说，这次要“迫使共军在黄河岸边背水作战，不降即亡”。

东京参谋本部对冈村此举寄予很大希望，特从各地抽调来180多名军官，组成“皇军参观团”，由服部直臣少将带领，前来太岳前线观摩。

一个漆黑的夜晚，部队秘密向外线转移。陈赓司令员指示，部队集中行动，只派一支小部队在侧翼钳制敌人。

韩略村，临汾至屯留公路上的一个小镇，它处于敌人背后。村边有一条山沟，公路从2丈多高的陡壁中间穿过。这是一处十分理想的伏击阵地。战士们说，“只要敌人一进口袋，咱们就‘包饺子’了。”

当天夜晚，远处传来隆隆的马达声，老远只见公路上翻起滚滚烟尘。用望远镜一看，共13辆汽车。当汽车刚开到沟口，“轰！”6连把最后一辆汽车打趴下了。八路军从天而降，从陡壁上飞下公路，从汽车上夺下重机枪，顺着公路猛扫。领头的敌军汽车想冲过去，可是9连象一道铁门，迎头把敌人截住了。顿时，一道凹沟变成了火沟。好大一会，一个日军大佐带着几十个军官举起战刀，狗急跳墙地扑向6连阵地。双方展开了紧张的厮杀。

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拿着菜刀、棍棒、铁锹、镐头跑来了。山凹里响起一阵阵喊声：“鬼子被包围了！”“鬼子跑不了啦！”

一心想为日军军官解围的那个指挥官，见大势已去，只得切腹自杀，去“效忠”天皇了。1个小时，战斗结束。除了3个敌人逃掉外，其他都死在这条沟里。

韩略一战，等于给冈村当头一棒。太岳军区和其他兄弟部队在白晋线、同蒲线上连连出击歼敌。到11月中旬，冈村蓄谋3月之久的“铁滚扫荡”终于被粉碎了。

华北反“扫荡”惊心动魄之时，也是华中反“清乡”方兴未艾之际。“清乡”和“扫荡”只是名称不同，实质一样，也是设置封锁圈，挨户搜索，实行联保连坐，置新四军和游击队于死地。

1942年中秋节前，新四军1师3旅7团刚打了胜仗，准备祝捷、过节合二为一，好好庆祝庆祝。谁知，中秋节一早，就传来情况：日寇保田中佐率

52 大队（保安大队）和一帮“黑老鸦”（伪军），正奔我军而来。

“打好仗再过中秋节！”这个口号立即传遍了整个部队。几个团领导一合计，决定派 4 连先出击，把保田引出来。这个设想能不能实现呢？

前方不断传来消息：“保田没上北新桥”，“保田在二窰以南出现”；“保田占领了余西”。就在这时，旅首长指示：保田在虚晃刀枪，不要为它迷惑“政委彭德清眼睛一亮：“保田在搞调虎离山计，很可能要让我们离开二窰，再调回头进攻二窰。”二窰是苏中根据地 4 分区所在地，决不能让他得逞。

方向一明确，严团长立刻判断，夏家渡方向 2 营阵地会有情况。果然，不一会，枪声就从夏家渡方向传来。

这时，粟裕师长、刘先胜旅长、吉洛（姬鹏飞）政委都亲临前线了。在首长意图下，7 团拟定了战斗方案：包围 5 连阵地前那股敌人，把敌人切成两截，各个击破。

就在这时，情况变了。5 连阵地前那片开阔地不见了，出现了一个阴沉沉、雾腾腾的烟海。原来，保田想跑。彭政委说：“大打，他害怕，小打，他不在乎。我们就来个不大不小，先拖住他。”严团长指着西南方说：“现在 3 营正在那儿，只要把这里稳住，保田就得在这儿过中秋。”3 营 6 连、7 连象两扇大门一样，把保田的退路给切断了。

入夜，8 月 15 的月亮，又圆又大，就象圆盘高高挂在空中。7 团却没心思过节，严团长说：“跟保田斗了 3 年啦，他天天挖空心思来整我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和他算总帐。告诉战士们，擦亮刺刀，准备干硬的。”彭政委特别提醒大家：“狗急会跳墙，保田越到死处，越要拼命挣扎。”

一声令下，部队从四面发起了猛攻。

保田又耍起鬼点子。他用密集火力拦住 3 面，不让我军靠近，只留出北面一枪不放，引诱我军往上攻。5 连准备往上攻，严团长发现有诈，立即命令 5 连停止前进。果然，保田兵力全部压到了 5 连阵地上。严团长急调机动部队跑步增援 5 连，通知西边的 1 营乘机往上攻。

5 连阵地上一片火海，激烈的肉搏持续了好长时间。增援部队终于和 5 连汇合到了一起。1 营的 2 个连乘虚而入，攻入夏家渡。敌军从北面突围不成，侧面又被突破，顿时大乱。最后的几十名顽敌被压到几间屋子里。手榴弹一阵爆炸，屋里的敌军大部被炸死。最后，只剩 3 个受伤的日军，拖着腿，捂着头从火里爬出来。战士问他们：“保田呢？”那个断腿的指着屋里，颤抖地说：“他的，死啦死啦……”

夏家渡的枪声平息了。如水的月光照在战士们脸上，好像正在祝贺他们歼灭保田大队的胜利呢：

有人在 1943 年 8 月作过统计，当时全部侵华日军约 60 万人，敌后军民抗击 35 万，占总数 58%；其中，华北日军 11 个师团、10 个独立混成旅团、2 个骑兵旅团，敌后军民抗击了 83%；华中日军 13 个师团、3 个独立混成旅团，敌后军民抗击了 47%。全国伪军 62 万人，敌后军民抗击 56 万，占 90% 以上。

敌后军民反“扫荡”、反“清乡”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她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么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

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四、远征军：迈出国门的抗战

滂沱的大雨，把官兵们从头到脚浇得透湿。这是支死气沉沉的部队，三三两两，疲疲沓沓。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吃东西了，饥肠辘辘。这该死的野人山，究竟走到哪才是头呢？正发高烧、躺在担架上的杜聿明将军，被雨水一淋，似乎好受些了。这几天，他老是在想，我们怎么会狼狈到这步田地呢？

1941年12月23日，54架日军飞机突然轰炸缅甸首都仰光。这一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自广州失陷后，中国的对外通道就只剩下缅甸的仰光了。仰光——缅甸语中“战争终结”的圣地，如今也卷入了战争。这对中国的西南交通线来说是个巨大威胁。

缅甸是英国人的地盘，英国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管。蒋介石曾经请求派中国军队参战，丘吉尔却傲慢地说：“大英帝国的将士英勇善战，他们将会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完满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可是，1个月后，英军就招架不住了。这回英国人的态度变了，他们主动要求中国出兵缅甸。重庆决定，组成由卫立煌、杜聿明为正、副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下辖5、6、66个军，统归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美国人）指挥。

“枪，在我们肩上，
血，在我们胸膛。
到缅甸去吧，
走上国际的战场。……”

2月16日，部队出征了。云南边陲，各族民众争相送行，米酒、山茶、烟卷，洋溢着百姓们为远征军壮行的一片热情。第5军是中国军队中唯一用苏援、美援武装起来的机械化部队。1939年10月的桂南战役，第5军在昆仑关战役中打了个漂亮的胜仗。从此，杜聿明格外受蒋介石垂青。第5军作为蒋介石的宝贝疙瘩，一踏上缅甸的国土就挨了个下马威。到处是热带丛林，没有几条象样的公路，常年高达40℃的高温，不要说作战，就是啥也不干也受不了。加上语言不通，情报不灵，再好的部队也会变成聋子、瞎子。

蒋介石一向习惯于遥控指挥，一个又一个电报，带来一次又一次碰壁。2月出征时，卫立煌未到位，杜聿明全面负责；不久来了史迪威；3月，又派了林蔚为首的参谋团入缅；4月，罗卓英代替卫立煌任司令长官。

同古（又称东瓜）战役，日军出动50架飞机击败英国皇家空军，第5军的200师孤军奋战。不得已，3月30日，杜聿明下令弃城突围。远征军入缅第一仗，就这么个结果。

蒋介石来电，要杜聿明赶到平满纳，让5军与6军、66军形成对日军的包围之势。可是，没等部队完成集结，日军就溜了。西面的英军在日军进攻下也争相败逃。怎么办？这里的4个指挥官——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林蔚争吵一阵，又一次作出突围决定。

4个“头”重新部署后决定，下一个目标在曼德勒。这一仗，本来就是背水一战。可偏巧在这时，6军在日军56师团进攻下溃败逃回西双版纳。英军一看形势不对，便撤出了曼德勒，逃往印度。这个方案又泡汤了。杜聿明无奈，只好下令5军再次突围。

5月，雨季来临，蒋介石又来电报，要杜聿明率5军、66军抢占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儿回国。蒋委员长本来就这点家当，现在都投到缅甸，显

得有些心疼。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撤退再说。没想到，部队刚开到密支那不远的卡萨时就得到消息，密支那已为日军占领。

再突围吗？已经无路可突，唯一的出路就是从野人山的热带丛林中突围。那，这么多车辆装备怎么上山？这些大炮、坦克还没好好发挥过作用呢，就这么扔了？没办法，杜聿明咬咬牙命令：弃车上山。

如果说远征军入缅后一点硬仗也没打，那也不符合事实。戴安澜将军率领 200 师鏖战同古，就十分英勇悲壮。

出国前，蒋介石曾经在 1 天之内 3 次召见戴安澜，要他急速赶到同古。昆仑关大战时，戴安澜师长麾下的官兵个个奋勇，立下汗马功劳。这次英军告急，蒋介石想到了 200 师。

英军巴不得中国人快来，他们已经吃不消了。戴安澜刚到达这个阵地，英军就溜了。这时，仰光已陷落。杜聿明要 200 师在同古阻击日军，以掩护 5 军向平满纳集结，也掩护英军撤退。

戴安澜从英军手中接过的是一个工事构筑得极其马虎的阵地。战壕很浅，掩体顶盖极薄，大桥没有桥头堡。阵地到了戴安澜手里，马上就变样了。顷刻间，地下 3 层，地上 3 层的立体工事出现在阵地上。

3 月 19 日，日军 55 师团搜索部队 500 人驾驶摩托车，目空一切地朝 200 师阵地开来。日军开进缅甸后还没败过，到同古也如入无人之地，横冲直撞。当他们冲上皮尤河大桥时，“轰！”一声巨响，前面的摩托车随桥身一起栽到河里，大桥立即就塌了。日军一下就死了 300 多人。

这次伏击本不足道，可日军却觉得丢了面子。20 日起，日军向 200 师阵地猛攻。戴安澜下决心与日军抵抗到底。他在给夫人王荷馨的信中说：“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决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敌人炮火越来越猛。先是同古北面的克容冈机场陷落，接着是同古三面被围。戴安澜只得命令火烧森林，以阻敌前进。闷热的掩体里，戴安澜给部下发出命令：“准备死战。”同时给蒋介石、何应钦发出了“十万火急”电。

3 月 29 日，200 师弹尽粮绝。杜聿明不顾史迪威反对，下令放弃同古。30 日晨，当 200 师撤退时，原先 9000 人只剩下 4000 多人了。来时是个庞大的车队，如今战车没了，汽车也没了。

4 月 24 日，在棠吉攻击战突围时，戴安澜将军腹部、胸部各中 1 弹。5 月 26 日，在向野人山突围途中，他终于殉国，年仅 38 岁。

他的灵柩被手下官兵抬回了祖国。灵柩每到一地，家家户户都为之涕泣。蒋介石为他献了挽词：

虎头食肉负雄姿，
看万里长征，
与敌周旋欣不忝。
马革裹尸酬壮志，
惜大勋未集，
虚予期望痛何如？

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延安也为戴安澜将军写下挽诗：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印度，兰伽。经过野人山炼狱般考验而幸存下来的远征军官兵3万多人，在此接受了英国教官的全面训练。英国教官认为，前一阶段远征军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丛林作战不适应，所以需要加大这方面的适应性训练。

全面训练后，他们精神抖擞，憋足了劲，准备再次反攻缅甸。

兰伽离佛教圣地伽耶不远。远征军官兵从小就熟悉的《西游记》中唐僧师徒4人去西天取经，就是到伽耶取回的真经。唐僧师徒4人，历经千山万水，受尽九九八十一磨难，才取回真经，修得正果。远征军将士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在野人山吃过苦中苦，现在在印度又经历了系统而全面的训练，加上有现代化的精良装备，人人都想打回缅甸去，打回中国去。

作为总指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自上次惨败后，心中老大的不快，别人在背后也对他指指点点。这回，他下决心要出出这口气。

1943年，以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为司令官的英美军联合司令部组成。在此之前，美军工程团、航空营陆续到达印度雷多。中国的工兵团也开始修筑由雷多至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10月下旬，雨季结束，以中国驻印远征军为主力、英美军参加的缅北反攻战开始。

“枪，在我们肩上，
血，在我们胸膛。
杀回缅甸去，
报我民族大仇。……”

将士们唱着重新填词的远征军战歌，又重新杀回野人山，踏上了作战的征程。

孟关，胡康河谷的中心。日军精锐第18军团的第一关就在这里。胡康河谷对从野人山过来的远征军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这里的每棵树下，几乎都埋着中国官兵的尸骨。对日军18师团，中国远征军也极其熟悉。1932年的“1·28”，他们在上海烧杀抢劫。1937年“8·13”淞沪战争后，他们参加过南京大屠杀。1938年10月，从广东大亚湾登陆后占领广州。1939年使南宁失陷。1940年到越南、马来亚、泰国。1942年，横扫新加坡，接着便进入缅甸。

提起18师团，远征军官兵无不咬牙切齿。1943年3月1日，孟关之战打响。3月3日，新22师全线出击，三面包围了孟关。日军做梦也没想到，中国军队的坦克竟能开进野人山。他们当然更想不到，一条公路已经从雷多修到了这里。18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想突围。但新38师已经把它退路切断。无奈，只好在瓦鲁班一带的弹丸地带残喘。

敌军虽已成瓮中之鳖，但瓦鲁班一带毕竟已经经营了1年之久，地雷、陷阱到处都是，暗堡、铁丝网盘根错节。3月8日，以新38师113团为主组成特编突击队向瓦鲁班发起攻势。工兵驾驶着高大的推土机在前面开路，坦克和步兵运兵车紧随其后，轰炸机也赶来助威。瓦鲁班成了立体交叉战场。如此攻势，18师团根本无法抵抗，顷刻便土崩瓦解。

孟拱河谷，长约110公里，平均宽度约10公里。孟拱位于3条江的会合处，又有铁路、公路，地形重要。18师团1个联队和56师一部在此守备。4月一过，5月一来，就进入了雨季。恶劣的气候告诫人们，这一仗不会轻松。

这一战的主力仍是新22师和新38师。新22师师长廖耀湘，骑兵出身，

长期的马背生涯，练成了大胆泼辣、机智灵活的特点。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高材生，他稳重踏实，管理严格，部队带得象模象样。总指挥史迪威、副总指挥郑洞国和两位师长一商量，一个吃孟拱，一个吃加迈。

廖耀湘第一步棋，就是要在索卡道断日军后路。65 团经过 7 天 7 夜的苦战，达到目的。敌军给逼急了，他们集中了 4 个大队和 100 多门大炮，向 65 团阵地寻求突围。狗急要跳墙了！廖耀湘赶紧把 64、66、149 团都拉上去，包围圈收紧了，索卡道守敌全部解决。

孙立人率新 38 师经过 1 个月的长途跋涉，攻占瓦兰，切断了孟拱守敌的另一条退路。此时，廖耀湘解决了索卡道，加迈之敌成了惊弓之鸟。就在此时，接到情报，日军援军正从曼德勒赶来。孙立人当机立断，拿下加迈，回头再攻孟拱。

6 月 16 日，两支部队会师于加迈。25 日，新 38 师成功攻占孟拱。雨季作战有如此功绩，史迪威、郑洞国十分满意。

密支那——日军在缅北最后一道防线，已经于 7 月间展现在远征军面前。

从孟关到密支那，虽然只有 100 公里，但中间横着两座山、一条河谷，对密支那可说是道天然屏障。1 年多的经营，日军已把城内的所有街道、建筑群都变成了工事。更有一绝，那就是密支那的地下掩体四通八达。

就在密支那日军做着“固若金汤”梦时，一支中美军队共同组成的特遣队悄悄地靠近，切断了通往孟关的公路，接着占领了密支那机场。新 38 师、14 师、新 22 师的部分部队乘坐“空中客车”在密支那机场降落。

5 月 18 日，史迪威命令总攻。城内 3000 日军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中美军队打了一个多月，竟没能打下来。7 月上旬，孙立人部署，先以优势空军和重炮猛轰密支那市区，再以大军包围和突击队结合的战术全面进攻。这个方案得到了史迪威、郑洞国的同意。

7 月 9 日，全面进攻密支那之战开始。在火力掩护下，新 38 师一面组织包围，一面组成十几支突击队占领了市区的大部。8 月 2 日，50 师敢死队切断了日军所有通讯。日军顿时兵败如山倒。3 日下午，密支那全面攻克。远征军进入市区后看到，日水上源藏少将已经自杀，倒在一棵树下。

怒江，它的滚滚波涛就象它的名字一样，奔腾咆哮，一泻千里。

如今，云南境内的中国远征军的另一部分——滇西远征军，也要开拔去缅甸参战了。自英军第 4 兵团在缅甸英法尔地区遭到日军平田部队“铁壁合围”后，罗斯福多次电催蒋介石将云南境内的远征军另外 8 个师也投入缅甸战场。

5 月 11 日，第 11 集团军新 39 师第一个渡江成功，吹响了滇西远征军反攻的进军号。12 日拂晓，远征军全部强渡成功，部队象钢刀一样插向中缅边境。重庆方面部署，滇西远征军的目标是速占腾冲、龙陵，尽早与驻印远征军在缅北会师，并打通中印公路。经部署，20 集团军攻腾冲，11 集团军攻龙陵、芒市。

要打腾冲，先要拿下北斋公房。这是一个地势险峻、道路崎岖的天险。日军 56 师团在此筑起了坚固工事。远征军首战即告失利，伤亡严重。6 月 16 日，他们绕到日军背后夹击，才十分艰苦地拿下北斋公房。然后，20 集团军一鼓作气，一举拿下高黎贡山、明光瓦甸、南斋公房等一系列据点。

日军 56 师团接到日缅方面指令，要其死守腾冲至少到 10 月底，以等待援军。就在这时，滇西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下令：速占腾冲。20 集团军 53、54 两个军在打开腾冲屏障宝凤山、蜚凤山后会合，腾冲已如囊中之物。9 月 13 日，20 集团军集中兵力发起总攻，日军藏重康美大佐以下 6000 多人被消灭。

龙陵之战与腾冲之战刚好相反。开头还挺顺当，眼看龙陵快拿下来了，没料到日军援军赶到，而 11 集团军自己的后援却跟不上。司令长官宋希濂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正在此时，8 军打完松山后赶来救援，力量对比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双方仍然势均力敌。蒋介石得知后又急调杜聿明的 5 军从昆明紧急增援龙陵。新增的这 3 个师都是当年在野人山与日军较量过的，特别是 200 师。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11 月 3 日，龙陵被迅速攻克。

缅甸方面，驻印远征军在拿下密支那之后，孙立人成为扩编的新 1 军军长，廖耀湘也成了新编第 6 军军长。10 月后，他们拿下了八莫、南坝，只剩下芒友了。

1945 年 1 月 21 日，驻印远征军的新 38 师和滇西远征军的 116 师在中缅边境会合，两支队伍尽情欢呼，胜利的泪水挂满了将士们的脸颊。两支队伍一鼓作气，于 1 月 27 日一举攻克芒友。

3 月底，两支远征军的会师典礼在芒友举行。从 1942 年入缅作战至今，已经是第 4 个年头了。1943 年反攻以来，远征军收复了城镇 50 多座，行军 2400 多公里，歼敌 3 万余人。

人们为胜利而高歌，为会师而激动。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使人们看到，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第六章 东方破晓

一、波茨坦的曙光

1944年6月6日清晨，法国诺曼底海滩。10000多架轰炸机把数万吨炸弹狂泻到德军阵地上，上千艘登陆舰飞速冲向海滩。150万盟军部队在诺曼底登陆成功。

第二战场的胜利开辟，在事实上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

1945年2月，苏联克里米亚雅尔塔。时值苦寒的早春，然而黑海温暖的海风吹得这里是那么温和宜人。沙皇时代留下的一幢幢豪华的别墅，隐藏在浓绿的树荫之中。

利瓦吉亚宫的门打开了，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代表着美、英、苏三个已稳操二次世界大战胜券的“三巨头”，在记者的闪光灯下微笑着走来，他们刚刚讨论了对战后世界问题的处理意见。

2月11日，“三巨头”在秘密的《雅尔塔协定》上签字。美国已同意苏联在远东的一切领土要求和主权要求，其中包括外蒙古独立、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远东的权益等等。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同意在战胜德国3个月内对日本宣战。

4月20日，苏联乌克兰第1方面军坦克集团军，在接连突破德军3道防线，重创德国中央集团军14个师之后，高速进兵柏林。24日，近卫第3坦克集团军渡过泰尔多夫运河，从南面突破柏林德军防线。

第二天——4月25日下午1时40分，美军69步兵师与苏联红军在易北河会师。“乌拉！乌拉！”易北河上响起了震耳的欢呼声。

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德国法西斯政权宣布无条件投降。

7月15日，德国首都柏林30英里外的小城波茨坦成了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中心。代号为“终点”的秘密会议——“三巨头”的再次会晤将在这里举行。和上次所不同的是，罗斯福已病逝，代表美国出席的是新任总统杜鲁门；代表英国的仍是丘吉尔，不过会开到一半时，因为艾德札当选为新任首相而由他取而代之。

高大的哥特式建筑——原威廉亲王的王宫，此时成了会议所在地与各代表团的下榻地。王宫坐落在美丽的布尼茨湖畔，鲜花环绕，景色宜人。然而，军警林立的戒严气氛与秀丽的风光给人以一种不协调感。

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向全世界公布。它以中美英三个对日宣战国的名义，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

4月份以来，1000多架美国飞机，接连对东京狂轰滥炸，皇宫、皇太后宫、明治神宫等处相继中弹。东京成了一片火海，昔日的东方都会，如今到处是断垣残壁。7月27日，铃木首相主持紧急会议，研究对《波茨坦公告》的对策。东乡外相第一个发言：“面对当前形势，我们应该努力予以结束战争，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好战的陆军大臣阿南毫不示弱：“现在结束战争，还为时太早。日本陆军仍是世界上最强的陆军，而且我们已经作好了本土作战的准备。如此不战而降，对国民如何交待？”

两种意见争论激烈。次日，《朝日新闻》在显著地位刊登消息：“政府

置之不理。” 铃木首相宣称：“《波茨坦公告》荒唐之极，无礼至极，日本人民将对之不予理睬。”

死到临头，日本还这么狂妄么？美国决心要教训它一下，同时也向苏联显示一下威力。

8月6日凌晨2时45分，美国提尼安空军基地上的“恩诺拉·格”号B—29轰炸机起飞。6个半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广岛上空，投弹手费雷比少校按动了投弹开关。

广岛600米高空，世界上第一颗新型的大面积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爆炸了。巨大的火球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死神在广岛上空降临。它的威力比当年德国轰炸伦敦的总威力大2倍，广岛60%城区夷为废墟。

3天后，又一颗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两颗原子弹，夺去了30多万无辜人民的生命。

即使这样，日本军都仍唱高调：原子弹不足惧！

8月8日下午5时，莫斯科，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

日本驻苏大使佐藤乘坐的汽车在外交委员会大厦前嘎然而止。卫兵验过他的证件后，礼貌地请他入内。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正在他的办公室等候佐藤。佐藤刚进来，莫洛托夫就站了起来，他那冷若冰霜的面部，表情严肃凝重：“我代表苏联政府通知您，自1945年8月9日起，苏联对日本宣战。”

一份苏联对日参战宣言递到佐藤大使面前，只见上面清楚地写着：“……希特勒德国战败投降以后，日本为主张继续战争的唯一大国，日本已拒绝今年7月26日美、英、中国提出的日本武装兵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宣布：自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还在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时，斯大林就命令在德国境内的第39集团军、第5集团军，在捷克境内的第53集团军、第6近卫坦克集团军等部队调回国内，作好对日作战的准备。

6月，克里姆林宫，苏联红军远东作战会议。刚接受最高大元帅军衔不久的斯大林，此时正踌躇满志。他决定，3个月内打败关东军，命令苏联红军立即开赴远东前线。

7月，哈巴罗夫斯克这个远东城市热闹起来了。苏联红军远东总部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早已到达前线指挥部。由他主持的远东苏军作战会议完成的兵力战略部署决定：由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分别从东部、北部、西部边境越过边境，夺取中国东北境内的沈阳、长春、哈尔滨、吉林等重镇。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前，斯大林命令：8月9日0时，进攻开始。

8月9日0时，暴雨裹着狂风，电闪夹着雷鸣，5000辆坦克同时向日军阵地冲来，1000多架轰炸机冒雨起飞。长达4400公里的中苏边境线上，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向日军同时发起攻势。远东第1方面军15天就推进了500公里，从滨海向哈尔滨、吉林、牡丹江、延吉等城市开进。它的左翼还同太平洋舰队协同，打下了朝鲜北部。远东第2方面军15天推进了550公里，由伯力、海兰泡向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一带挺进。外贝加尔方面军与外蒙古乔巴山率领的骑兵一道，一个星期就到达颜古诺尔湖边，并沿大兴安岭直指长春、沈阳、锦州一线。

清晨，毛泽东披着衣服走出窑洞，他一夜没合眼。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

来到枣园，他见到毛泽东，兴奋地说：“今天早上新华社从广播中收听到的消息，苏联已经向日本宣战，苏军已向东北全面进攻。”说着，递上一份《解放日报》的《号外》。毛泽东提起笔来，飞快地写下了一份电报稿：

斯大林大元帅：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 朱德
1945年8月9日

当天，蒋介石也向斯大林发了电报：

斯大林元帅：

苏联今已向日本宣战，中国全国人民深为振奋。余仅代表中国政府和全体军民，向阁下及贵国政府暨英勇之苏联军民表示诚挚之佩慰。……

山城重庆，此时正响起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满街都是报童的喊声：“号外！号外！苏联对日宣战！”

同样是这一天，日本内阁紧急研究苏联宣战后的对策。

原先，日本因为苏联未参加《波茨坦公告》签字，还对苏联存有幻想。其实，雅尔塔会议时三国早有秘密协定，任何一国都不得单独与日本媾和。现在，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感到突然。

东乡外相主张，目前应考虑结束战争，不可再延误；陆相阿南则仍然坚持强硬立场。

会议从下午2时一直开到夜晚22时，双方争吵激烈，相持不下。铃木首相对此束手无策，他提出最后一个办法：提请天皇圣断。

23时30分，天皇来到会议室。他一言不发，倾听双方争论。又是2个小时过去了，该轮到由他作裁定了：“这样下去，日本民族和国家都要灭亡了，所以朕同意外相的意见。加之又出现了原子弹，继续战争后果将是更加严重，为此决定结束战争。”

陆相阿南泪流满面，会场一片哭泣声，连力主结束战争的外相东乡也落下泪来。大家抬头一看，天皇和大家一样，眼眶里充满泪水。

尽管天皇有了“圣断”，关东军仍不愿投降。苏军的攻势仍然有增无减。

8月9日深夜，海拉尔大桥。苏军的坦克一辆接一辆的开过来。守卫海拉尔车站的日军急忙调动了10多辆坦克向苏军反击。

坦克手巴哈罗夫的坦克被打坏了。他看到敌人的地堡里，机枪仍在吐着烈焰，挡住了苏军的道路。巴哈罗夫从坦克里跳出来，用手榴弹一下就解决了敌人2个地堡。还有一个地堡里，机枪火舌还在逞凶，可他手里的手榴弹却用完了。

突然，巴哈罗夫站起来，扑向地堡的枪眼。日军看到此情此景，都惊得傻了，后面的苏军冲上来，立刻把地堡炸了。

桦林车站，插向牡丹江的重镇。

8月12日，坦克257旅的坦克群一面射击，一面冲进车站。刚好，日军

步兵 135 师团 1 个联队的军列开进来了。坦克射出愤怒的炮弹，军列着火了，1 个步兵联军在 10 来分钟时间里全部被歼。

又 1 辆军列过来了。日军打算冲过车站，旅长阿尼希尼中校把火炮对准了机车。“轰！”机车颤抖了一下，冒出浓烟，脱轨了。车上的日军立即投入了战斗，力量十分悬殊。苏联 7 辆坦克要对付日军 1 个重炮联队。许多日军抱着大把大把的反坦克手榴弹冲上来要炸坦克，坦克手们飞快地辗了过去。

从 12 日夜到 13 日晨，他们共消灭了 4 列日军军列，歼敌 900 多，击毁 6 辆机车、143 节车皮、24 门火炮、30 辆汽车、24 辆拖拉机和 100 多挺机枪。

至 8 月 15 日，关东军已遭到毁灭性打击，总数近 30 万的关东军第 1 梯队被全部歼灭。苏军太平洋舰队在多兵种合成兵团协同下，牢固地占领了北朝鲜沿海地区，关东军的退路完全被切断。空军完全掌握了整个战区的制空权。

8 月 17 日，眼看大势已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大将向苏军远东总部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提出停战建议。

还在苏军出兵东北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电报指示各解放区，东北日寇消灭后，八路军要迅速进入东北，要抢占港口要塞，要尽快使原有解放区与东北连成一片。

8 月 10 日，苏军出兵第 2 天，朱德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 1 号令，命令各军区坚决消灭拒降的日伪军。11 日，大反攻 2 号至 7 号令下达，命令各军区向预定地区反攻。

八路军晋察冀、晋绥、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分别抽调部队 10 万多人进入了东北。一批城镇被攻克，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城市被包围。

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共毙、伤、俘日伪军 35 万多人，收复了张家口、邯郸、邢台、山海关、长治、焦作、烟台、威海、莱阳、蓬莱、锦州等中小城市 250 多座，一度攻入保定、石家庄、归绥等城市，逼近并包围了北平、天津、太原、大同、开封、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切断了北宁、平绥、津浦、平汉、正大、同蒲、胶济、广九等铁路线，1800 多万同胞从日寇的铁蹄下被解放了出来，收复国土达 31.5 万多平方公里。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犹如滚滚洪流，迅速占领了日寇侵华首先占领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原来的解放区已与东北、华北收复地区连成一片。

二、“日本最长的一天”

1945年8月15日，这个日子对日本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本天皇公开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天皇在普通日本人中是具有神秘、神圣色彩的特殊人物，一般日本人是从来不曾听到过天皇声音的。该一天，日本人终于能听到“鹤鸣”声了。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

实际上，内阁有关日本投降的决定在此前一天——8月14日就定下来了。从14日中午到15日中午，对日本人来说，这种煎熬和痛苦，真可以说是日本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天。

8月14日，东京。

8月的东京，郁热难熬。四处静谧潮湿，没有一丝风，美军飞机的连日轰炸，使全城到处满目疮痍。

这天上午，天皇要在御居圣地“吹上御所”召开御前会议。往日的皇宫，典雅气派，景致宜人。然而今天，人们能看到的除了断壁，便是壕沟。接连的空袭，连御前会议也只能在皇宫后面的地下防空洞里开。地下室里不仅仅是潮湿，简直就是湿淋淋的，水珠从入口处阶梯的墙壁上滴落下来。有人说这里和蒸汽浴室没有什么区别，这话一点都不为过。

10点整，天皇来到地下室，他先把终止战争的决定告诉了陆、海军各位元帅，并要他们支持这个决定。10时30分，他来到会场，内阁成员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都到了。天皇穿着军装，戴着白手套。虽然他还不算太老，但他在人们心目中却是个干瘪老头的形象。

天皇早就作出了终止战争的决定，外务省把这个决定照会了同盟国，今天是要确认同盟国的回文是否能接受。

天皇说：“我已仔细地听取了反对日本接受同盟国回文的种种理由。不过，我仍持己见。我现在再重申一遍，我研究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我以为把战争拖延下去，除了加剧毁灭外，徒劳无益。我也研究了同盟国回文中提出的条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条件完全承认了我们在几天前发出的照会中所表明立场。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个回文是可以接受的。”

他擦擦眼睛，又说：“如果我们打下去，日本将成焦土。虽然你们中有人认为我们不能完全信任同盟国，但我却以为迅速地、和平地终止战争总比看到日本被消灭要好。照目前的局势，日本还有复苏的希望。”

他的结论是：“我希望内阁尽快起草终战诏书。”

说完，他起身离开了这个令人窒息的地下室。

天皇讲话时，会场上可不时地听到一阵阵饮泣声。天皇一走，立即变成了一片嚎陶大哭。

当天下午14时49分，共同社用英语从东京发出一条电文：

急电 急电 东京 8月14日——
据悉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诏书
即发

美国飞机停止了向东京的轰炸，以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

与此几乎同时，天皇的诏书也草拟修订完毕。这份诏书共815个字，与要宣读的“8·15”这个日子恰成巧合。天皇在诏书上签上“裕仁”二字，盖

上御玺，注明日期是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昭和”是他这代天皇的年号。

午夜，天皇在宫内大臣、侍从长等人陪同下来到宫内省的政务室作广播录音。情报局一位处长后来说，他清楚地看到天皇眼中噙着泪水。

有关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正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转发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和重庆。

战争状态下的东京夜晚，始终是漆黑一团的。别说灯火管制时，就是灯火不管制时也已经失去了大都市应有的夜色。

一群荷枪实弹的少壮军人包围了吹上御所。负责守卫皇宫的近卫师团长森猛中将还在办公室未走。他想起了什么，抓起电话，没想到电话里传来的尽是盲音。

突然，门被撞开，闯进来几个人。他们中间，有陆军部的烟中少佐、东条英机上将的女婿古贺少佐、阿南陆相的内弟竹下少佐等人。他们的枪口对着森将军。

森将军明白他们来干什么，便不慌不忙地在他们面前玄而又玄地大讲起人生哲学来。每当他们想插话，他就立即把话岔开，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然而，回避总不是办法，森将军只得接触到正题上来：“你的话不管有无道理，事实上皇上已作出圣断。我身为近卫师团长官，必须服从天皇的旨意，我的部下也必须这样做。”

“砰！”一声枪响，森将军倒在血泊里。此时正是15日的1时整。

这伙少壮军官要搞政变，他们要搜查整个皇宫，要毁掉天皇的停战诏书录音带。他们早就制订了详细的计划。此时，皇宫已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宫内警察也被解除了武装。可是，能搜的地方都搜了，就是没找到存放录音带的地方。

8月15日一大早，人们从当天的东京各报上看到两条消息：一条是终战诏书签署经过的详细报道，一条是昨夜皇宫发生的未遂政变。

宫内大臣石渡聪大郎说：“看来，这一切跟‘2·26’事件一模一样。”他清楚地记得，1936年2月26日凌晨，一批少壮派军官率领1000多名陆军士兵冲进首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杀死了前首相斋藤、前藏相高桥和前陆军总监渡边。现任首相铃木那时是首相侍卫，在事变中负伤，石渡本人是近卫师团的少佐，亲眼看到这可怕的一幕。没想到，不到10年，这幕悲剧又再次重演。

这类事还没完。

清晨4点多，在国家2号公路上，37个人乘坐1辆卡车和1辆小汽车，正由广岛向东京全速驶来。他们中30人穿着军装，5人是学生，还有2个是“广岛青年军”成员。他们自称是“国民神风队”。他们带着手枪、军刀和机关枪，在广岛警备队佐佐木上尉率领下，直冲首相官邸而来。他们来的目的是要刺杀首相，如果正好赶上内阁开会，那就一网打尽。佐佐木对首相铃木尤其恨之入骨，把他看成是头号卖国贼。

恰巧，铃木首相不在家，家里只有小孙子和原百合子小姐。佐佐木下令搜查各个房间，在确认首相不在时，一气之下点燃了纸糊的拉门。火势很快蔓延开，房屋渐渐被大火吞噬。

百合子小姐要提水救火，一名士兵说：“你敢灭火，就要你的命。”消防车间讯赶来救火，却遭到了机枪的拦截，他们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熊熊大火在那儿燃烧。

日本广播协会大楼也被政变的皇家近卫师团第1连队团团围住。60名夜班工作人员被关押了起来。他们占领电台，是要向外界广播，拒绝天皇身边的“卖国贼”强加给他们的“无条件投降”。

5时10分，东部军管会田中司令官来到皇宫。他已经弄清，政变军队是在杀死森将军后，偷了他的印章，以他的名义伪造命令发动的政变。田中勃然大怒，他对传达政变命令的石原少佐大声吼道：“你好大胆子，你身为皇军军官，怎敢违抗皇上命令？你今天的背叛行为罪不容赦！”立即命令：“把他抓起来！”门外的宪兵立刻把石原抓走了。

烟中少佐还在广播协会逼迫播音员对外播音，电台工作人员再三坚持，没有东部军管会允许，空袭警报期间不能广播，烟中无奈，只好溜走。

7时21分，播音员馆野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了整个日本：“天皇陛下已发布诏书。今天中午12时将广播诏书，届时请大家恭听天皇御音。”他擦擦脸上的汗水，又重复播送了多遍。

这时，叛乱还不能说已经平息，但大体得到了控制。

凌晨3时许，陆相阿南回到家里。刚才，他已在铃木内阁总辞职的公文上签了字。天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前，他是铁杆的“主战派”，力主“进行本上决战”。8月14日天皇“圣断”接受同盟国回文后，他决定服从天皇决定。

他手下这批少壮军官要搞政变，事先他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他们，但他心里明白，政变肯定会失败。正是抱着这种复杂的心理，阿南决定自尽。

碗里的米酒喝完了，准备用来切腹的匕首已擦得雪亮。他拿出两张早已写好的“遗言”交给内弟竹下少佐。一张写着：“蒙君厚泽，死而无憾。惟几将军，1945年8月14日晚。”另一张写着：“弥天大罪，以身谢之。陆军大臣阿南惟几，1945年8月14日晚。”

想了想，他又在后一张背后写上：“我相信日本神圣不可摧。”

阿南对竹下说：“今天是8月15日，但我仍把它当作14日。起先我打算20日自尽，因为那是二儿子的生日，但我担心20日太迟了。14日是家父的忌日，我选了这一天。另外，天皇诏书将在明天中午广播，我听了会受不了。万一我未能杀死自己，请给我补上慈悲的一刀。”

他要用古老的匕首来结束自己，而不愿玷污自己的军刀。他身上穿着天皇赐给他的衬衫，再把所有的勋章都别在一件军礼服上，然后对竹下说：“我死后，把它盖在我身上。”说完，他来到外走廊，跪在地上，挺直身躯和胸膛，从刀鞘里拔出匕首……

中午12时，广播里响起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的声音：“请注意，这是极其重要的广播，请所有听众起立。天皇陛下现在向日本国民宣读诏书，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播送天皇陛下的讲话。”

日本国歌《君之代》随之奏起。奏完，一个令人敬畏的、忧虑而又平静的“鹤鸣”声响了起来：

《致忠良臣民书》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苏、中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

人们第一次听到“鹤鸣”声的心情，从诚惶诚恐到悲哀绝望，他们已经感受到，日本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战败国，太阳帝国陨落了。日语是等级森严的语言。尽管天皇用的是典雅、庄重的宫廷语言，但无法挽回那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败势。

听着听着，千万人不禁号陶大哭起来，有的当场昏死过去。过去十多年中，他们所听到的是大日本皇军一个接一个“圣战”的“捷报”。如今，“鹤鸣”声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大和民族精神支柱的崩溃。

从这一时刻起，一个多月内，自杀狂潮在太阳帝国持续不断，高级将领带头自杀，下级军官和士兵自杀者不计其数。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了中国重庆，山城男女老少涌上街头，人们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欢腾之中，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蒋委员长的胜利演说。人们一次次互相祝贺，他们端起酒杯，干了一杯又一杯……

消息传到延安，锣鼓、鞭炮、欢声、笑语、唢呐在宝塔山下汇成欢乐的海洋，堆堆篝火引来了窑洞中的人们，他们中有农民，有军人，有干部。欢快的舞姿，雄壮的旋律，在延河两岸通宵达旦。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来到了狂欢的人群之中，他们的谈笑风生和延安军民的大秧歌融为一体……

8月21日，湖南芷江。

这天，中美两国士兵在芷江机场搭了好几座彩色大牌楼，牌楼上醒目地标着那个巨大的V字。谁都知道，那是英语Victory的第一个字，它是胜利的意思。中、美、英、苏4国国旗迎风飘扬。

上午10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总长今井武夫的专机，在美军P54战斗机护航下到达芷江机场。剃光了头发的今井和桥岛中佐、前川少佐、翻译木村等4人，向前来受降的中美军官深深地鞠了一躬。

下午4时，中国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等正襟危坐，今井一行上前，出示了身份证明，递交了冈村宁次大将授命前来接洽的命令。……

8月22日，长春，关东军演习场。

上午9时，华西列夫斯基、马利诺夫斯基、麦列茨科夫、诺维列夫等4位苏军元帅和其他几位苏军高级将领，坐吉普车来到了演习场。

马利诺夫斯基宣布受降仪式开始。奏苏联国歌、升苏联国旗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把关东军的编制、武器、人员名单、序列列表呈现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手里。

受降仪式结束，苏军将帅离去后，近万名日军将领、1500多名校佐和无数日军士兵失声痛哭起来。

苏军出兵东北，至此可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9月2日上午，日本东京湾内，美国超级战舰密苏里号。

海面上舰船如林，美国国旗迎风招展。小艇如疾驰的骏马，摩托艇如猛兽怒号，它们载着各国官员来到密苏里号，参加日本向联合国的投降仪式。

8时半，乐声大作，联合国签字代表团开始到达。首先到达的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一行6人，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国代表也相继到达。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陆海空将领20多人最后到达。

9 点，仪式开始。麦克阿瑟走到扩音机前宣读命令后说：“我现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指定的地方签字。”

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签字的前外相重光葵，早在“1·28”淞沪抗战之后炸掉一条腿，他现在一步一步十分吃力地来到桌边，在这重大历史时刻代表日本政府签了字。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代表日军大本营也签了字。此刻是 9 时 10 分。

麦克阿瑟的签字姿态十分潇洒。他在签字过程中共用了 5 支笔，第 1 支笔赠给魏赖特将军，第 2 支笔赠给帕西瓦尔将军，第 3、4 支笔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和西点军校，最后 1 支红色的笔自己留作纪念。

9 月 9 日上午，南京黄浦路中央军校礼堂，“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这里举行。

8 时 50 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上将、陆军副总司令顾祝同上将、空军代表张廷孟上将、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等来到会场。

稍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等 8 人来到会场。冈村向何应钦鞠躬并出示受权投降证明书，然后冈村在证明书上签了字。何应钦将蒋委员长第 1 号命令交给冈村，冈村在授领证上签了字。

这激动人心的一幕幕受降镜头，洗刷着中华民族从“9·18”以来的深仇大恨，洗刷着中华民族自甲午战争以来 70 多年的奇耻大辱。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军的彻底失败中昂起了头，千百万中国将士、爱国人士的浴血牺牲，终于赢来了中国战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虽然其中有些是单方面的垄断受降，虽然中国还要经受两种不同命运的严峻考验，但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毕竟迈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步。

三、战犯穷途，汉奸末路

历史将记住这一刻：1946年5月3日上午，东京时间11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原日本陆军省大厦会堂内正式开庭。这座大厅，曾经是东条英机、阿南惟几等军阀首脑阴谋策划战争，发号施令的地方。如今，这里成了审判、清算战犯的庄严法庭。

“静！”随着一声高喊，全场肃立。庭长、澳大利亚法官韦勃进场时，摄影机、照相机的灯光把会场照得雪亮，法官们登上了审判台。中国法官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

曾经不可一世的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兴风作浪、欠下亚太地区几千万人民累累血债的刽子手，如今成了阶下囚，他们有的披着和服，有的穿着军装，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他们中也有人把身子挺得笔直，竭力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惶恐不安。

东条英机——这个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陆军大臣和首相的头号战犯，在中国东北犯下滔天罪行，又悍然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如今撇着小胡子想假笑，却又笑不出来，只露出一副苦相。此前，当盟国占领军前往逮捕他时，东条自知罪孽深重，曾开枪自杀，不料“自杀水平”太差，子弹离心脏差了1英寸，经美国血浆源源不断输入后，自杀未遂。

其他战犯中，前首相、外相广田弘毅眼睛半闭半开，精神颓废；前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呆若木鸡；前“满铁”总裁、外相松冈洋右脸色发绿，半截胡子灰白，由美国宪兵扶着进来，甚至坐下后仍要倚在手杖上。

惩罚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要求，早在战争期间就已经提出来了。1941年12月，斯大林首先宣布，战后应给予希特勒等战犯应有的惩罚。1942年10月，罗斯福也提出要惩办“应对难以数计的兽行具体负责的纳粹首领”的要求。1943年11月的莫斯科“三巨头”会晤宣言强调：关于惩办首要罪犯的问题，将依特别程序予以解决，1945年《波茨坦公告》更是明确指出必须严惩日本战犯。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意法西斯集团主要战犯审判的成功经验，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成起了示范作用。

1945年9月起，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签发了一个又一个命令，东条英机等一大批甲级战犯相继逮捕。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颁布特别通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设置，并批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2月16日，任命日本投降书签字国中、美、英、苏、法、加、新、澳、荷等9国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3月19日，上海。

一辆汽车从市区的华懋公寓驶向东北角的江湾军用机场。车到机场，1名美国青年军官主动上前打招呼，并要帮助车内人提行李。这时，只见有个中年男子走下车来，它身材不高，却非常老成持重，从他的手提箱上挂着的名片望去，只见上面写着：“盟军最高统帅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当天，《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等南京、上海大报都以显著地位刊出：“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梅汝璈到东京后，首先遇到一个“排座次”的问题。他后来回忆说：“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次、争座位的事总是难免的。这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

关系到国家地位和荣誉的大事。”庭长韦勃是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右边第 1 把交椅非美国莫属，那么庭长左边的第 2 把交椅属谁呢？法官们展开热烈讨论。

梅汝璈当仁不让。他说：“我认为，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 8 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 2。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否则，只好“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梅汝璈的幽默引起了各国法官一片笑声。然而，韦勃庭长拍板时竟把中国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璈坚决抗议，并脱去黑色丝绒法袍，提议进行表决。最后，中国终于赢得庭长左边那第 2 把交椅。

东京审判，被告共 28 个，按英译名字的字母次序排列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烟俊六、平沼骐一郎、广

田弘毅、星野直树、坂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日岛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美国检察官季南一手操纵了检察大权。因而，非常遗憾的是，这 28 名被告没有包括所有日本首要战犯，如在中国作恶多端的冈村宁次、喜多诚一，东南亚最后一任日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以及担任过首相和朝鲜总督的阿部信义等人都没被列入。

这种做法，受到当时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

日军侵华战争是专门立项的重要法庭调查内容之一。过去一直作为秘密的一系列事实真相，现在一一被揭露了出来。

比如：

——“9·18”柳条湖事件。过去日本公开舆论都说是中国军队炸的铁路，是中国军队向日军挑衅。法庭调查的真相是：“9·18”前，由当时的军事探长永田铁山大佐提议，调来 2 门 24 厘米的大炮，架设在步兵营，铁路一炸，一门对着北大营，一门对着奉天飞机场同时开炮。

——皇姑屯事件。过去一直不知是何人策划，何人所为。

法庭调查的真相是：关东军根据田中内阁积极解决满洲问题的方针，制定了相应的计划，目的在于控制张作霖、张学良父子，阻止南京政府在东北的统一。张作霖没有从命，当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河本大佐策划并实施了炸车计划。

——“满洲国”建立。

这个问题是由溥仪本人到法庭作证人并揭露事实真相的。1947 年 3 月 16 日，溥仪由被关押的苏联坐飞机来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历史上，一个被废黜的皇帝亲自到法庭充当证人，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当时人们称这是东京审判“划时代的日子”。下面是检察官基南和溥仪的一段对话：

溥：日本军队占领了东三省，同时由日本人在奉天组织了地方治安维持会。土肥原是主要角色。后来日本军队对来不及逃走而留在奉天的中国官吏进行了迫害。

基：坂垣提出要求是在……？

溥：我到旅顺是 1931 年冬，在这半年之后。

基：你拒绝要求时坂垣的态度如何？

溥：看起来非常不满。

基：同坂垣第一次会见后和顾问商量了吗？

溥：见了顾问郑孝胥和万绳栻。听他们说坂垣也见了他们两人，对他们说，要求是关东军的既定方针。所以若是拒绝的话，关东军将采取果断措施。

基：顾问和坂垣的谈话，是事后听顾问说的？

溥：是的。据顾问说，坂垣威胁说，要是拒绝这个要求，就有生命危险。为此两人及另一顾问罗振玉都劝我接受坂垣的要求。

.....

事实很清楚，所谓“满洲国”是关东军一手建立的傀儡政权。

对这些事实真相，战犯们置若罔闻，无视事实，甚至颠倒黑白。直到在法庭上，坂垣征四郎仍然说：“根据守备队的报告，我断定这次突发事件（指柳条湖事件）不单单是侵犯权益的爆炸铁路，显然是中国正规军有计划的挑战。”在说到“满洲国”成立一事时，他竟说这是出于东北人民的“民意”。坂垣的态度极其恶劣。检察官问他各种问题，他经常生硬地顶撞说：“不知道！”

“南京大屠杀”是又一个专门立项的法庭调查内容。大量人证、物证使人们对它的残酷性感到毛骨悚然。

中国文学博士许传音千里迢迢从中国来到法庭作证说：“日军当时从市的南边进城，进到市内的日军非常野蛮，看见一个人就杀一个人。日军占领后的第3天，我在由日军陪同的条件下，巡视了市内。到处都躺着中国人的尸体，其中有些被乱刀砍得支离破碎。在一条大街上，我试着数了数那看到的尸体，数到约500时，还是没有办法数清，只好罢休。”

他还说：“日本兵对妇女的行为更为恶劣，是文明世界的人做梦也根本想不到的。日本兵开着3辆卡车，来到一个难民营地，把所有的妇女全都拉到走廊里，一个个地强奸，我想阻止他们也毫无办法。这些妇女从十二三岁到四五十岁之间，我亲眼看见了日本兵在强奸。”

另一证人尚德义说：“我们2人一组被绑起来，带往长江边上的下关，那里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在我们的面前，四五十码远的地方，对着我们架起了十几挺机枪。4点左右，一个日军军官来了，下令日本兵对我们进行机枪扫射。我在机枪扫射之前就倒在地上，其后尸体一个个地倒在我身上，我被压得昏了过去。不久我从堆积如山的尸体中爬了出来，这才能够逃回去。”

当时担任日本《朝日新闻》中国部部长的神尾茂回忆：“光南京红十字会埋葬的尸体就有27万具。”.....

面对这些令人发指的野蛮兽行，那些战犯竟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有罪。那个“南京大屠杀”的主谋、日军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在法庭上，抵赖说日军进南京城时，他正在苏州，还说曾令所属部下特别注意，务必不要引起中国方面的国民斗争。这番话掩盖不了事实！事实真相是，12月17日松井不在苏州，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耀武扬威地进城的。这天，南京几个主要街道有14处被日军燃起大火，许多大公司、大商店及高大建筑物都在燃烧，大火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中国法官梅汝璈对此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

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单设一章予以说明。”

梅汝璈这一建议，得到了庭长韦勃和法官同仁的赞同。

经过2年多马拉松式的审理后，1948年4月16日下午，11国法官根据2年来的审判记录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判处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判处有期徒刑7年。

这是正义的判决！是对玩史者的必然惩罚！

执行绞刑被定在1948年12月23日午夜，刑场设在日本东京市内的巢鸭监狱。麦克阿瑟特邀美、中、英、美4国代表到现场监刑，中国监刑代表是商震上将。

绞刑分二批进行。土肥原、松井、东条、武藤为一批，坂垣、广田、木村为又一批。在一座油漆一新的13级绞刑台上，盟军行刑官在他们脸上蒙上黑罩，脖子上套上绞索，随后，总行刑官下达执行命令，绞刑机开始启动，绞绳慢慢地往上抽动，直至其停止呼吸。

凌晨2时零5分，7名被处以绞刑的战犯的尸体由大型卡车沿京滨国道从东京运往横滨。7时40分，在横滨西区久保町的火葬场火化。10时许，火化结束。后来，美国军舰把骨灰运到公海撤掉。

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等12名关东军和731细菌部队的主要战犯作了公开审判。

在此之前，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2月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侵华乙、丙级战犯2000多人进行审判，并分别在南京、上海、北平、汉口、广州、沈阳、徐州、济南、太原、台北等10城市建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其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些主要刽子手谷寿夫、田中军吉、野田毅、白井敏明等分别处以死刑，在南京执行枪决。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6月又在沈阳、太原组织了特别军事法庭，对一批乙、丙级战犯进行了审判。

沈阳机场。一个神色慌张的中年人正在休息室里，表面看正在休息，脚却在不断地颤抖。他周围还有几个人，不时东张西望，神情十分紧张。那个中年人，就是“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长春被苏军占领后，溥仪便抛下皇后婉容、福贵人李玉琴和几个妹妹，在弟弟溥杰、3个侄儿、2个妹夫、1个医生、1个佣人及几个日本人陪同下，分乘3架小飞机飞往沈阳，准备换机去日本。

到了沈阳，溥仪走进机场休息室，刚休息了一会，只见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军空降部队纷纷从天而降，机场上所有日军的武装很快被解除。

到了这个份上，只有寄希望于蒙混过关。但，混是混不过去的。很快，溥仪就被苏联军官看出破绽，扣留了下来。当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后，溥仪作为一个特殊战犯，被苏军用专机送往苏联。

他被送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过证人。新中国建立后，他又被引渡回国。这个曾经是头号汉奸的特殊战犯，经共产党的教育、改造，后来从一个前清末代皇帝转化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9年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特赦。

汪精卫，中国又一个头号傀儡政权的头目。还未等日本投降，他就去世了。

1943年12月，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的外科军医后藤为汪精卫取出了留在背部8年的子弹。没过多久，他就双腿麻痹，连续高烧，医生怀疑为癌症。1944年3月，便由妻、儿等人陪同去日本名古屋医治。手术后，病情时好时坏，至9、10月间，病势逐渐严重。11月9日，美国飞机空袭名古屋时，汪精卫被连人带床送入地下防空洞。因为气候寒冷，地下室没有暖气，第2天病情就急剧恶化，终于在11月10日下午4时许死。他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汪伪政权为其“国葬”，将其葬于南京孝陵卫前的梅花山。

1946年1月中旬，蒋介石返回南京前夕，国民党政府派工兵炸开汪墓，连棺带尸通通运到火葬场，焚尸毁迹。

汪妻陈璧君也是汪伪政权主要成员之一。1946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其无期徒刑，终身监禁。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璧君被送往上海提篮桥监狱拘押。1959年6月病逝于上海监狱医院。

还在抗战期间的1941年，安徽一带的老百姓对汪氏夫妇认贼作父、出卖民族利益切齿痛恨，特制铁质的汪氏夫妇跪像，把它置于安徽马鞍山阵亡将士墓前。汪氏夫妇将和杭州西湖岳坟前的汉奸秦桧夫妇那样，永远遭千人唾，万人骂，遗臭万年。

汪精卫去日本就医前，指定陈公博代为负责。汪精卫死后，陈公博在汪氏葬礼前一天正式成为伪政权“代理主席”。

1945年8月14日，陈公博做梦也没想到日本这么快就无条件投降了，自己的末日又会来得那么突然。8月25日夜，陈公博等7人逃往日本。

周佛海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呆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一句话。至此，历时5年多的汪伪政权寿终正寝了。

蒋、汪之间本来就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了既达到在国人面前貌似公正，又能最大程度上保守秘密的目的，蒋指示戴笠以军统的名义秘密逮捕这些汉奸。军统捉汉奸，多半采取欺骗诱降的办法。

南京是汉奸较为集中的地方，军统利用汉奸对蒋抱有幻想的心理，让他们以登记自首的办法，以分期召见为名，再予以扣押。用这个办法拘捕的汉奸占相当大数量。

华北捕奸，竟是戴笠以大宴宾客的方式进行的。1945年12月5日，北平所有汉奸都接到请帖，请他们到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公馆赴宴。正当宾朋满座，开怀畅饮时，戴笠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从现在起，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座上客一下子就变成了阶下囚。王克敏神经最紧张，当场瘫倒在沙发上。军统人员立即把他们押往炮局监狱。

广东捕奸，则是先从陈璧君下手的。陈是国民党元老，军统为捕她还演了一出戏。先由军统头目郑介民出面，找汪伪广东省长褚民谊，说是蒋介石“电邀”陈璧君去重庆共商国是。为了把戏演得像，还伪造了蒋介石的电报。陈璧君本来将信将疑，但见来人说话“诚恳”，又对“电报”信以为真才同意前往。汽车名为去机场，实际开到珠江桥畔才知上当。陈、褚逮捕后，广州汉奸一一就擒。

这些汉奸被捕后，待遇截然不同。一部分汉奸和普通罪犯没什么两样，身陷大牢，听候发落。还有一些过去曾经对重庆方面“有功”的汉奸，则受

到了优待。

戴笠曾对他们许愿说：“请各位放心，我是奉委员长之命办理这起案子的。我知道许多位在沦陷区为国家出过力，我将尽力为各位洗刷，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我也向各位保证，将不经过法律程序，而最后以政治手段来解决。”

所以，这批汉奸名义上是关押，实际上每天每餐依然美味佳肴，甚至有私人厨师为他们烹饪。梁鸿志的新娶太太每天在看守所进进出出，盛文颐（前清买办盛宣怀的侄子）在里面依然抽大烟。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蒋介石此时还来回南京，华中一带新四军又活跃，他要利用这批汉奸为他守住这些地盘。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重庆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即奉蒋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责令他们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治安。同时，还任命了一大批汉奸为当地的剿共“总司令”。汉奸摇身一变成了接收大员。所以，戴笠对已经被捕的那些“有功”者百般安抚。

这批汉奸的利用价值结束时，国民党政府便发布了一个《惩治汉奸条约》，以平息国内舆论对惩治汉奸不力的不满情绪。这时，对那些原先受“优待”的汉奸就“对不起”了，当他们真正尝到铁窗囚徒的滋味时，终于明白了，面对他们的是“法律解决”，而决不可能是什么“政治解决”。等待他们的，必然是无情的制裁。

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方面交涉后，陈公博于1945年10月3日被引渡回国，在机场即遭到逮捕。1946年3月押解到苏州狮子口监狱。4月5日开庭审判，一周后宣判处以死刑。陈公博没有上诉，但其妻李励庄要求复判，即被驳回。

6月3日是他执行死刑的日子。执行前，他到陈璧君囚室前向陈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另外，给家属和蒋介石各写了一封遗书。在给蒋的遗书中，仍表示对蒋的忠诚和念念不忘反共。到刑场时，他对执法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起步走到一半，法警在背后开枪，几分钟后即气绝身亡。

周佛海的利用价值结束后，戴笠便劝他电呈蒋介石“请准辞职”。1945年9月30日，他随戴笠到重庆后即遭软禁。1946年秋，他与罗君强、丁默村等押至南京老虎桥监狱。经审判，江苏省高等法院判他死刑。

陈立夫、陈果夫曾致函蒋介石，请求免其死刑。周妻杨淑慧找到过去与周佛海同在委员长侍从室的朋友陈布雷，托他向蒋介石求情，并说如果周被枪毙，她自有办法把蒋介石过去4次给周佛海的“手谕”公之于众，声称这些照片正藏香港。蒋介石怕她摊牌，只得同意见她。

杨淑慧由保密局长毛人凤陪同见蒋时，当即跪在蒋面前流泪。蒋介石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到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果然，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了待赦周佛海的命令，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1948年2月，周佛海多种疾病并发，家属要求保外就医，未获批准，终于病死于老虎桥监狱。

其他汉奸中，判了死刑的，基本上都在1946年下半年执行于苏州狮子口、上海提篮桥和南京宁海路老虎桥等监狱。

结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

这首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保卫黄河》，我们已经唱了半个多世纪了。每当我们唱起这首激动人心的战歌，就不由会想起那奔腾咆哮的黄河，想起黄河两岸稠密的青纱帐，想起8年抗战的难忘岁月。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自古以来，黄河就以她那坚韧不拔的倔犟性格，历经坎坷，历经艰辛，历经沧桑，一泻千里，一路拼搏。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就如同滔滔黄河那样，永远是那么不屈不挠，那么英勇无畏，那么豪迈坚强。惊回首，她从那黄土高原跌宕起伏；展望眼，她又在茫茫平原纵横驰骋。有时千百次冲撞才穿过一条峡谷，有时万千次积聚才爬上一个陡坡……

8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战场上，日军死伤共计228.2万人（日本方面统计是40.46万人）；

——8年抗战中，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60%以上、空军50%以上的兵力；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战场上投降的日军，达114万之多；

——“9·18”以来的14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死伤2180余万人，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数字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它雄辩地告诉世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场，中华民族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受害最深、贡献最大的民族。正如罗斯福曾经说过的：“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它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

1972年9月25日上午11时30分，日本国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一行乘坐的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田中首相和周恩来总理热烈握手那一瞬间，标志着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机场上奏响的两国国歌，一首是当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出现的抗日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首是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压迫的象征——《君之代》。两曲在70年代第二个秋天于北京并奏，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变迁。

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经过去了十多个年头。但是，抗日战争这段历史却时时在人们心中回荡，黄河的咆哮声仍然不断在耳边响起，它时刻在提醒着善良的人们：决不能让历史再度重演，应该警惕军国主义思潮的再度复活，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前 事 不 忘 ， 后 事 之 师 ！

